

理论与实践

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月刊



目录

- 我国过渡时期的阶级关系与阶级斗争 許滌新 (1)
- 論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 杨奎章 (9)
- 右派分子的人性論散布了实用主义者的毒素 王 越 (15)
- 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对广东教育的影响及其批判 张其光 (19)
- 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批判 董修智 (25)
- 几年来广东省文物工作的成就和一些问题的研究 商承祚 (31)
- 关于在广东地区展开东南亚研究的问题 朱杰勤 (43)
- 辛亥 3 月 29 日黄花崗七十二烈士之役 陈錫琪 (46)
- 1921 年以前广东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 李稚甫 (53)
- 說“非人者必有以易之” 杜守素 (57)
- 宋元俗語研究三例 刘逸生 (59)
- 列宁、斯大林、毛澤东論反浪費 赵一之 (61)

动态

- 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界討論五年研究工作规划
- 广州市高等学校先进工作者提出大跃进的倡議書
- 华南师范学院制訂第二个五年科学研究规划的情况

我国过渡时期的阶级关系 与阶级斗争

許 滌 新

一

我国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分子，采取和平改造的政策。这一政策的主要根据，是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的时候，我国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此外，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不但有斗争，而且存在着联盟的关系，也是我国能够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条件。

中国的资产阶级可以分为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不同部分。官僚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他们和中国农村中的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敌人。这个革命的敌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一样，被打倒了。民族资产阶级同官僚资产阶级有别，他们虽然是剥削阶级，他们对工人阶级存在着剥削关系，但同时他们是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束缚的。因此，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由于这种情况，他们对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们愿意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或者在斗争中保持中立；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并未断绝经济上以至政治上的联系，因此在斗争中，又经常表现了动摇性和妥协性。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因此，工人阶级就有可能、有必要来联合资产阶级，反对共同的敌人。毛泽东同志说：“中国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这种二重性，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的影响

是非常之大的，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二重性，就不可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①。

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利用其所占有的生产资料，对工人群众进行着剩余价值的剥削，这种剥削关系就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间存在着对抗性矛盾的根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还是次要的矛盾。到了中国人民胜利地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以后，到了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后，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这种矛盾的表现是：资产阶级对于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和活动，他们的唯利是图的违法行为和对国家计划经济的破坏作用。根本克服这种矛盾的方法，只有废除资本家生产资料私有制，只有废除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建立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过去曾经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参加民族民主革命，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承认工人阶级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拥护人民共和国和人民民主专政，拥护共同纲领和宪法，愿意继续反对帝国主义，赞成土地改革，支持抗美援朝，而他们所经营的工商企业除了具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之外，还具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国家需要尽可能地利用资本主义的积极作用，以利于扩大生产、积累资金、训练技术人材和维持社会就业等

①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75页。

等，这种情况說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民族资产阶级仍然具有两重性。因此，党和国家就不采取沒收剝夺的办法，而采用和平改造的办法，来处理这个矛盾。

在过渡时期的中国，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在如下的条件下表现出来的：

第一、在国家政权上，我們已經实现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專政。我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工人阶级的领导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标志着我們国家的根本性質。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間矛盾的斗争，是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統治的条件下进行的。反之，在我国人民民主專政的条件下，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在这里，中国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間，不但存在着对立的阶级关系，而且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权，不但是强大巩固的，而且是越来越加强，越来越加巩固的。我国过渡时期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間的阶级斗争，就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这样一个强大巩固的国家政权下进行的。

第二、由人民民主政权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着领导地位并发挥领导作用。跟着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展，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就日益巩固，它的领导作用就日益增强。国营经济不但掌握了重工业、輕工业、金融信贷和运输，而且垄断了对外贸易，控制了国内市场。在解放初期，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虽然占有一定的比重，但，这一比重是不断地在降低、在削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力量的削弱，使它不能不依靠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不能不服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在过渡时期我国的条件下，私营工商业服从国营经济领导，是同接

受社会主义改造，統一在一起的。服从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就是接受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因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领导，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进行的。

第三、在我国，工人阶级所领导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权，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工农联盟的不断地巩固和加强，是工人阶级的领导能够得到胜利的基本保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工人阶级领导了农民，推翻了地主阶级，粉碎了封建制度，使广大农民取得了土地。在土地改革以后，工人阶级领导农民群众进行农业合作化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把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組織起来，在农村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高农业生产；同时，逐步割断资本主义同农民经济的联系，限制和逐步消灭富农经济。这么一来，广大农民就能够摆脱资本主义的剝削，向着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这么一来，就不但消灭了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剝削，而且消灭了产生资本主义的泉源，使城市工商业资产阶级陷于最后的孤立；这么一来，我国的工农联盟和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作用，就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之上，使我国的这个工农联盟，更加加强、更加巩固了。由此可见，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胜利，是工人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解决“誰战胜誰”这个问题的重要保证和重要环节之一。

第四、由于党和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正确的利用、限制和改造政策，由于国家和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分子的违法行为进行了多次的严重斗争，又由于大多数城市的资产阶级分子，经常进行学习，因而提高了对于社会发展规律和国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的认识。这样，在资产阶级中間，就发生了深刻的分化，就出现了一批爱国的进步分子。这种进步分子是靠攏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他们不但自己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并且能够推动其他资产阶级分子接受

改造。这种进步分子的人数，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而日益增加的。在资产阶级家庭中，也在发生变化。不少受着党和国家教育的资本家子女，不但自己不愿意当资本家，而且推动他们的父兄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资产阶级内部的这种分化，是有利于争取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来接受改造，是有利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改造的。

第五、中国工人阶级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处在有利的国际条件下进行的。我国不象四十年前的苏维埃国家一样，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在强大的苏联和其他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和援助之下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和平民主阵营。社会主义世界在走着上坡路，欣欣向荣；而资本主义世界则在走着下坡路，每况愈下。苏联发射了第二颗人造卫星的成功，不但宣告了人类进一步征服自然界新纪元的开始，而且强有力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强有力地证明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已获得辉煌胜利和共产主义力量的空前大团结。东风压倒西风，这是国际政治形势的新局面。这个有利的国际条件，极有利于革命的和平转变，极有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

根据上述的条件来看，在过渡时期的我国，在国内的阶级关系中，工人阶级是领导的阶级而资产阶级则是被领导的阶级；在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是主导的经济成分而资本主义则处在被领导和依赖的地位，如果离开社会主义经济，它就无法经营下去。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力量，越来越强大；而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则越来越削弱。农业合作化的成功，使工农联盟更加巩固，使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作用更加强大；反之，资产阶级的内部则陷于分崩离析的状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愈来愈多，而决

心反抗国家和人民的反动分子则愈来愈孤立。再加上国际上的有利条件，我国工人阶级在过渡时期的阶级关系中，就处在极其有利的地位了。这种情况说明：在过渡时期的我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工人阶级方面而不在资产阶级方面。这种情况，使工人阶级能够主动地来掌握、来控制这一矛盾；使我国有可能由已经建立的在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从上而下地领导，并取得广大人民，首先是工人和农民基本群众，从下而上的直接支持，逐步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和逐步地改造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来克服这个矛盾。这就是说，在我国的条件，克服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是可以不经过爆发的形式来完成，而是经过非爆发的形式，即和平改造的形式来完成的。

但是，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并不是没有经过斗争就可以取得胜利的。在解放初期，资产阶级曾利用国民党长期恶性通货膨胀所遗留下来的物价波动的情况，进行投机活动。国家为了稳定市场物价，从1949年冬到1950年3月间，对于投机破坏分子，进行了严重的斗争。这一斗争，证明了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是相当尖锐的。接着，资产阶级又利用他们当时在轻工业生产和国内贸易方面具有相当大的经济力量等条件，利用当时土地改革后国内市场日益扩大和抗美援朝需要大量工业品的时机，向国家和工人阶级施行五毒行为。资产阶级的五毒行为，他们的猖狂进攻，证明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间，至少证明资产阶级中间有一部分人（如完全违法户），同国家和工人阶级，存在着对抗性的矛盾。因此，国家和工人阶级就在1952年发动五反运动，来打退资产阶级的这种猖狂进攻。五反运动是一场激烈的群众斗争。这一斗争，不但教育了工人群众和国家工作人员，而且教育了资产阶级分子。由于大多数资产阶级分

子在这一次斗争中认识了五毒罪行对于祖国和人民的危害，认识到接受工人阶级领导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这就使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能够顺利进行，能够在以后采取更为温和的形式。

二

随着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決定性的胜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我国基本上已经不再存在，资产阶级基本上已经丧失了原来的物质基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公私合营企业和国营企业中工作，他们正在向着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转化，因此，这个阶级现在正处在消灭的过程中。但是，它还没有最后被消灭。毛泽东同志说得很清楚：“一方面，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另一方面，他们现在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这就是说，他们的剥削根子还没有脱离，他们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①因此，我们断不能因为经济制度上的改变，断不能因为企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根本上的改变，就认为这个阶级已经完全消灭，就认为资产阶级分子同劳动人民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如上所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它的两面性是跟着中国革命的发展而变化的。毛泽东同志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②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由于资产阶级分子正在向着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转化，这就使他们有可能逐步地提高其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并逐步地转向社会主义的立场。但是，由于他们还是剥削者，大多数人还未抛弃资本主义立场，还保留着资本主义的思想

感情和生活习惯。因此，有不少人在被改造的过程中，对社会主义制度、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经常发生抵触的情绪。有不少人从唯利是图的观点出发，认为资本主义有利可图的刺激，而社会主义企业则缺乏这种动力；公私合营企业盈亏都是五厘定息，也没有动力。有不少人习惯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可以任所欲为，因而对于把企业的生产经营纳入国家计划，感到不方便，感到讨厌。有的人反对公私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制度和企业的集体领导制度，认为这些制度是私方人员有职无权、不能发挥积极作用以及公私关系搞不好的根源。有的人痛恨五反运动，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并不服气，对于从本企业职工提拔起来的公方代表，抵触更大。有的人只愿意听“资本家是财富”而不愿意听资本家需要本质上的改造，认为全行业合营之后，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因而就用不着改造了。其中有不少人，留恋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因而对于公私合营企业的经营管理，并不守职尽责；有的人甚至闹退出合营企业，退出合作社；或者利用公私合营企业去经营“地下工厂”、去投机套购；或者采用借支等办法抽走资金。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面性，在实质上，不仅反映资产阶级分子为公私合营企业服务的工作性质同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感情之间的矛盾，不仅反映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根本变化同资产阶级分子的资本主义思想意识之间的矛盾，而且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立场同资本主义立场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

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前，资本主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构成部分之一，它具有有利于国计民生和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两面性。因此，党和国家对它采取利用其积极性、限制其消极性并逐步地将其改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政

^{①②}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0页、第3页。

策。但是，在这一改造已經基本成功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經在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后，資本主义經濟的积极性就不再存在，从而坚持資本主义立场就成为障碍社会生产力、使历史开倒車的反动立场了。这种情况使我們認識到：在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需要有一个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1956年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以后，由于資產階級向国家和工人階級交出了經濟陣地，由于資本家生产資料所有制的內容起了根本的变化，由于資本家对工人的剝削基本上被限制在定息制度之內，由于資產階級分子正在向着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轉化，因此，有些同志（包括我在內）曾經設想：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从此以后，就失去了对抗性。这种看法是錯誤的。如上所述，資本家生产資料所有制的內容，在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以后，虽然起了变化，但是，資本家现在仍然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拿定息，拿剝削收入，他們中的大多数人，基本上尙未抛弃資本主义立场，有一部分人甚至还坚持資本主义立场。这种情况，証明在高潮以后，說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失去了对抗性，是不合事实的。正确的看法，应该是：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有对抗的一面，有非对抗的一面。毛澤东同志說：“人民內部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間來說，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來說，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在我国今天，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間，矛盾的对抗性的一面，是以資產階級的繼續剝削，是以他們的繼續坚持資本主义立场，作为根据的；矛盾的非对抗性的一面，是以資產階級的傾向于接受共产党的領導，走社会主义道路，作为根据的。資產階級本身的两面性和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矛盾的两面性，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將逐步地起着变化，但是，在資產階級最后被消灭以前，我認为这种情

况，大体上是存在着的。

在1956年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我国政治形势发生了深刻的、根本性的变化。由于資產階級分子已經丧失了原有的經濟基础，由于他們中的大多数人，正在向着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轉化，因此，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成为他們一个极其严重的問題了。但是，在資產階級分子中，对于这个問題所采取的态度是不相同的，因此，就引起了新的政治分野，就引起了左、中、右三种势力的重新改組。在資產階級分子中，左派分子在政治上已經抛弃了資本主义立场，站稳了社会主义立场，坚决地拥护共产党的領導。可以說，左派分子在政治立场上是沒有两面性的，他們同工人階級之間，并不存在着对抗性的矛盾。现在資產階級中的这种人，为数极少。資產階級分子的大多数人是中間派，他們在社会主义同資本主义之間，政治立場的問題並沒有解决，存在着相当大的动摇性。他們一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傾向于接受共产党領導，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另一方面基本上还未抛弃資本主义立场，对資本主义还有不同程度的留恋，当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时候，中間分子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煽惑、蒙蔽，在不同程度上同情以至支持右派。中間分子同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非对抗的一面和对抗的一面。右派分子是資產階級中一小部分坚持資本主义立场的人，他們从1956年下半年以来，特別在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就逐步地开展其对党和国家的进攻，到了1957年5月間党进行整风，他們就疯狂地到处点火。他們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經濟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統購統銷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成就，而宣扬資本主义制度和資產階級的剝削。他們反对无产阶级專政和民主集中制，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攻击反对帝国主义和肃清反革命的斗争，反对对資產階級分子的

改造。他們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进行分裂人民团結的各种阴谋活动，千方百计要把人民内部各种矛盾同阶级矛盾集中起来，扩大起来，企图在中国也出现一个象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局面，企图资本主义在中国死灰复燃，企图使我国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回头路。右派分子在政治立场上是没有两面性的，他们只有阴暗、反动的一面，他们集资产阶级反动性的大成。他们在全国六亿人口中，虽然只占一小撮，但是，“他们有财产，有知识，有一定的管理和组织能力，同国内外反动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进行政治斗争甚至武装斗争的经验”^①。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活动，说明国内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还在继续；说明国内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两条道路的斗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存在着；说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同人民、同工人阶级间的矛盾，已经不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而是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对抗性的敌我矛盾了。

1956年全面公私合营的高潮，基本上解决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问题，但是仅仅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完全完成。毛泽东同志说：“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②。“因此，除了在经济战线上要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以外，还必须要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

战线上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③。

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为了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地解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党和国家从1957年夏间就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人民群众进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反对右派分子斗争的重大任务之一，就是要在我们国家的一切方面，把无产阶级的领导，巩固地树立起来。资产阶级分子的全面整风，是以反对右派、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作为内容的。在反对右派分子斗争胜利的基础上，以左派分子和中间分子作为对象的一般整风，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对左派分子来说，整风就是要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改进工作作风。对中间分子来说，整风就是要整掉他们的动摇性，教育他们明辨是非，决心抛弃资本主义立场，站稳社会主义立场。事实证明：资产阶级的中间分子，除了有些停滞不前以至向右转化的人以外，多数人经过这个波澜壮阔的整风教育，是能够向左转一步，为以后在政治上、思想上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打下有利的基础的。经过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1958年初的一般整风，全国工商界在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之下，在党和国家的十五年赶上并超过英国的号召鼓舞下，在全国工人和农民的生产大跃进的推动之下，也就掀起了一个新的改造高潮。这是资产阶级分子的带有群众性的自我改造的运动。在这运动中，资产阶级分子中的多数人，表示要在政治思想的改造上来个跃进。他们现在已经在互相挑战，表示愿意参加劳动，表示积极贡献才能参加生产大跃进，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争取在三五年内改变成为自食

① 陆定一：“我们同资产阶级各派的根本分歧”，1957年7月12日人民日报。

②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27页。

③ 刘少奇：在北京各界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57年11月7日人民日报。

其力的劳动者。在我国条件下，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是人心所向。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在这个波澜壮阔的高潮中，政治上思想上的根本改造，是有可能跃进的。

要在政治上思想上改造资产阶级分子，断不能同劳动实践相隔离。如果离开劳动实践，则对他们的思想教育，就难于巩固。以企业为基地来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特点，就是能够把对他们的思想教育和劳动实践相结合；就是能够把他们放在广大的工人群众的监督之下，在生产活动中，逐步同化于工人群众；就是能够在生产经营中，尽量地使用资产阶级分子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列宁曾经说过，仅仅战胜资产阶级是不够的，这只是事情中最不重要的一部分。做到这一点也不困难，问题是要借非共产主义者的手建设共产主义，其中包括资本家。直到现在，民族资产阶级是我国国内各阶级中比较有现代文化和技术，并拥有大批知识分子和各种专家的一个阶级。资产阶级分子的大多数人是长期在企业中服务的。以企业为基地对他们进行改造，有利于使用他们的技术和经验，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在解决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問題以后，我们必须依靠工人群众，通过劳动实践和思想教育，推动资产阶级分子的自我改造，促进资产阶级内部的分化，这样，我们就能够顺利地消灭资产阶级，使资产阶级分子逐步地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

三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过渡时期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一种新形式。这一阶级斗争，在性质上，是极其尖锐、极其激烈的。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中早就指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比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包含着

极其复杂尖锐的斗争”。历史告诉我们，垂死的剥削阶级从来是不会自愿退出历史舞台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既然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既然是要使资产阶级退出我国的历史舞台，那末，这个斗争，在性质上，就不能不是尖锐而激烈的。

但是，从我国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发展的趋势来看。能不能说，跟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跟着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资产阶级的反抗，就越来越利害，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间的阶级斗争，就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激烈呢？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不能抽象地去理解，而是必须从我国的具体情况，从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去理解的。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原来就具有软弱性，解放以后，由于工人阶级成为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由于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不断地提高，由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力量的不断壮大，因此，资产阶级对于国家和工人阶级的依赖性，越来越加显著。1956年全行业实现了公私合营之后，资产阶级失去了经济基础，他们原来经营的企业，已经为国家所直接掌握，因此，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软弱性，就更加利害了。这种情况，可以从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展过程来考察。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教育改造，在加工订货时期，较诸在公私合营时期，是较为困难的。在加工订货时期，当销路畅旺的时候，不少资本家公开抗拒国家给予他们的加工订货的任务；在接受了加工订货的任务以后，不少资本家从事偷工减料，以坏顶好，延期交货，甚至以抬高工资的办法，来挑拨落后工人与国营企业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要对资本家进行思想上的教育改造，那是有困难的，那是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的。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因为在加工订货时期，企业的生产资料和管理经营的权力，操在资本家手里，这样，

他們就能够以企业作为基地来同国家抗衡了。在实现公私合营以后，社会主义經濟从企业外部进入企业内部，社会主义力量成为企业中的领导力量，资本家不复象过去一样，是企业的老板，而是在社会主义力量的领导下的工作人员。这样，他們要把企业作为基地来同国家抗衡，那就很有困难了。这种情况，再加上资产阶级内部的不断分化和因农业合作化的成功而使资产阶级陷于最后孤立等等原因，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于资产阶级已处于绝对压倒的优势，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则处于绝对劣势的地位，他们对国家和工人阶级的抵抗力量，越来越加削弱了。资产阶级的抵抗力量既然跟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而日趋削弱，那末我国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发展趋势，是不可能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激烈的。

我国过渡时期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间阶级斗争发展的趋势，如果是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激烈的话，那末，党和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就会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因为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激烈的结果，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间的统一战线，总有一天是要破裂的。在那种情况之下，和平改造怎有可能呢？因此，那种无视中国的具体条件，认为我国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发展的趋势，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激烈的说法，是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同党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改造的政策相矛盾的。

但是，說我国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发展的趋势，不是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激烈，并不否定在经济战线上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之后，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如上所述，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巨大的变革，但是，资产阶级分子的剥削根子还没有脱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资本主义立场基本上还没有放弃，他们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在他们中有

一些人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采取敌对的态度。1957年上半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猖狂进攻，就是证明。右派的这种反动活动，在实质上就是国内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间阶级斗争的继续。曾经趋于缓和的国内阶级斗争，由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再一次地尖锐起来、激烈起来了。在反右派斗争和工商界整风运动以后，坚持资本主义立场的右派是被打垮了，但是资产阶级中，可能还有一些人，对资本主义还相当留恋，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还未心服。资产阶级中的某些人同工人阶级在某些问题上还会呈现不同程度的抵触和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将继续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反映出来。由此可见，在我国的历史条件下，在和平改造的条件下，阶级斗争发展的趋势，虽然不是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激烈，但是，这并不否定今后阶级斗争，还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重新尖锐化；这并不否定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间的斗争，还是一个相当长期的时有起伏的，有时甚至是很尖锐、很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将在今后若干年内反复发生。跟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我国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间的斗争，将在这样的波澜起伏的形式之下，逐步地趋于减弱以至消灭。

由于外国帝国主义的存在，由于国内反革命势力尚未最后消灭，由于阶级矛盾包含着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两个内容，这种情况证明我国过渡时期阶级矛盾的复杂性；这种情况要求我们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绝不能无视还有阶级斗争的存在，也不能无视还有敌我矛盾的存在，巩固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继续进行和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还是我们一项重要的任务”^①。

^① 周恩来：1957年6月26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會議上的“政府报告”。

論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

楊奎章

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建設正面临一个伟大的新高潮。全国 6 亿人民鼓足革命干劲，正以排山倒海之势，推动着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的大跃进。这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繼在經濟战綫、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取得伟大胜利之后出现的生产战綫上的大革命。这一革命是在群众大大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和建設新生活的无比热忱的基础上展开的。生产建設大跃进形势的出现，再一次生动地說明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和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的巨大作用。大跃进的出现是完全合乎客观規律的。

先談大跃进的形势。

首先是农业生产开始出现伟大的高潮。已經实现合作化的全国 5 亿多农民，在党中央提出的农业发展綱要四十条的鼓舞下，进一步提高生产积极性，在去冬今春掀起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农业生产高潮，特别是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的高潮。在 4 个月的时间內，全国共开辟了 1 亿 1,700 多万亩的灌溉面积，等于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开辟的灌溉面积（2 亿 1,000 多万亩）的 80%，而为过去 4 千年来我国开辟的灌溉面积的一半。河南省 1958 年原計劃扩大灌溉面积 700 万亩，現已达到 4,000 万亩，等于該省解放前几千年来发展的灌溉面积的 5 倍半。陕西省在去冬短短 3 个月內，开辟的灌溉面积比該省历史上所修的水地还多 30 万亩。很多省份，例如广东、安徽、江西等，都提出要苦干 3 年，提前五年实现农业发展綱要四十条。根据农业生产高潮的新形势估計，今年农业和农副业总产值將达到 688 亿 3,000 万元（按 1957 年不变价格計算），比 1957 年增长 6.1%（1957 年总产值按 1952 年不变价格計算为 603 亿 5,000 万元）^①，这个速度大大超过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劃的平均速度。其中粮食的指标为 3,920 亿斤，比 1957 年增加 220 亿斤，增长 5.6%；棉花指

标为 3,500 万担，比 1957 年增加 220 万担，增长为 6.7%。而在 1957 年，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是 3.5%，粮食生产的增长速度是 1.7%。可见，今年的增长速度都是相当高的。按照全国农民目前的干劲和各地批判右傾保守思想后所訂的规划来看，这些指标都有达到甚至超过的极大可能。此外，1958 年国家对农业生产的財政支援也比以往大大增加，国家預算中用于农业方面的支出共 29 亿 4,000 万元，比 1957 年增加 40.78%；今年国家发放农业貸款的指标將达到 44 亿元，比 1957 年增加 4 亿元，这些都將大大推动农业生产的大跃进。

其次，工业方面。經過全民整风运动，特别是在党中央提出的“在 15 年內在鋼鉄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甚至超过英国”的伟大号召鼓舞下，全国职工鼓足干劲，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增产节约运动和“找先进、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的社会主义竞赛正广泛深入地展开，劳动定額一再突破，生产計劃不断提高，很多陈规旧习被紛紛打破。例如，历年来，1 月份的生产 and 基建計劃总是完成得最不好的，年头松，年中紧，年底赶几乎成为“常规”。但是今年这个“常规”也被打破了。1 月份全国工业总产值超額 2.5% 完成了月計劃；基本建設的情况也比过去任何一年都好。春节过去常常不能全勤，今年大多数厂矿却照常生产，很多职工坚决做到不离車間，不离工地，坚持正常生产。据估計，今年工业总产值將达到 643 亿 7,000 万元（按 1957 年不变价格計算），比 1957 年預計数增加 81 亿 9,000 万元，增长 14.6%，其中生产資料生产增长 18.8%，消費資料生产增长 9.7%^②。而在 1957 年，工业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是 6.9%，其中生产資料生产的增长速度是 12%，消費資料生产的增長速度是 3%。鋼产量今年估計將达到 700 万

①②：见薄一波副总理“关于 1958 年度国民經济計劃草案的报告。”

吨；糖的产量要从原定的210万吨提高到400—500万吨。此外，还应充分估计到，自从调整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后，权力下放，地方工业生产潜力将大大发挥，很多省份都提出，要大力发展地方工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使本地区的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实现本地区的工业化。例如，广东省工业总产值计划在五年内要增加4倍，广州市地方工业总产值在同期内也将增加4倍。这都将大大推动工业的大跃进；今年工业生产的指标也可能大大超过。

再从今年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情况，也可看到生产建设大跃进的前景。今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预定为145亿7,700万元，比1957年的预计数增加22亿元，增长17.8%，而1957年却没有增长。还须指出，在投资总额中还没有包括广大农业合作社和手工业合作社等的基本建设投资在内。今年计划继续施工和开始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共有1,185个，其中工业建设项目716个，农林水利建设项目185个。工业建设项目中，在今年内可以建设完工的有188个，平均每46小时就将有一个新的重大工厂或矿山建设完工并开始投入生产。1957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这一年继续施工和开始施工的限额以上厂矿共642个，建设完工的有178个，平均每两天就有一个重大企业建设完工投入生产，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大企业建成最多的一年。今年是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的第一年，建设规模很大，还能够维持这样高的发展速度，这说明工业大跃进的前景将是十分动人的。

总的看来，全国亿万劳动人民的革命干劲是激动人心的，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工作大跃进的局面是一幅十分动人的景象。北起黑龙江，南到五指山，东自东海之滨，西到帕米尔高原，在我们伟大祖国方圆万里的疆土上，到处沸腾着热火朝天的生产热潮，几亿农民以排山倒海之势展开对大自然的斗争。他们说，“一年辛苦，十年幸福；十年辛苦，万年幸福”。他们表示，“天冷冷不住热心，地冻冻不住决心，大雪盖不了信心，大风刮不了恒心”。黑龙江省的农民提出：“山河都改观，跃进也不难，要狠狠的跳，坚决的跳，今年跳到黄河北，三年跳到黄河南，十年之内过长江”。他们就是以这样的英雄气概和革命干劲来促进农业的大跃进。很多地方的党组织和政府负责人，也把自己的办公室搬到田野、水利工地，装上电话机，扛着锄头，进行生动的领导，象指挥作战一样领导群众掀起轰轰烈烈的生产热潮。很多农业社员“点灯吃饭，吹灯上工”。水利工地上是“白天红旗招展一片红，晚上

万盏灯火一片明”。各地出现千千万万的不避风雨、日夜施工、父子竞赛、全家动员的动人事迹。工业方面，职工们千方百计打破陈规，到处找先进、学先进、比先进、赶先进，一次又一次修改劳动定额，一次又一次打破生产记录，很多过去认为不能解决的问题解决了，很多长期以来不能克服的困难克服了。经过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洗礼的工农群众，解放出来的力量就象原子核的分裂放出来的热能一样。在工农劳动人民革命干劲的推动下，各种工作也都在打破常规地跃进式的发展。总之，我们正处在一个大跃进的时代，群众的干劲气壮山河，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建设事业的发展鹏程万里。

适应于这种情况，如上所述，今年我国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将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大得多，国民经济大跃进的前景将是：从各方面促进农业生产的高潮，力争农业大丰收；工业生产，特别是生产资料的生产将进一步增长；基本建设的投资，特别是生产性建设的投资将大大增加；在扩大再生产的基础上，生活资料的生产也将有所增加；市场物价将继续稳定，人民物质生活将进一步适当地改善；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也将积极地发展。总之，1958年将是国民经济普遍高涨的一年、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一年。

二

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大跃进形势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具有充分的条件，是完全合乎客观经济规律的。总的说来，大跃进形势的出现，是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限生命力和无比优越性，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发生巨大作用的表现；是伟大的全民整风运动和反击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灿烂的政治思想之花所结成的丰硕的经济之果；同时，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在物质基础上和经验积累上也为生产建设大跃进的到来作好准备。而这一切都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此外，“东风压倒西风”的国际新形势，更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大跃进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第一，大跃进形势的到来是我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结果；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在我国整个国民经济领域中全面地发生巨大作用的产物。人类历史上每一社会形态的变革，例如由原始共产主义进入奴隶社会，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

义社会，每当新的生产关系建立以后，都必然出现社会生产的新发展。但由于在这些阶级社会里，尽管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而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依然存在，因此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就受到一定的局限，超过当时的生产关系所容许的程度，生产就不可能有更大的发展。剥削阶级由于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和竞争的盲目性，也不可能使社会生产有计划地无限发展。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剥削阶级，彻底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才使生产的飞跃发展具有无限的可能。在这里，人民成为国家和自己的命运的主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了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根本一致，使社会主义的国家能够按照客观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地进行经济建设，并取得全体人民自下而上的全力支持，使社会主义建设变成亿万劳动人民自觉的群众性的行动。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就是在先进技术的基础上使生产不断增长和完善，以便最充分地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不断提高社会全体成员的物质福利和使他们得到全面的发展。我国今天的情况正是这样。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把几千年来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消灭了阶级剥削，最后解除了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各种束缚，这就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高涨和生产的跃进提供了最广阔的场所。特别是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采取了和平改造的方式，由于各种条件的成熟，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努力，使在这样一个大革命的过程中，社会财富没有遭到损坏，社会秩序没有发生混乱，社会生产没有下降。而且恰恰相反，在这个大革命取得基本胜利的第一年，即1956年，就在各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都有了一个大跃进。在五年计划的前三年（1953—1955），工业总产值共增加177亿元，而1956年一年就增加了139亿元；钢产量前三年共增加150万吨，而这一年就增加了161万吨。1956年是解放以来灾荒最严重的一年，但农业生产总值仍比1955年有所增加。这些都充分说明：新生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全民整风和反击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为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大跃进准备了思想基础和政治条件。1957年春天，资产阶级右派利用我们党开展整风的机会，发动了对党和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6月间，党领导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

民，对资产阶级右派展开坚决的反击，彻底粉碎了他们的阴谋。经过全民整风和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这一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大大提高了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生产积极性，发扬了社会主义民主，大大克服了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目前，整风运动正转入以反浪费和反保守为中心的斗争，要进一步发动群众，扫除落后现象，打掉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和娇气；认真贯彻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打破那些妨碍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旧的规章制度，精简机构，改善生产管理和劳动组织，改进生产技术，降低生产费用，更好地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党还结合整风运动，提出下放干部参加劳动锻炼，以加强生产战线、加强基层；在职干部也须参加体力劳动，并以“种试验田”的办法加强具体领导，彻底改变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我国全民整风运动是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其最终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要把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工作大大推进一步。目前整风运动还在深入进行，全国已经出现生气勃勃、干劲十足、领导与群众打成一片和全民空前团结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将有力地促进生产建设的大跃进。

第三，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为生产建设大跃进准备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并使我們积累了领导生产建设的丰富经验。1958年是我国在胜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上，开始更大规模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经济建设过程中这一新的转折点，不但对生产建设提出大跃进的要求，同时也使大跃进的出现具有充分的条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已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1957年我国工业固定资产总额将比1952年增长一倍以上，工业总产值将比1952年增长130%；由于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机器设备的自给能力已经达到60%以上，金属材料的自给能力已经达到80%以上。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开工建设的重大企业次第完工并发挥生产能力后，我国的机器设备和金属材料的自给能力将进一步提高以至达到完全自给；这些都使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业生产能够继续保持高速度的发展。农业方面，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最伟大的成就，就是提前实现农业的合作化，改变了几千年来个体农民分散经营的落后面貌，大大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为农业的技术改造和发展生产开辟了最广阔的道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虽然经历了1954年和1956年两年的严重自然

灾害，但农业总产值和粮食总产量还是逐年有所增加。五年内共增加灌溉面积2亿1,000多万亩，增加耕地面积6,000多万亩，国家和农民在兴修水利、改良品种、防治病虫害、增加化学肥料和农业机械生产能力等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加上农民“愚公移山”的干劲，和苦战三年实现四十条的雄心，这就使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的第一年农业生产来个飞跃具有坚实的基础。

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还证明，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生活消费品的需要量很大。农业不仅是人民衣食的主要来源，而且又是工业品的重要市场。农业的丰收或者歉收，农业发展的快慢，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影响国家和合作社的积累以及人民生活的改善。在第一个五年中，1954年和1956年农业歉收，就影响1955年和1957年工业生产增长的速度，在国家财政收入分别只增加3.7%和1.9%；而1952年和1955年农业大丰收，就带来了1953年和1956年工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大跃进。毛主席早在两年前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就已经指出，农业生产的发展，必然推动我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必然推动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去冬今春农业生产大跃进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大跃进的事实，再一次证明了毛主席的预言的完全正确。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经验还证明了，五年计划第一年的执行情况如何，对整个五年计划的完成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头一年看前冬”。五年计划在头一年打好了基础，开了个好头，就将使整个五年计划能顺利地顺利进行。那末，由去年冬天开始的农业生产大跃进，正是促使我国工业生产和各项工作大跃进的可靠基础。这不仅对胜利完成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而且对整个第二个五年计划都有极重大的意义。

第四，党的正确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6亿人民奔腾澎湃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和排山倒海的革命干劲，只有在党的坚强领导、深入细致的教育发动工作和组织工作下，才能汇合成有组织的自觉的具有高度效率的行动，进行合乎科学规律的跃进。只有久经锻炼的党的领导，才能够对发展社会生产力采取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党在领导全国人民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工作中，积累了许多建设经验。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际工作经验和执行情况，党及时提出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发展

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党指出，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必须与生产资料的供应程度相适应；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与生活资料的发展相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应该在兼顾建设和生活的方针指导下，在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和改善物质生活相结合下进行。根据我国“又穷、又白”的情况，党又提出“从6亿人口出发”，“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勤俭持家”和“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依靠了工人阶级，团结了全国人民，发挥了积极因素，并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在国外，坚决拥护和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兄弟国家的帮助和全世界进步人士的支持。这就使我们能够在15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最后，“东风压倒西风”的国际新形势，也为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大跃进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去年苏联两个红色月亮上了天，和60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发表了两项宣言，标志着世界政治力量对比中新的转折点。“东风压倒了西风”，社会主义的力量和平的力量肯定地压倒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的好战力量，社会主义的事业和平的事业，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的兴旺旺盛，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形势也空前有利。虽然帝国主义存在一天，战争的危险就一天不会完全消失，但当前国际形势肯定地继续走向缓和，这就为社会主义的和平建设提供极为有利的国际条件。从另一方面的意义说，“东风压倒西风”是两种政治力量的斗争，“东风”要一直把“西风”压下去，就必须继续不断壮大和发展自己的力量。这是力量的竞赛，也是速度的竞赛。苏联提出要在15年内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工农业生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美国，我国提出要在同一时期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这都不只是一国的問題，而是东风压倒西风的問題，是保卫世界持久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关键所在。这种国际形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大跃进，又是有效地保卫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形势继续走向缓和的保证。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大跃进的世界性意义，从而鼓足干劲，把握时机，促进大跃进的发展。

三

需要指出，我国目前社会主义生产建設大跃进形势的出現，不仅是由于全国人民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主观愿望和要求，而且也是完全合乎社会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馬克思主义的哲学認為，对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矛盾的对立面又統一，又斗争，由此推动自然事物、社会事物和人的思想的发展。有矛盾，就有斗争；有斗争，才有发展。发展不只是簡單的量变，量变必然引起質变，而質变又会引起新的量变。飞跃是事物的一种发展形式，是事物由旧質态到新質态的轉化过程中合乎規律的阶段。在社会事物中，跃进就是革命。我們要不断跃进，就是要不断革命，辯証唯物主义者就是要不断革命。形而上学者和我們相反，他們否認由一种質态飞跃式地轉化为另一种新質态的規律性，而認為发展永远是进化的、量变的、緩慢的过程，其中沒有由量变到質变的轉化，沒有跃进式的发展。用这种形而上学的哲学观点来看待社会事物，就必然成为保守主义者、改良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不是永远的促进派。我們辯証唯物主义者是彻底的革命者，是永远的促进派。我們認為，在分为敌对階級的社会里，由于存在对抗性的階級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由旧的社会制度本身来解决，因此由一种社会制度到另一种社会制度的过渡这种飞跃只有通过革命，即通过推翻旧政权建立新的革命政权来完成。但在消灭了敌对階級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象我国今天的情况下，那些阻碍新事物新質态的形成和发展的反动階級及其他腐朽势力都已不复存在或不起决定作用了，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就不再通过爆发，即不再是通过推翻现政权建立新政权来实现，而是通过旧質要素的逐漸消灭和新質要素的逐漸增加来实现。但是，飞跃的发展形式仍然存在，而且將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发展的重要形式。社会主义比之于資本主义是新質态的、更高級的制度，这一新質态有力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来沒有一种旧制度能够象社会主义制度那样使工业、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程度获得这样迅速的跃进的发展。跃进的发展，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規律和生命力的表现。苏联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以資本主义国家夢想不到的速度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并在短促的高潮中实现农业的全盤集体化的事实，有力地証明了这一点；我国第一

个五年計劃的胜利完成和当前社会主义大跃进形势的出現，也生动地証明了这一点。

还應該指出，跃进和冒进有着原則的不同。

“跃进是一种有实际可能性的前进，它不同于通常的前进，它是在有利的革命形势下，在群众运动的高潮中，千方百計，打破常规，采取新的方法和新的技术，以比平常快得多的速度，迈大步的前进”；而“同跃进相反，冒进是超越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沒有根据或者沒有充分根据的胡思乱想，主观主义的蛮干”。（人民日报2月3日社論“鼓起干劲，力爭上游”）我們党所組織和领导的社会主义大跃进，就是充分估計到群众高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估計到当前国际和国内极其有利的形势，深刻地掌握了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的基本特点和客观要求，充分認識到我国已經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能給社会生产和新技术的发展提供可靠的保証，从而以革命的促进派的态度，推动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的加速发展。党一再教导說，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大跃进的形势也就是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設中坚决貫徹群众路綫所取得的成绩的表现。客观經濟規律是不以人們的意志为轉移的，但是人們在客观規律面前也决不是毫无作为的，人們可以認識它們，并且依靠它們，利用它們来为社会謀福利。既然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就是在先进技术的基础上使生产不断增長和完善，以便最充分地滿足社会日益增長的需要，不断提高社会全体成員的物質福利和使它們得到全面的发展；既然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再沒有束縛生产力发展的腐朽力量，那么，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打破常规地促进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的大跃进，就是在客观經濟規律面前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使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更好地为我們服务，这是战斗的辯証唯物主义者的态度。与此相反，冒进却是超越客观实际可能的蛮干，是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从哲学的基本問題來說，这就是在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盲动。这不但为我們所提倡，而且是我們所坚决反对的。我們既反对“左”傾冒险主义的蛮干冒进，也反对在客观經濟規律面前无所作为，不去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右傾保守观点。拒絕具有现实可能性的跃进，那就是看不到或怀疑我国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优越性，那就是往千百万革命群众沸騰的社会主义热情与干劲上面浇冷水。任何人如果坚持这种右傾保守思想，他就有被飞跃发展的形势抛到后面去的危險；任何部門如果采取这样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就会使本部門的

工作扯別个部門的后腿，小則妨碍局部的建設，大則可能妨碍全局。

要跃进，就要克服右傾保守思想，要勇于打破常规。常规是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基础上并为一定的經濟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规章制度的建立是为了維持一定的秩序的。合理的规章制度能促进生产的发展和提高群众的积极性，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却会束縛生产的发展和群众的积极性。先进的生产计划和劳动定額对生产起着积极推动作用，而落后保守的生产计划和劳动定額却束縛生产的发展。因此，党中央在“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中指出：“原来一些不利于生产发展的规章制度，会在运动中不断地为群众的創举所打破。我們必須对于群众的創造，虛心地加以研究，按照发展的需要和群众在实践中的考驗，重新审訂原来的规章制度。凡是真正束縛生产力发展而又可以迅速修改的，應該立即修改”。

在万馬奔騰，瞬息万变的大跃进形势面前，有些人也許感到怀疑、不安。有人担心不断的跃进会破坏国民經济的平衡，会因出现許多的不平衡而弄得一团糟；有人害怕发动群众样样都来个大跃进，会使各方面都紧张起来。事实上，这些都是右傾保守思想的表现。不平衡是事物发展的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新的不平衡，循

环不已，永远如此，而每一循环都进到更高的一級。平衡是暫时的、相对的；而不平衡却是經常的、絕對的。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中指出：“所謂平衡，就是矛盾的暫时的相对的統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說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統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統一成为不統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統一。这就是我們計劃經濟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統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調整”。在大跃进中，这种不平衡的出现將更頻繁、更激烈。这是客观的规律，不以人們的意志为轉移。我們的任务就是要因势利导，竭力支持群众的积极性和創造性，竭力將先进的水平成为全社会的水平，从而在先进的环节上組織新的平衡；而不應該采取右傾保守的态度和落后的办法，要新生的先进的事物迁就陈旧的落后的事物，在落后的环节上保持旧有的平衡。在大跃进中，整个国民經济，整个国家生活都会紧张起来。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这正象征我們国家的兴隆旺盛，生气勃勃。我們有中国共产党这样坚强的久經考驗的馬克思主义政党的領導，有6亿人民这样强大的解放了的生产力作基础。又有全面规划一切經過試驗这样可靠的措施作保證，这就使我国社会主义的大跃进將循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地向前发展。

广州市高等学校先进工作者提出大跃进的倡議書

广州市各高等学校先进工作者代表于2月23日发出倡議書，要求高等教育工作者鼓起革命干劲，克服一切困难，扫除一切障碍，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又紅又專”的革命干部，創造更光輝的文化科学，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設的需求。

倡議書首先說：目前整风运动已取得伟大胜利，广大教工的社会主义觉悟已有进一步提高，我們深信高等学校也可以結合具体情况，貫徹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和勤儉办学方針，来推动高等教育事业的大跃进。

倡議書提出多、快、好、省的具体內容，并要求做好下面几件事：

(一) 必須在思想上大跃进，并促使工作

上大跃进，因此，必須深入整风，鼓起干劲，大力开展以提高教学質量和反浪费为中心的鳴放高潮，反对右傾保守，克服个人名利思想，并积极参加劳动鍛煉，培养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鍛煉成为一个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

(二) 訂好各高等学校的第二个五年計劃。各單位以至个人，也要訂好計劃，克服过去忙乱现象，层层保證計劃的完成。能够提出指标的应提出指标，以明确奋斗方向。

(三) 加强各校間的团結，互相协作，互相支援，交流經驗，互相学习，在師資和設備方面，应克服本位主义，互通有无，以發揮人力物力的更大作用。

(四) 認真学习苏联，不仅要学习苏联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还要学习苏联的勤儉办学、面向工农、面向生产和發揮集体力量的正确路綫，應該再一次掀起一个学习俄文的高潮。

右派分子的人性論

散布了实用主义者的毒素

王 越

我国资产阶级右派，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反对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妄图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在政治陣綫上他們企图搞垮党的領導，从而搞垮人民民主專政，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在思想陣綫上他們从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庫中取出一些帶有欺騙性的理論，来煽惑立场不穩、認識模糊的人，以壯大他們的声勢。他們知道，以馬克思列宁主义武裝起来的党是領導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核心力量，而党的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以及在党領導下中国人民統一的意志、高度的积极性和集体主义精神，是建設社会主义的无穷力量。右派分子再三強調其反科学的人性論，借以誣蔑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崇高的人性，并借以詆毀无产阶级政党的崇高的党性，这是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的一个組成部分。

右派分子的人性論不是什么新鮮的东西，其主要論点只是拾取了美国实用主义者如詹姆士、杜威之流的牙慧。詹姆士、杜威等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著書立說，宣传反科学的人性論，以维护资本主义的剝削制度。尤其是杜威的許多反共反苏反人民的謬論，对中国资产阶级知識分子有很大的影响。我們把右派分子的人性論和实用主义者的人性論加以比較分析，就可以看出他們站在同一階級立场，有共同的語言，表达出同样反动的观点，这不是偶然的。

一、关于“共同人性”的問題

实用主义者以生而固有的本能冲动或需要，来说明人类的本性。詹姆士說过：“在所有的傾向

中，可以看出性欲冲动之为本能有其明显的标志，这是从盲目性、自动性和不教而能來說。”（詹姆士：“心理学原理”，英文版，卷2，437。）右派分子也說，性爱是共同的本性。詹姆士又說：“父母对兒女的爱是一种本能，妇女方面又强于男子，至少在所爱的对象还在兒童早期时是如此。”（前書，頁439）右派分子也說，母爱是共同本性。盖茨說，“受到威脅时或受到伤害时，有逃走的冲动”。（盖茨：“教育心理学”，英文版，頁187。）右派分子也說，乐生惡死是共同的本性。杜威主张，人們需要某种亲交犹如需要飲食一样，出諸于人类的本性。（杜威：“人类的問題”，英文版，頁184。）右派分子也說，共同的人性在追求誠摯的爱。杜威主张，建設和生产的本能在兒童和青年时期，要依照社会的方向，得到訓練。（杜威：“学校与社会”，英文版，頁38——39）右派分子亦主张追求自由劳动是共同的人性。

說性爱母爱等是共同的人性，这并非实用主义者和右派分子特有的主张，可是，实用主义者和右派分子由于彼此立场相同，却借此故意抹杀人的階級性，（即階級社会中的人性）来达到他們反动的政治目的。实用主义者还主张人类具有“占有”的本能，說什么资本主义私有制即根源于此，所以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廢的。我国右派分子在解放后的新中国，不敢公然露骨地販賣这种謬論，却偷运其他的私貨，企图以其“共同人性”的“理論”来模糊階級界限，掩飾階級矛盾。他們要使人发生錯誤的看法，以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具有“共同的人性”，彼此本質上是相同的；所以地主階級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不須脫胎換骨，彻底改造，只須发扬其“共同的人性”，即能“自觉轉变”。资产阶级分

子及其知識分子凭借这种“理論”，来抗拒思想改造。其次，右派分子以“誠摯的爱”“追求自由劳动”等詞句来美化“人性”；他們脫离了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来修談抽象的人性，借此来掩盖階級社会中剝削階級所具有的丑惡的階級性（即剝削階級的人性）。有的右派分子虽然表面上承認階級性，但把階級性当作“共同人性”以外的附加物，依他們說来，階級烙印只能盖在皮肤上，不能盖在思想上，那末，資產階級分子及其知識分子的彻底改造，岂不是輕而易举或者根本是多余的嗎？

右派分子这一套“理論”是站不住的。他們所謂“共同人性”分析起来，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人的动物性，如性爱母爱等；第二部分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才能产生的社会性，如爱劳动等。作为动物体的人，身体发育到一定程度，会发生男女之間的性爱，生了孩子之后，撫爱孩子，这是人所周知的。可是，人是社会的动物，又是在一定社会經濟制度之下生活的动物，性爱与母爱决不能离开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这些动物性必定具有社会的内容。韓非子說过：“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則相賀，产女則杀之。”解放前的旧中国，二千年來有一部分人还保留了溺女嬰的惡俗。这岂不是絕對违反母爱么？原因何在呢？这就要从社会历史条件方面的解剖，才能說明这个問題。在原始公社时代，在共产制家庭經濟中，女性屬于同一氏族，男性則分屬于不同的氏族。女性在氏族中掌握統治权是为母权制。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原始共产制的生产关系起了变革，母权制也隨之而摧毁。恩格斯說：“母权制的顯复，乃是女性所遭受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失敗。丈夫在家中已掌握了管理权，而妇女則失掉了自己的荣誉地位，降为奴婢，变为男子泄欲的奴婢，变成生孩子的簡單工具了。”（“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卷2，頁215）“最初在历史上出現的階級对立，是跟專一婚制下夫妻的对抗状态的发展相一致的，而最初的階級压迫是跟男性对女性的奴役相一致的。”（前書，223頁）从中国历史，亦可以看到，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代，重男輕女是个通例，男孩子生下之后則“弄璋”，女孩子生下之后則“弄瓦”，男兒可以“光大門楣”，女兒只是“賠錢貨”。在旧社会中，溺女嬰的惡俗，長期保留下来，主要的原因，即在于此。只有在生产資料公有制的新社会中，階級压迫不复存在了，妇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才可以和男子一样享受教育，参与政治，才可以自由地参加社会劳动，男女之間，这才达到真正的平等，父母

才不致歧視女孩。实用主义者和右派分子离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而喋喋不休地強調“共同人性”，究能說明什么問題呢？

关于性爱，人的性爱不同于其他动物的性爱，因为人的性爱是要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而表现的。原始时代存在过杂乱的性交、血緣家庭、“普那路亞”家庭、对偶家庭。随着物質生活条件的发展，原始共产制的解体，两性間原始的素朴的关系就逐渐消失了。在階級对立的社會，女性亦受到男性的压迫，奴隶主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以妻妾为泄欲的工具，更有妓女，供其取乐，一般說来，夫妇没有什么純洁的性爱。欧洲中世紀的武士爱，也是私通有夫之妇，极力破坏夫妇貞操的。恩格斯說过：“当作一种情欲，并且是每个人的（至少是統治階級中的每个人）能享有的情欲，当作肉欲的最高形式（这也就是它的特性），而第一个出现于历史上的性爱形式，即中世紀的武士爱，决不是夫妇爱。……而詩人們且对之加以歌頌。”（前書，頁227）现代資本主义国家，男女間有所謂“自由恋爱”；但資產階級，不劳而获，飽暖思淫，他們男女之間，一般說来，沒有純洁的恋爱。有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我們的資產者并不因为有其工人底妻女供其支配而感到滿足，更不用說公开的娼妓制度了，他們还以互相引誘彼此的妻子为特殊的快乐。資產階級底婚姻，在实际上是公妻制。……跟着现存的生产关系的消灭，从这生产关系所发生的公妻，即公开的与不公开的娼妓制度，也便会消失。”苏联和中国等屬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国家的建立，废除了資本主义的私有制，娼妓制度即行废止。妇女解放了，男女平等了，这才为男女間发生純洁的性爱，創造了良好的条件。右派分子和实用主义者的真正意图，在于通过对性爱这一类的社会现象，以強調不同階級的人有共同的人性，以否定階級社会里的人們的一定的階級性，然而他們却无法掩飾資產階級性爱的表现也盖上了資產階級的烙印。

右派分子更加荒謬的是把“追求自由劳动”“追求誠摯的爱”作为“共同人性”，他們离开一定的社会物質生活条件，抽象地肯定人性的内容。試問在階級对立的社會，站在不同階級立场的人，相互之間怎能建立誠摯的爱呢？說到人是否“追求自由劳动”？也要看人处在怎样的社会制度之下才能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从人类演进史来看，类人猿能够轉变为人，关键在于劳动：“劳动創造了人类本身”（恩格斯語），也只有人类才能从事社会化

的劳动。人类通过劳动，取得必需的生活资料。在社会发展史的各个阶段，劳动的形式各有不同。原始公社时代，生产资料公有，人们进行共同的集体的劳动，劳动果实为公共所有。原始公社崩溃以后，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都存在着对抗的阶级，生产资料为少数人所掌握，这些人不劳而获，而且鄙视劳动。绝大多数人则从事劳动遭受到残酷的剥削，在这种奴役性的劳动生活中，他们诅咒劳动、憎恨劳动，还谈什么“追求自由劳动”的人性。只有剥削阶级被推翻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起来，生产力大大发展、技术不断改进，劳动足以创造丰富的消费品，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与文化水平，不断提高，人们才自然倾向于喜爱劳动。在高度生产技术的条件之下，创造更多的消费品，使社会主义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人们由“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而过渡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热爱劳动，才必然成为人性。马克思说过：“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当那奴役人们，迫使其服从社会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后；当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已随之消失后；当劳动已经不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已成为乐生的第一要素时；当生产力已随着每个人在各方面的发展而增高，一切公共财富源泉都尽量涌现出来时，——只有那时，才可把资产阶级式的法权的狭隘眼界完全克服，而社会就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卷二，页23）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们进行自觉的、自愿的、不计较报酬的、为公共谋幸福的劳动，“这种劳动是健康的身体的自然需要。”（列宁）在这样的时代，劳动才成为人性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右派分子认为资产阶级分子有“追求自由劳动”的本性，实用主义者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有生产的“本能”，这是毫无科学根据的。

二、关于党性和人性的问题

实用主义者杜威攻击马克思主义：“一个更为正确的批评，是马克思主义系统地漠视人性方面的任何东西，不把它作为一种有效的因素看待，除非它原先是由生产力的状态决定了的。马克思主义要求代替乌托邦社会主义，就把心理的和道德方面的考虑都抛弃掉了。”（“自由与文化”，英文版，页98）右派分子也说：“共产党六亲不认。有了党性就没有人性。”杜威诬蔑苏联：“对所有持异

议者进行无情的迫害和判罪。”（前书，页90）

“一个极权的统治，由于掌握了人民的情感、欲望、情绪以及意见，乃控制住人民的整个生活。”（前书，页11）右派分子也说，“现在人与人冷酷无情”，“共产党讲党性讲得五情六欲都绝了缘，一个个象小尼姑小和尚一样。”“一加入党，即好象装死的样子，毫无人情味道。”

杜威之流为什么要如此恶毒地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呢？右派分子为什么也要如此恶毒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呢？苏联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保障革命果实、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鼓舞了全世界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革命情绪和对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心。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照耀全体人类前进的灯塔，苏联共产党创造了为各国兄弟党所取法的许多经验，苏联坚持和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成为保卫全世界和平的堡垒。喝血的美帝国主义者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仇视苏联；杜威之流是美国统治集团的代言人，也是国际垄断财团的代言人，“桀犬吠尧，这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资本主义所有制已经废除，生产资料归于公有，资产阶级右派不甘心于接受改造，妄图死灰复燃，他们也念出“人性”“人情”等符咒，来掩饰自己，施放毒箭，其攻击的主要目标，就是党的领导。

上述实用主义者和右派分子的谬论，歪曲事实，更显出其反动的和反科学的性质。我们试就人性和党性来分析一下。我们知道，人类从事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不特改变了自然，也改变了人类本身；大脑及其他器官发展了，体质也变化了。人类由于不断的实践活动，通过大脑反映客观世界；认识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能力、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提高了。人的本性即指反映客观世界的意识倾向以及改变自己及其生存条件的能力。再则，人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之下生活的，人们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为了共同进行生产活动和相互交换共同活动的产品，彼此发生一定的关系，是为生产关系。从社会发展史来看，有的生产关系是剥削和被剥削、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有的是不受剥削的人们彼此合作和互助的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关系，构成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活动，人们的好恶、习性、倾向，以及改变自己、改造世界的能力，主要

是决定于本身所处的社会关系。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并不是个别的个体所具有的抽象屬性。就其现实性來說，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卷二，頁四〇三。）这是完全正确的。在階級对抗的社会，对抗的階級有对抗的意識傾向，这是什么道理呢？我們可以說，各个对抗階級对生产資料有不同的关系，因此彼此在社会生产的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在社会劳动組織中所起的作用，領得社会財富的方式和多少就有所不同。剝削階級所站的地位是占有生产資料，对劳动人民进行剝削；而劳动者則被剝夺了生产資料，在經濟上处于附屬的地位，不能不付出剩餘劳动，以供剝削，这是資本主义社会两个对抗階級各自的基本特征。占有生产資料的階級，人数虽少，但生产和国家事务的管理权，操在他們手里，他們成为統治者和压迫者，享有絕大部分的財富；多数人受其剝削、受其統治，成为劳苦貧困的被压迫者。这两个階級的利益，始終是互相矛盾的，始終进行經濟方面政治方面的階級斗争，也进行思想斗争，在思想意識方面形成尖銳的对立。例如資本主义社会，資產階級占有生产資料及劳动产品，剝削工人階級的剩餘劳动，从事买卖和竞争。这样的地位和实践使他們养成投机取巧、殘酷壟断、自私自利、唯利是图、恬不知耻、穷奢极欲……的本性，这就是資產階級的階級性，也即是資產階級的人性。现代資本主义的生产企业，巨大而集中，各个部門，分工細而联系密，工人階級出卖其劳动力，从事于这样的生产，备受剝削与压迫，养成憎恨剝削、反抗压迫、依靠組織、重視紀律、以及大公无私、与一切被压迫者团结互助的精神，……这就是工人階級的階級性，也即是工人階級的人性。

党性是什么？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党性，党性是階級性的集中的最高的表现。共产党的党性是无产階級的階級性的集中表现和最高表现。共产党是以科学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武裝起来的队伍，階級观点明确，階級立场坚定；它又是具有严密組織、严格紀律、統一意志和崇高的集体主义精神的队伍。实用主义者和右派分子以“人性”为武器，誹謗共产党，归根結底是攻击党的工人階級立场。党掌握了社会发展的規律，領導人民廢除資本主义私有制，消灭剝削階級，以解放全人类，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

伟大的目标。而实用主义者和右派分子是怎样的人呢？他們是“违反历史发展的方向，在新制度产生以前，頑固地维护旧制度，在新制度产生以后，破坏新制度，企图恢复旧制度，把社会拉向后退”（1957年9月15日人民日报社論）的反动派。党所站的是工人階級立场；实用主义者和右派分子所站的是資產階級立场。右派分子攻击共产党“六亲不認，有党性沒有人性”。所謂沒有人性，不是别的，即是沒有資產階級自私自利頑固反动的階級性或人性。地主階級以及資產階級对于反叛了本階級而投身革命的兒女，視之为寇仇；劳动人民立场坚定具有党性的人，对反革命的親屬，負責检举。两两对照，这分明是立场問題。众所周知的一个右派头子，弟为共产党员，早死，遺下孤兒寡母，这个右派头子，待之异常刻薄；其他右派分子損人利己，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他人痛苦之上者，比比皆是。这不是資產階級人性的具体表现嗎？共产党员为了革命事业，为了保卫和平，为了救死扶伤而牺牲自己生命者，不可胜数；为了社会主义的建設，鞠躬尽瘁，进行忘我的劳动者，更不可胜数。这种为了崇高的目的而作自我牺牲的精神，是党性的高度表现，也是人类最崇高的道德情感的表现。在党領導之下，农业生产合作化了，反映到意識方面，农民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互助友爱的精神。例如广东花县象山乡高一农业社有六个社員，最近为了把一个社員从死亡中救活过来，輸出了大量的血，發揮了高度的階級友爱的精神，使人觉得社里的溫暖，胜过家人（1958年2月10日南方日报）。这样的事迹，真是俯拾即是，而且“方兴未艾”。試問在旧社会中能够想象得到嗎？这就說明，在新社会中生产关系改变了，人性也是要随着不断改变的。

右派分子在那里詛咒：“现在人与人間冷酷无情”这句话所反映的是什么？是党的队伍以及党所領導的劳动人民，敌我界限分明，經常保持警惕，不容許右派分子以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乱說乱动，如果乱說乱动，人民即予以反击、检举、和制裁。

从此，我們可以看到，右派分子和实用主义者，同样站在反动的資產階級立场。右派分子的人性論，传播了实用主义者的毒素，对党对人民施放了一支毒箭，消毒的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对广东教育的影响及其批判

張其光

全民整风运动正在深入展开，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获得重大胜利，今后还要继续进行。教育工作者必须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作不调和的斗争。应该承认，我们教育界受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观点的影响是很深的，其主要根源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入侵。因此，彻底清除帝国主义给我们教育的遗毒，是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作斗争分不开的。尤其是我们要贯彻毛主席指示的教育方针，培养受教育者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就必须把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遗毒从根拔掉。这是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上的严重斗争。

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广东受害最早，受毒也最深，广东人民精神上所受的麻醉与毒害特别厉害。毛主席早已指出：“帝国主义列强在所有上述办法之外（按：即指外交、军事、政治、经济上诸种办法之外），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

①在广东，帝国主义在文化教育上的侵略所采取的办法，和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这样，不过更加积极更加露骨罢了。英国教徒玛礼孙（Robert Morrison）是到来广东传播基督教和创办学校的第一人，他未到中国便学会了中国语言，于1807年9月由美国国务卿马第孙（Madison）致书美国驻中国领事的介绍，从纽约到了广州，澳门。②1817年玛氏创办了英华书院于澳门。到1842年（五口通商条约订定以后）才迁到香港。这个英华书院的目的：

“在使西士得攻中文，华士得习西学。”③因为文

化教育的侵略，不得不首先从沟通语文入手。进一步就是吸引留学生到外国去直接接受奴化教育。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就是在澳门先入英教士古特拉富夫人所办的西塾而后转入玛礼孙学校，再到美国耶鲁大学留学的。帝国主义吸引了中国留学生，而后又利用留学生回到中国来进行教育上的侵略，广东在这方面受害最深。

容闳是广东香山县人，他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特别是留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事业”对于广东教育的影响更为深远。1867年曾国藩接受了容闳的建议，开办兵工学校。接着容氏又向曾国藩提出了“教育计划”，主要是倡议“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备人材。”结果，1870年在上海设立预备学校，先后招了四批学生，预备期满，陆续派送，其中多数是广东人。容闳在“西学东渐记”这样写：“当1871年之夏，予因所招学生未滿第一批定额，乃亲赴香港，于英政府所设学校中，遴选少年聪颖而于中西文略有根柢者数人，以足其数。时中国尚无报纸以传播新闻，北方人民多未知中政府有此教育计划，故预备学校招考时，北人应者极少，来者皆粤人，粤人中又多半为香山籍，百二十名官费生中，南人十居八九，取是故也。”④

容闳不仅是派遣留学的倡议者，还亲自筹办留学事务所。可以说，容闳正是第一个力主“全盘西化”的人物，后来广东文化教育界有人提倡“全盘西化”，不过步其后尘而已。容氏自述：“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按：指美国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利益，以西方之学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600页。

② 张星烺：欧化东渐史，33页。

③ 谢洪资：中国耶稣教会小史，51页。

④ 容闳：西学东渐记，109页。

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溯自1854年予毕业之时，以至1872年中国有第一批留学生之派遣，则此愿之成熟时也”①。可是他这种愿望很快就受到打击。清政府派到美国充任留学事务所的监督陈蘭彬、吴子登等人是些保守派的人物，他们极力主张撤回留美学生，对容闳大肆攻击。从容闳指責吳子登所制造的“謠言”看来，就是这一事实的反映：“学生在美国，專好學美國人為運動遊戲之事，讀書時少而遊戲時多，或且效尤美人，入各種秘密社會，此種社會，有為宗教者，有為政治者，其皆有不正当之行為。坐是之故，學生絕無敬師之禮，對於新監督之訓言，若東風之過耳，又因習耶教科學，或入星期學校，故學生已多半入耶穌教。此等學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國，必致全失其愛國之心，他日縱能學成回國，非特無益於國家，亦且有害於社會，欲為中國國家謀幸福計，當從速解散留學事務所，撤回留美學生，能早一日施行，即國家早獲一日之福”②。我們從容、吳之爭可以看到：美國教育對於我國留學生，并不如他們所幻想的能夠“使中國日趨於富強”，“為中國國家謀幸福”。雖然中國當時封建官僚地主階級的確曾經這樣想過，後來甚至明确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教育方針政策，無奈帝國主義偏要實施“全盤奴化”政策。美國資產階級的教育家們知道了清政府撤回留美學生的消息，就表現得很緊張，立刻聯名寫信給中國總理衙門（即外務部）極力反對。現節錄這封信的“精辟”之語，以與吳子登的“謠言”對照來看，便可以看出問題。這封信是美國耶路大學校長朴德（President porter）的手筆，他寫道：“……貴國派遣之青年學生，自抵美以來，人人能善用其光陰，以研究學術，以故于各種科學之進步，成績極佳，即文學、品行、技術以及平日與美人往來一切之交際，亦咸能令人滿意無間言。……今乃忽有召回之舉，不亦重可惜耶？……某等因對於素所敬愛之貴國學生，見其忽受此極大之損失，既不能不代為戚戚，且敝國無端蒙此教育不良之惡名，遂使美利堅大國之名譽亦受莫大之影響，此某等所以不能安緘默也！……”③這是美國教育對於中國留學生的毒害陰謀被戳穿以後的一種強烈反響。

以後，美國吸引中國學生赴美留學沒有放鬆，這里單從1921年至1925年廣東留學歐美學生統計可以證明④：

年份	美	法	英	德	菲	澳洲	合計
1921	8						8
1922	21			5			26
1923	11		1				12
1924	4	3					7
1925	22	9			1	1	33
合計	66	12	1	5	1	1	86

這里顯示着廣東留學生大部分是被吸引到美國去了。

帝國主義對中國進行文化教育侵略，採取極為陰毒的辦法。美國國會於1908年通過了退還一部分庚子賠款，指定用作派遣留美學生的經費。此外，帝國主義還以“慈善”的“救濟”的“傳道”的性質，募捐款項，供給教師等等辦法，利用“高等華人”在中國設立學校，這些措施簡直以廣東作為他們的侵略的“試點”。

中國封建官僚、地主階級對於帝國主義的文化教育侵略很早就採取投降妥協的政策，這和他們整個對外政策毫無二致。1919年出版的“嶺南共進會年刊”中有一篇“本校設立外史”，反映了清末廣東官紳如何奴顏婢膝地勾結美國人來開辦嶺南學校。這是廣東教育史上一篇重要“文獻”，值得全文抄錄：

“嶺南學校，人知其為美國人所創辦矣，而不知三十年前吾粵人士誠懇請求美國慈善家開辦本校于廣州。茲得陳少白君交來舊札一通，署名者四百餘人，內翰林十人，進士十一人，舉人秀才逾百人，顯官亦逾百人，實代表廣東全省民意請求本校設立于廣州者。此西曆1886年事也。書曰：

公啟者：吾粵地處海濱，勢居澤國，愧非文人之藪，難逢特達之材！多士攻帖括以冀科名，眾庶狙故常而忘考綜，蓋久矣。竟尚詞章，習焉不察矣。近年潘燁琴少習成有請開藝學一科之奏，實有以見夫格致之益，而欲嘉惠士林者也。惜廷議以既有同文諸館，自可論才擇彥，未奉准行，誠為憾事！然教化之任，董卒雖自朝廷，轉移要由草野，如得有心人勤求厥始，力任其艱，又安見人才不蒸蒸日上哉？夫格致之道，固聖賢入德之初基，即所以為誠正修齊治平之本。古人

① 同上書，27頁。

② 同上書，121頁。

③ 同上書，127頁。

④ 摘自舒新城：近代中國留學史，227頁。

入小学而通六艺之后，則从事于格致者，岂茂鮮歟？貴国哈巴教师老先生，乘鐸东来，宦游粤省，久于其位，展二酉之經綸，澤及斯民，发五車之蘊蓄，吾粵人士，咸感其沾溉之广且远焉。去岁因聞以玉体违和，言旋錦里，乘便集有巨款，欲汇来粵，創設中西格致書院，以育英髦而培实学，恩明誼美，莫过于斯！某等分忝縉紳，情关桑梓，遙聞盛举，大慰私衷！想締造之雄規，拭目以俟。冀栽培之雅化，如愿以償，此不独同人所翹企，尤为合省之瞻依。專此敬請列位董事大人道安！伏維鑑照不宣！——广东閩省紳耆公启。”

这个“文献”证明了一个事实：广东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如何欢迎帝国主义文化教育的侵略；而在教育思想上又如何充分反映了他们企图把封建主义教育与资本主义教育捏成混血兒，以适应实现广东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过程。

国民党反动派勾結帝国主义实行奴化教育更加明目张胆，不仅为帝国主义大开方便之門，而且簡直奴顏婢膝，無論学制、課程、教材、教育和教学方法都照样搬用。在一些教会学校还公然設置外国人担任“監督”，真正要做到“全盤奴化”。稍能正視现实的教育家如陈青之（还不是进步的教育家）也不能不承認：“中国自創行新教育以来，到现在（按：指1935年）已有六十多年了，教育宗旨与制度，虽屢經变更——始而襲取日本，繼而襲取美国，有时还取德法——但对于社会产业的发展及民族习性的改革，毫无帮助。”^①而他还没有确切地指出这种奴化教育对于中国人民的严重危害，他更没有認識到这是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勾結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精神方面施行麻醉和毒害的必然結果。

觉醒的中国人民曾經如同反对教权一样，掀起过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享有办理教育的特权。当时的政府在人民的推动下也不得不制訂一些并未認真施行的“取締教会学校办法。”（1925年6月广东教育厅公布）。早在1923年10月，广州圣三一学校学生为学校禁止学生組織自治会、提前放假、开除学生等問題，全体反抗，发表宣言。1924年广东学生还組成收回教育权运动会。1925年广东政府于是召开收管教育权會議。到了1927年1月16日，广州私立嶺南大学由紐約董事局代表決定交回中国人办理，原有董事局改为“协进会”，另由中国人十三人，美国人五人組織新董事会，执行該大学之最高管理权，实际上仍旧是美国人所掌握^②。可见当时

所謂反对外人教育权运动終於在国民党政府控制之下实行妥协。

总之，事实表明：解放以前，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凭借政治、經濟的力量，在中国（特别是在广东）教育事业上占有很大势力。直到1949年广州还有大批外国教会支配下的学校，其中有大量的学生。根据1950年11月的統計，广州教会設立的初等学校数目及教职員学生人数如下：^③

完全小学			初級小学			幼稚園			
校数	教职員	学生	校数	教职員	学生	园数	教职員	学生	
28	361	5027	6	35	490	單設	附設	39	1,227
						1	14		
教徒	205	741	教徒	16	16	教	徒	14	46

当时公立小学只有94所，与教会小学成3:1；公立小学学生总数为31,585人，与教会小学学生成5.6:1。此外还有大量私立小学受到教会学校的深刻影响，就是那些公立学校在解放前也是竞相向教会学校“看齐”，学习教会学校的洋化。

中等学校方面，1931年1月向广州市人民政府登記的外国津贴学校共有19所，其中接受美国津贴的有15所；接受法国津贴的有两所；与美、英、加等国津贴有关的有两所^④。这些外国津贴的中等学校，比之公立中等学校多及4倍。在解放前，好几間教会中学如培英、培正、培道等校被視为“著有成績”的优良学校，吸引了不少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女爭相入学，許多公私立中学都把它們看作榜样，“社会輿論”也把它們推崇备至！——这种錯誤的观念，直到现在某些教师、学生和家長的思想中还没有完全澄清。

如果可以把18年美国人在广州創辦嶺南学校作为分界綫，那么，在这以前，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采取吸引和利用留学生作为文化教育上侵略的主要途径；而在这以后，就主要是采取派遣人員，进行办学投資，設立学校，来达到直接占領教育陣地了。

① 陈青之：中国教育史797頁。

② 丁致聘編：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紀事，112、118、123、125、137等頁。

③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編：广州情况調查160頁。

④ 引自广州市教育局档案：接受外国津贴教会学校登記工作情况报告。

一百多年来，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特别是对广东）在教育上的侵略所造成的祸害是非常深重的，尤其是在教育思想方面遗毒最深。

清末不少改良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曾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起过重大的进步作用，但客观上也起了有利于帝国主义文化教育侵略的作用。这样的历史人物在广东就有好几个。容闳是输入西洋教育的倡议者已如上述，还有何启（广东南海县人）、胡礼垣（广东三水县人）、郑观应（广东香山县人）、康有为（广东南海县人）、梁启超（广东新会县人），都以“创办新学”，“讲求西学”著称。他们的论调是大致一样的，不外提倡“宏学校以图强”的教育救国论。康有为所谓“才智之士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梁启超所谓“变泆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何启、胡礼垣在“新政论议”更讲得彻底，他们说：“今之改革，将以常胜之道为国，而立中国于不败之地，则必先有能立中国于不败之人乃可，此非宏学校不能也。”^①这些议论，实质上传播了资产阶级教育学的教育万能的观点——这是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对于几十年来教育思想有了极坏的影响，它的遗毒使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阴谋认识模糊，并模糊了对社会阶级斗争的认识。

在教育学说上反对阶级论，反对阶级斗争，而提倡阶级调和，传播“超阶级论”，这是资产阶级反动教育学的精髓。旧中国许多所谓教育学家成了它的俘虏，其中还有人极力企图把中国古代儒家教育观点同现代资产阶级的反动教育观点加以揉合，宣扬什么“中国民族教育哲学”。这里所指的就是曾在广州中山大学担任教育学教授多年的崔载阳。1937年他出席巴黎国际初等教育及民众教育会议所发表的演讲，是充分暴露这位教授的反动教育思想观点的供词。广东教育界不少人直接或间接受过崔氏的反动教育思想的影响，今天应该剖视一下他的“中国民族教育哲学”的实质到底是什么？

崔载阳从“教育的特质随民族的特质而变异”这一荒谬的立论出发，论述中国的民族及其文化的特征。他说：“中国立国至今五千年，当东西各国尚未开发的时候，中国文化已高度发展和自成类型——一种人生协进的类型。中国数千年来，政治上没有固定的特权阶级，官吏从民众选举考试出来，人人均有前途，有朝代鼎革而无阶级革命；宗教上没有斗争，彼此均可同时存在；经济上历代皆力求

均等，限制多占田地，并且重农抑商，以防阶级的分裂；种族上不是绝对和议，也不是绝对斗争，而是彼此协和，共存相安；后来承平日久，武备废弛，异族多次入侵，然因民族胸襟之大，度量之宏，可以包六合而育万物，故结果终能融合为一。凡此种种，都是中国民族协进人生之具体的表现，亦即是各国历史所无的中国民族文化之特征。”^②——根据这个荒谬的逻辑前提，肆意歪曲中国民族历史事实，抹煞中国历史上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从而主观主义地描述一个所谓“新教育体系”。他说：“中国民族一个精神健全规模宏大的新教育体系，此刻虽仍在创造中，但显然已有其轮廓可寻。就是今后中国民族的教育目的，决不会偏于极端个人主义或社会主义，而必是大众协和主义。别方面亦不会极端偏于自然主义或理想主义，而必是绵延上进主义。其次中国的学校制度，将来必非纯粹的单轨制或双轨制，而必是合两者之长，孕育成功一种新的制度，一方发展各人的特长，促进社会的向上进步，同时使教育机会均等，增进社会的和协平衡。至于教育行政，也不会绝对的分权或集权，而必采上下各有其权责的均权制。课程也不会有儿童中心与成人中心之对抗，而必归于二者之不断的综合与调和，教育方法必非绝对的团体或个人化，而必为个人与团体协同创造的方法。此其所以然，自出于中国现代生活之急切的需要，亦即出于固有的民族协进精神之最高的要求。”^③非常显明，这种“协进主义”的教育哲学是彻头彻尾的折衷主义和调和主义的反动哲学，是资产阶级教育学家所标榜的“非政治的”、“超党派的”教育的谎话。崔载阳跟别的偷运帝国主义货色的教育学家一样，生怕被人拆穿他们的洋奴面孔，总要說成我国“古已有之”，企图把“洋货”涂上“民族精神”。所以崔氏推崇孔子为协进主义的祖师，“他的‘己立立人，已达达人’和‘不独成己，所以成物’的名训，后来配合上中国民族史地上的实际环境，协进精神乃长足发荣滋长。……孔子这种代表人类正常心理需求的协进人生，决不会因社会环境之变迁而湮没，反之，他将更能永存而不朽，历久而常新。”^④折衷主义与“中庸之道”本来有其共通之点，这就

① 引自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262、376、190等页。

② 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出版，崔载阳：中国民族哲学，3页。

③ 同上书，5页。

④ 同上书，3页。

十分方便于资产阶级教育学家的胡謔。

培养怎么样的人——教育的目的性的规定，这是教育的根本问题。我们且看崔载阳在这个问题上所持见解又到底是怎样的？他说：“中国数千年来的教育制度虽代有变迁，具有创见的大教育者虽代有其人，然而他们所培植长养的，与所要尽力教育的，无非这种协进的人生。所谓圣贤、仁人、君子，不过就是具备这样人生态度的模范人格，亦即是‘天地为怀，民胞物与，日新又新，自强不息’的模范人格。”^①究竟什么是“协进的人生”？我们说，无非是逃避革命斗争、脱离政治的“贤人君子”，这是封建主义教育的传统，中国买办资产阶级企图继承这个传统，作为服膺于帝国主义教育侵略的掩饰。这是比之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更加深化的投降妥协的教育方针的发展。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教育家们接受这样的历史教训：顽固地“保存国粹”，拒绝西洋文化教育已经失败了；赤裸裸地“全盘西化”，公开贩卖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是非常不得人心的。这是崔载阳标榜“中国民族教育哲学”，企图建立“新教育体系”的奥秘。正因为广东旧教育的买办性特别严重，所以那些“教育家”特别强调“民族本位”，“民族特征”，表面上似乎很难理解，但只要深入地研究一下，便可以发现它的欺骗性。因为他们所谓“民族特征”是“协和竞进”，简直没有阶级斗争，教每个中国人培养自己的“协进的人生”，千万不要也不必过问政治。中国民族既然有着这样的“特征”，当然是先天地非常适合作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对象了。这种“民族教育哲学”就在理论上替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输入铺平道路，扫除阻力。

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引导青年脱离政治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这种帝国主义奴化的遗毒，在这次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中得到显明的暴露。华南师范学院的一张大字报是个突出的例证：“马列主义一向强调立场，什么工人阶级立场。其实哪有阶级、立场这类东西，这明明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这是煽动人类互相进行残杀。人类是热爱和平，不要战争的，而马克思却把人类分为各种阶级，说他们之间有矛盾，要进行阶级斗争，这实在是太残酷了！”^②应该说，这是长久以来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反动教育家们所培养出来的一株毒草。如果我们不认真加强对青年一代的阶级观点的教育，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这些毒草就不可能彻底铲除。

帝国主义奴化教育和贩卖他们的教育观点的反动教育家所给予广东教育界青年界的遗毒，还在于

十分普遍地培养了个人功利主义思想，以获得知识作为取得功利的手段。1952年广州市中等学校教师暑期研究班思想改造运动中反映了教师们的思想情况：“运动中多数教工对自己的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能做到大胆暴露、深刻批判，反动思想中以崇美、恐美思想最为普遍，占总人数的88%；其次是有同情地主的思想的占36%；有反共疑苏思想的占27.5%；有‘正统’，‘变天’的思想而较为突出的，占19.5%。错误思想中以享乐思想最为普遍，占总人数的43%；其次是雇佣观点占41.4%；个人英雄主义占37%；自由主义占31%；有纯技术观点的占23%；表现较为突出的则为资产阶级的腐朽、黄色思想，占31%。（以上数字以思想类型统计，每人都有几种程度不同的思想类型。）”^③由此可见帝国主义文化教育侵略对于广东教育界的恶毒的影响多么深重！解放以来的八年多，广东（广州）教育工作者有了很大的进步，可是从这次反右派斗争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仍然是很严重的，证明了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教育上的遗毒的必要性。

教师对于学生的影响无疑是十分重大而深远的。但从根本上看来，到底是帝国主义教育侵略对学生的毒害。1950年抗美援朝运动中，广东、广州学生对于美帝国主义罪行的控诉，大量揭发了教会学校和其他学校的奴化教育的事实。最突出的是学生中提倡“美国生活方式”。当年在广州“联合报”刊载的“从广州真光中学四十多年校史看美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是一篇生动的惊人的报导。其中一段提及：“在校内提倡‘美国生活方式’；在课程中有一科是‘美国礼仪’，专教同学如何接待朋友，如何布置舞会，如何应付异性朋友，如何食西餐。在家政科中，教煮西餐，做西饼，制西服，布置西式房间。图书室里，全是美国书报杂志。娱乐方面，校内经常放映美国黄色电影，使学生不知不觉模仿了美国明星的装束和姿态，羡慕美国的物质文明。”真是流风所及，至今未已！应该看到，目前青年学生中资产阶级思想的某些严重表现，就是一百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遗毒未清。广州第22中学以前就是真光中学，1956学年度根据学校的报告学生品德上存在“四大严重”：偷窃严重，破坏公物严重，旷课严重，乱搞男女关系严重。经过一年多大力加强教育才获得改进。我们可以体会到

① 同上书，4页。

② 华南师范学院编：《谬论汇编第一辑》，20页。

③ 广州市教育局档案：1952年中等学校教师暑期研究班思想改造运动工作总结。

教育战线上的斗争任务是艰巨的。

学生对于学习的目的缺乏正确的认识，从而学习态度、学习方法不够端正，对于毕业后的出路问题的错误思想，也是和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影响有着很密切的关系。陈青之于1936年对旧中国的学生的求学心理作了概括的描写，他说：“试任意找一在学儿童，问他为什么进学校？他一定回答：‘为求资格’。试任意找一将要毕业的儿童，问他毕业后之志趣如何？他一定回答：‘志在升学。’……这种心理不仅普通学校，就是不得已而任职业学校或师范学校，还是为求资格；如有机会时，其志仍在升学。学生以升学求资格为目的，父兄以此相期许，国家以此为奖励，社会以此相看待；由是‘升学主义’与‘资格主义’成为国人一般的心理，成为学校内普遍的要求。”①陈青之指出了这种现象，但他的观点还是错误的，他认为：“这种心理，惟封建时代的社会才能产生，以封建时代的心理应用在现代学校教育，这是国人对于教育最大的错误。”其实，封建时代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种心理之所以能够在“现代学校教育”中牢固地保存下来，正是帝国主义侵略实施奴化教育的必然结果。因为学生在求学上的“升学主义”，“资格主义”都不过是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这种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存在和发展，是十分有利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的。由此可见：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所进行的教育侵略，事实上一方面排除足以阻碍其奴化教育的封建时代的教育上某些优良传统——如勤劳朴素的培养；另一方面则保存而且发展有利于他们实施奴化教育的封建时代的反动教育思想，“唯有读书高”的“升学主义”便是主要之点。

帝国主义奴化教育当然还不止于极力保存封建时代教育上的糟粕，更加有害的还在于以资产阶级的办学观点支配一切教育事业、教育工作。教育商业化，知识商品化，正是资产阶级教育的主要特征，所以过去广东、广州私立“学店”多到惊人，原不足为奇。这种残余还是至今未已的！帝国主义的教育投资，其本身带着商业性质和政治性质的目的。美籍牧师斯密斯在他所著的“今日中国和美国”一书中作了自供。他说：“那一国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的中国青年，那一国就能由这种努力取得在精神上和商业上最大的收获。……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用一点钱，是合算的，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有效。”②这是多么毒辣的阴谋！更加可恨的是国民党反动头子、前中山大学校

长戴季陶竟然在岭南大学公开向美帝国主义歌功颂德。他说：“最初中国没有科学的教育，没有规模宏大的学校，外国人到中国以后，尤其是基督教徒，做了不少的教育事业，好比这里（按：指岭南大学），那么大的地方，林荫草绿，通路是水门汀做的，房子是宽敞的楼房，学生宿舍、教员宿舍，均很齐备，能容纳许多学生来学。这是那里来的？是美国人帮助中国人的。……③这样肉麻的话本来很难进入觉悟的中国人民的耳鼓，可是也的确曾经在广东教育界青年学生界中起过一定作用。现在还有一些人叹美教会学校校舍的精美呢！我们不同这种思想遗毒作斗争，我们又何能贯彻社会主义办学观点，提倡勤俭办学？那种美妙的现象所掩藏的丑恶的本质，必须揭穿。同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遗毒作斗争更要注意及此。

三

综上所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入侵后对于中国（特别是广东）教育上的毒害及其恶劣影响，至今遗毒未清，大大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贯彻。为了“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就必须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作坚决斗争，同时必须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遗毒。

直截点说：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欺欺人的所谓“超阶级的，非政治的”反动教育观点；认真贯彻人民教育事业的阶级路线，加强阶级观点的教育，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使教育者与被教育者都不断地提高社会主义觉悟。

我们必须正确掌握教育的目的性，反对培养年青一代成为好逸恶劳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少爷，认真教育他们真正成为新型的劳动者，坚决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切实贯彻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的革命教育伟大措施。

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观点和办学原则，反对华而不实，讲求排场，显示阔气，浪费人力物力等等资产阶级的办学作风，认真实行勤俭办学。

清除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遗毒愈认真愈彻底，我们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建设成就便愈加能够做到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1958年2月21日

① 陈青之：中国教育史，797页。

② 引自1950年12月15日广州联合报“从广州真光中学40年校史看美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

③ 岭南大学出版，高冠天编：岭南大学接回国人自办之经过及发展之计划。

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

董修智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为了推翻社会主义，为了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企图使资本主义复辟，他们从各个方面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在这个斗争中，他们运用了各种各样的反动的思想武器，修正主义就是其中之一。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曾指出：“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者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哪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前一个时期，文艺界的右派分子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向社会主义文学的猖狂进攻，否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根本的原则，否定社会主义文学，这些都是右派分子利用修正主义文艺思想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表现。在我们的文艺队伍中，也有一些人由于过去长期受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想和文艺思想的影响，他们在革命斗争中又还没有彻底改造自己，所以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们便很容易受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有的还积极宣传修正主义思想。这些人虽然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有所不同，但他们既然做了修正主义的俘虏，或竟积极宣传修正主义思想，那末实际上，他们也就在理论上支持了右派分子对党对社会主义的进攻。文艺思想的修正主义者，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而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所以，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是当前文艺战线上最危险的敌人。

在我们广东地区，也象全国的其他地区一样，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曾经一度猖狂。本文将主要分析和批判这一地区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表现，并将着重在几个比较根本而又影响比较广泛的问题上，以便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和修正主义划清思想界线。

修正主义既然集中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来“修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达到他们从根本上否定和取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目的，他们就不得不首先来攻击文学的党性原则。文学的党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灵魂。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的或集团的赚钱的工具，文学事业是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是共产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必须受共产党的领导和监督。正是由于共产党的领导，保证了社会主义文学成为真正为千百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文学，成为真正自由的文学，从而得到空前的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学的辉煌成就已经为此作了充分的、实践上的印证。不能说，修正主义者连这一点都不懂得，但他们还是故意闭着眼睛，拚命攻击文学的党性原则。所以这样，无非是想取消社会主义文学，将社会主义文学引向资本主义文学的道路上而已。

最露骨的是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会员、右派分子陈善文，他在“挖掉教条主义的社会根源”^①一文中，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以挑拨的口吻，肆无忌惮地攻击党对文教事业的领导。他说：“教条主义的灵魂不只是藏在一些报刊评论里面，而且是更广泛地存在于各种场合、各种关系和各种交往中。”他大叫大嚷教条主义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种可怕的习惯势力”。于是，这位“理论家”就来找寻教条主义的“社会原因”，他说：“教条主义在文艺界变成一种社会力量，是有复杂的社会条件的。……这种社会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首先在于领导。在于地方党委地方团体的领导。”

^① 见“广州日报”，1957年5月15日第3版

我們文艺界是否有教条主义的表现呢？有的。教条主义是否應該反对呢？應該反对。但是，教条主义不是党的领导的必然产物，相反，教条主义是和党的领导，和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党任何时候都要反对教条主义，而且只有由党来领导反对教条主义，才能反得彻底。即使个别文艺工作的领导同志可能有教条主义，甚至可能有比較严重的教条主义，但最终也必然会被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批評教育所克服。右派分子陈善文所反对的其实并不是什么教条主义，他是要“挖掉”文艺工作的党的领导。所以他在說明党的领导是教条主义产生的“社会原因”以后，便得出这样的結論：“反对教条主义必須挖掉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但是，挖掉教条主义的社会根源，我看也十分重要。必須不讓教条主义沾什么便宜，必須使人不必跟教条主义走……”。陈善文就是这样明目张胆地号召作家离开党的领导，离开社会主义，在文艺上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反党分子易巩也是一样。他把党的领导說成是“凝固的社会力量”，是“教条主义、煩瑣公式長期以来在文艺界形成了一股仿佛不可动搖的势力的根本原因之一”；說党的领导造成了“宗派排斥”，有人被打得抬不起头来。所以他要求党中央检查各部門的思想作风，其实是要取消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讓作家去“自由創作”。

修正主义者拚命反对党对文学事业的领导，其原因上面已經談到，是因为党的领导保证了文学真正为千百万劳动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保证了文学的真正繁荣，而这正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仇視的，也是修正主义者所不喜欢的。

党性原則宣布了文学艺术与无产阶级的公开的联系，与共产党的政策的公开的联系。文学艺术是經濟基础的上层建筑，是为經濟基础服务的。在阶级社会里，任何文学都是有阶级性的，都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无产阶级为了推翻资产阶级的統治，埋葬资本主义社会，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不能不动員一切力量，其中也包括文学和艺术，更自觉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而服务，不能不要求无产阶级文学和艺术必須有自己的鮮明的党性立场。党性原則正是在无产阶级自觉地起来进行革命斗争的时代提出来的，它要求作家在对待现实生活时必须要有明确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在理解和评价现实生活时，必須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拥护人民的利益，所以文学的党性是文学的人民性的最高表现。封建阶级的文学，资产阶级的文学，即使在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初期，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由

于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它們都是剝削阶级），决定了它們的进步性仍然是有限度的；就是說，它們始終无法改变其为剝削阶级服务的本質。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有那些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的作家，才是人民所爱戴的、真正伟大的作家。

只有无产阶级作家，馬克思主义者，才敢于公开地宣布自己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联系，公开地宣布自己与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政策的联系。这是资产阶级的作家、理論家所拚命反对的。但是，资产阶级文学也是有自己的党性的，只是他們不敢明白宣布自己的党性，而且不得把自己的党性隱蔽起来，因为在人民面前公开主张为剝削阶级的利益服务，同时又指望能获得人民的同情，那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修正主义者还高唱什么“創作自由”的調，仿佛党的领导会妨碍創作自由似的。“創作自由”的口号，资产阶级不知道重复多少次了，今天的修正主义者还是用它作武器，来“修正”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則。这个口号的虛伪性，已經是尽人皆知的了。修正主义者應該知道，今天在美、英帝国主义統治下面，进步的作家和作品，总是受到无情的迫害、扼杀的，只有那些宣传战争狂、通奸、卖淫、偷盜的“作品”才有自由，只有黑腥腥任意涂抹出来的“作品”、驢子的尾巴胡乱揮舞出来的“作品”才有自由。列宁說：“资产阶级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員底自由，不过是戴着假面具的（或者虛伪地戴着假面具的）对于錢袋的依賴，对于收买的依賴，对于豢养的依賴。”^①修正主义者們，你們想用来“修正”文学的党性原則的所謂“創作自由”的口号，难道不是这样的貨色嗎？无产阶级作家坚持文学的党性原則，因为只有它才能保证作家有真正为人民服务的自由，保证作家真正有个人創造，个人爱好，个人风格的自由。

修正主义者胡調什么文学的党性原則、共产党的领导产生“宗派排斥”，这种謬論，必須加以严厉批判。党性原則在于它的思想的意义，而不是作家和艺术家与党的組織关系。正如法捷耶夫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所指出的：“……我們說到苏联文学的党性，我們指的是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就是苏联作家，无论是党员作家或非党员作家，都承認共产党的思想是正确的，而且在創

① 列宁：“党的組織和党的文学”

作上捍卫着这种思想，所以很自然的他們也承認党在文学事业里的领导作用。”^①所以，文学的党性原则，共产党对文学的领导，不但不会造成“宗派排斥”，相反，是使文学真正与人民群众发生深刻联系的唯一保证。列宁说：“艺术属于人民。它必须在广大工人群众中间有其深厚的基础。它必须为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深植在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愿望中，并与它们一同成长。它必须鼓励和启发群众中的艺术家。”^②这一切，只有无产阶级党性的文学才能做得到，因为它不是为了贪欲和野心，而是为了鼓舞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它必然会团结广泛的作家，并吸引一批又一批新的力量参加到自己的行列中来，解放后仅仅八年多的时间，在我国的工人、农民和部队中，已经涌现了为数不少的作家，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

有些人在反对“组织创作的方法”的幌子下，另外一些人则在“文艺创作不能用行政干涉”的幌子下，反对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和监督。这些人表面上虽然没有反对党性原则，但他们的理论的实际效果却是对党性原则的否定。因为党对文艺的领导不能是抽象的，他们既然反对党对创作的领导，还不是反对党的领导吗？组织创作是为了更好地反映我们生活中不断涌现的新事物，反映我们生活中本质的、主流的东西，使我们的文学更加接近发展着的生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更大的推动作用。过去的组织创作工作不能说没有一点缺点，但因此而整个反对组织创作的方法，实质上是对于党对文艺工作领导和监督的否定。

文艺问题当然不能用行政命令干涉，但对于文艺问题的争论，特别是对于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的争论，到一定的时候由党的领导来做出结论，这却是完全必要，完全应该的，这正是党对文艺领导的具体表现。但是，有些人却把党的这种领导看成是“行政干涉”。例如对粤剧“山东响马”的争论，一些戏改工作的负责同志对于党的领导所作出的结论，采取反对和不执行的态度，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时，公开表示不满。现在已经很明白，关于“山东响马”的争论，实质上是关于粤剧改革的方向问题的争论，对于党的领导所作出的正确结论，这些同志所采取的不满和不执行的态度，难道能够说是反对什么“行政干涉”，而不是反对党的领导吗？

修正主义者企图“修正”文学的党性原则的一切论据都是荒谬的，这一切，只能说明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文学的仇视。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的

任何“修正”，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企图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提供“理论根据”。不是无产阶级的党性，就是资产阶级的党性，这中间是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的。

二

在文艺的工农兵方向问题上，修正主义者也提出很多“修正”的理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根据文学必须“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党性原则的规定，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确定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他指示我们要为工农兵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否则便不可能为工农兵服务。所以他号召作家参加工农兵群众的火热的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因此，对于工农兵方向的拥护或反对，实际上考验了人们是否具有无产阶级立场，是否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描写和表现工农兵的问题，我们过去曾经和胡风派的反动理论作了长期的斗争，今天，修正主义者也没有忽略这个问题，可见这个问题的重要。“写什么”的问题是属于题材问题，作品的艺术价值当然不能由题材决定，还要看作家“怎样写”，看他是否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是否有艺术才能。但过去的胡风派也好，今天的修正主义者也好，他们完全否定题材的意义却是错误的。过去的伟大作品，富有高度人民性的作品，总是由于它们反映了当代的深刻的社会矛盾，提出具有全民意义的问题，而且站在进步的理想的立场来阐明它，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够接近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修正主义者否定题材的重要意义，不过是为反对描写和表现工农兵来寻找借口，而其实质则是为了否定文艺的工农兵方向。

周围在“为什么华南的创作实践与创作力量不相称”^③一文中，为他的污蔑党，污蔑新社会的小说“老油条”辩护，说：“……我认为应注意的是：‘老油条’犯了当前文艺界的三大清规：党的领导，光明面，正面人物的形象问题。我知道棍子是非打下去不可的”。很明显，周围把要求在作品中描写党的领导，描写光明面，描写正面人物的形象看作是“当前文艺界的三大清规”，可见他是反对

① “苏联人民的文学”下册，第454页

② 蔡特金：“列宁印象记”，三联书店版，第18页

③ 见“广州日报”，1957年5月9日第3版。

在作品中描写党的领导，描写光明面，描写正面人物的形象的。关于描写党的领导、描写光明面这两个问题，已经有不少文章批判过，这里只想分析一下关于描写正面人物的形象问题。关于描写正面人物的形象问题，与周围的观点相同的还有易巩，他主张英雄总是有缺点的，象胡风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一样，他认为可以写有缺点的英雄。他们的“理论”虽然在字面上不同，但都是对于描写正面的英雄人物的否定；不过一个是从反面，一个是从正面，结果是殊途同归。

创造我们时代的正面的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首先是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在文艺创作中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既然取得无比辉煌的成就，这些辉煌的成就，都是和那些在各项建设工作中所涌现出来的千千万万的先进人物分不开的，他们用自己的忘我的劳动，带动了广大的人民群众，从事前人所没有做过的光荣豪迈的事业。如果我们的文学不能表现积极的创造者和生活的改造者的英雄形象，那末它就不能算是很好地反映我们社会生活的真实，它就要脱离广大的人民群众。我们的文艺作品必须描写正面的英雄人物，首先是工农兵群众的英雄人物的崇高品质，描写他们光辉灿烂的人格，作为人民群众学习和仿效的模范。如果我们的文艺作品不去描写正面的英雄人物的崇高品质，而热衷于描写反面人物，热衷于描写英雄人物的非阶级本质的缺点，那末它就不能达到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目的。所以描写正面英雄人物的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文学的教育作用问题，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文学的工农兵方向问题。

这样说，并不等于我们主张只能写正面人物，不能写反面人物，只能写没有缺点的“理想人物”，不能写英雄的缺点。但如果我们的文艺作品中充满着反面人物，充满着有“缺点”的英雄人物，那末它将引导读者到什么地方去？这样写，它就会脱离我们社会生活的真实世界。因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不正是已经涌现和正在继续涌现千千万万无愧于英雄的称号的人物吗？

历史上的许多伟大作家，他们都有崇高的美学理想，但他们往往不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美，只有在揭露生活的黑暗面时才能把他们的美学理想体现出来；有时候他们不得不把他们的美学理想表现在幻想的形式里。法国著名的画家德拉科化说：“在我们的社会中，情形是这样的，到处是司空见惯的贫乏，微末可憐的满足，美是只能偶然发生的。但

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仍然可以借表现生活中否定的事物激发读者的美感。”

资产阶级文学在资产阶级还处在革命的时代，曾经创造过自己阶级的英雄。但是发展到今天，资产阶级文学已经无力创造真正的英雄人物；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任何进步的理想，所以资产阶级文学现在已经没有英雄人物，有的只是匪盗流氓式的人物。

社会主义文学却完全不是这样。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类的优秀代表者们的理想已经变为现实，社会主义社会在本质上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美好的事物在社会主义生活中每天每小时地产生着。作家只要面向生活，并真实地反映生活，就能够揭示生活中的美，表现出积极的创造者和生活的改造者的英雄形象。

由此可见，修正主义者反对写正面的英雄形象，强调写有缺点的英雄，不过是为了否定创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否定工农兵方向，企图取消文学的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任务而已。他们之所以认为英雄总是有缺点，那是因为他们用资产阶级颓废主义的观点来看待新社会的新人物，其目的是歪曲我们时代的英雄人物的形象。周围的“老油条”中的李志光正是这种“理论”的产物。周围把两种极端相反的品质赋给了李志光，一方面，李志光是一个反官僚主义的英雄，一个关心人民疾苦的党的工作者，另一方面李志光又是一个随时随地反领导的无政府主义式的人物，一个颇近于残酷的人物；但周围却把他当作一个我们时代的真正英雄加以歌颂。这说明修正主义者是用资产阶级所谓“双重人格”的反动观点来看待我们时代的英雄人物的。

对于工农兵方向的“修正”或否定，还有各种各样的论调。例如有人把“只许写工农兵，只许写新社会，只许写新人物”等等对于题材问题上的清规戒律，对于工农兵方向的片面观点加以拼命的夸大，认为是“笼罩在作家、艺术家头上的乌云”，只有“把笼罩在作家、艺术家头上的乌云冲散了”，才能“给作家、艺术家展示出创作题材的宽广自由天地。”并因此得出结论：“创作题材的宽广与狭窄问题，是决定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或是萎缩沉寂的最基本最关键的问题。”

有人把某些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本原因”，肯定是由于“文艺作品题材范围狭窄、单调，创作风格不够多样化”，而这，又是“由于过去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以及对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理解存在着教条主义和片面性”。在这里，隐隐约约透露出这样的思想：仿佛是工农兵方向和社会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束缚了作家的创作，使创作产生了公式化、概念化；仿佛要去掉它们，创作才能解放。

这种看法当然是非常错误的，是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不相一致的。毛主席教导我们：“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①所以，他号召作家全心全意深入工农兵群众的火热的革命斗争，去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去获得创作的原始材料，这样才能创造出真实地反映工农兵群众的好作品。

工农兵群众是我们社会生活的主人，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担当者，他们的生活和斗争是异常丰富的。在这里，作家可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题材，只要作家真正深入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就根本不可能发生题材狭窄的问题；相反，正是描写和表现工农兵群众，作家才有创作题材的宽广自由的天地。与此相关联的是公式化、概念化的产生问题。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产生，原因当然是很复杂的，但主要的原因，却是由于作家没有很好地深入工农兵群众，在深入工农兵群众中很好地改造自己的立场、观点，对工农兵群众的斗争、思想感情缺乏深刻的认识和感染。怎能说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产生是由于“只许写工农兵”的结果呢？总之是作家的世界观和生活经验的问题，绝不能认为是“只许写工农兵”等等清规戒律束缚的结果。这种观点实际上否定了作家深入生活、改造思想、描写和表现工农兵群众的意义。

深入生活和改造思想的问题，不止是作家、艺术家获得创作题材的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它的意义要广泛得多，深刻得多。它关联到作家、艺术家和人民群众的联系问题，关联到文学和艺术的发展问题。所以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把它作为一个根本问题提出来的。不可否认，近几年来，我们的文艺创作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和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相比，它仍然是落后于生活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食粮的需要的，必须进一步去发展文艺创作，以赶上

生活的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要解决这个任务，主要的不是靠创作题材的宽广，靠多创作一些风景画，爱情诗等作品可以达到的。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有其客观的社会原因，过去历史上任何一次的文学繁荣，直接间接都是由人民群众的进步的革命斗争所促成的，只有人民群众变革现实的革命斗争，才是文学艺术发展和繁荣的肥沃土壤。作家、艺术家的主观努力，他的艺术才能当然不能抹杀，但任何作家、艺术家如果脱离生活，脱离人民，他就决然写不出成功的作品。只有那些和人民同命运、共呼吸的作家，能够站在当代进步思想的水平上，来观察生活，反映生活，并在创作上表现人民思想和愿望，才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

社会主义社会较之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具备发展和繁荣文学的条件。永远摆脱了剥削和压迫的劳动人民，正在以他们全部的劳动和智慧来建设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工作中，都有着那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等待着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去把它描写下来。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只要深入生活，只要具有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把工农兵的斗争和生活真实地反映出来，就有可能创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作品。

三

片面地强调作品的艺术性，否定作品的思想性，也是近年来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一种表现。周围就有这样的论调：“把深入生活，变成培养作家的全部的唯一法宝，就不对了，我们在掌握这一点上，是偏了的，所以技巧问题、作家的学习修养问题就没有再去好好研究。好象只要下去就全部解决了，这是不对的。深入了实际生活，而脱离了文艺生活，就片面了。”^②他强调作家的技巧修养，否定深入生活的意义，实际是否定作家思想改造的意义，本质上也就是否定作家的进步思想倾向的重要意义。有些人强调艺术特征，把强调思想性一律斥之为“教条主义”或“庸俗社会学”。有些人则把艺术风格看作是作家、艺术家的“艺术生命”。

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否认艺术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在作品中不是互相孤立的两个东西，而是不可分割的统一的整体。作品的思想不是抽象的教条，作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2页

^② 见“为什么华南的创作实践与创作力量不相称”一文

家不是把思想变成演說一样的东西，强加在讀者的头上，而是用真实的，使人发生美感的艺术形象来感染讀者。另一方面，作品的艺术性是体现思想性的，否則，它就要变成形式主义的东西。所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要求是“政治和艺术的統一，内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統一”①。但修正主义者却把艺术性孤立起来片面强调，其目的是否定文学的思想内容，在今天，实质上是企图取消我們的文学的社会主义思想内容。

我們認為思想性和艺术性在作品的統一关系中，思想性是根本的，起决定作用的；沒有高度的思想性，就不可能有高度的艺术性。作家的先进的世界观是作品的艺术性的基础。修正主义者單單强调技巧的修养，否定作家深入生活，改造思想的意义，說明他們并不懂得艺术性。艺术性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它是指作品通过完整而生动的艺术形象和性格来深刻地概括生活真实。如果作家善于把

生活真实体现在生动鮮明的艺术形象里面，那他就会使他的作品具有真正的艺术性。作家的世界观越先进，他对生活的观察就越深刻，他的艺术才能也就会越发展。可见这种孤立地强调艺术性的修正主义观点，不过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理論。

文艺思想上的修正主义也反映在文艺批評的實踐上。最明显的是关于“山东响馬”的爭論。在关于“山东响馬”的爭論中，許多人对于“山东响馬”的肯定都是从表现形式，表演艺术等等出发的，对于戏本的思想内容則故意回避或說得模凌兩可。經過这次粵剧界整风学习會議上的討論和批判之后，問題的实质已經非常明白了。

文艺批評必須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对于这个批評原则的任何“修正”，都是离开馬克思主义的，在这里又得到一个很好的例証。

① “毛澤东选集”第3卷，第871頁

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界討論五年研究规划

2月3日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召集省、市各有关單位負責人举行會議，布置編制广东省1958—1962年科学工作规划后，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已成立临时科学规划小組，負責組織科学家进行編制规划工作。編制哲学社会科学5年研究规划問題，正分門別类进行討論和研究。规划小組分历史学、哲学、法学、政治經济学、教育学、語言学、考古学、圖書館学、民族学等学科分別組織力量，草拟各科学的研究规划。现在，各学科都举行了一次至二次的座談会，对5年研究规划提出了初步意见，其中考古学、历史学、法学、教育学、語言学等学科已拟出研究规划的初步方案，提出研究的重要項目，如考古学根据广东近年来重要文物的发现，即新石器时代遗址、古墓、古建筑及古窑地等方面，提出五个中心問題：（一）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包括研究广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域特征及其分布状况；广东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广东新石

器时代物質文化的发展和当时居民的社会經济生活及其与中原銅器时代和早期鉄器时代的关系；結合海南島少数民族地区的調查发掘資料，研究少数民族的族源及其历史发展；广东新石器时代的物質文化与鄰近各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比較等。（二）結合古墓葬的发掘，研究中原汉族在政治經济文化上对广东古代文化的影响；和各时代物質文化的发展及其地方特征；（三）研究广东古代城市的发展、居民生活及其在中外交通貿易文化上的关系。（四）研究广东地区古代建筑的地方特征。（五）研究广东陶瓷手工业的发展。

为了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密切配合社会主义生产建設大跃进的要求，編制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跃进规划，目前各学科正在根据大跃进和多、快、好、省的精神、进一步深入研究和修改5年研究规划，將于最近提交广东省科学工作會議討論修正。（見軍）

幾年來廣東省文物工作的成就和一些問題的研究

高承祚

文物工作是社會文教事業中重要的一環，它不僅為科學研究工作提供必要的實物資料，同時是對廣大人民群眾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一種有效手段。因為一切文物都是人類勞動的成果，即使是最平凡的，最普通的，沒有文字記載的文物，都凝結了勞動人民的智慧，反映了古代人民在和自然鬥爭、階級鬥爭中的某些跡象。蘇聯的考古學者就靠那些平平無奇而層出不窮的石器、陶器寫出了蘇聯石器時代的歷史，如果我們對文物不加愛護，尤其是那些看起來很平凡的石器、陶器認為“無足輕重”，聽其自然或人為的加以破壞那就會造成難以估計的損失。因此重視文物，保護文物，是我們每一個人應有的責任。

中國共產黨一向是重視文物的。遠在抗日戰爭時期，在後方根據地為保護金代刻本的大藏經而犧牲了一些英勇的八路軍戰士。1950年以後，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了一系列的保護文物法令與辦法。1953年以後，全國基本建設工程蓬勃展開，1955年全國農業合作化高潮的到來，中央都曾頒布了配合基建和農業工程的保護文物法令，特別是後者，國務院於1956年4月頒布了全國文物普查的通知；通知強調了普查並經複查肯定了重要文物單位，上報國務院列入國家保護單位。可見黨和政府不僅是重視保護文物，而且有着學術調查與歷史研究的長遠打算。這種全國性的文物普查工作，使廣闊的祖國大地上古文化遺迹的分布情況了如指掌。這一重大的措施，不特是我國從未有過的盛舉，即使資本主義國家也是決不可能有的。

可是右派分子如陳夢家之流，却歪曲事

實，否定成績，極盡造謠誣蔑之能事，他們說政府“視寶藏如廢物”，把解放以來黨所領導的文物事業說成“今不如昔，黑漆一團”，“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向黨猖狂進攻。作為一個考古工作者，我有責任來反駁右派分子的謬論，在這裡我重點地敘述一下廣東省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文物工作的情況，就足以揭穿右派分子的別有用心的謊言。

廣東的文物普查工作是分若干階段進行的。初期主要工作為調查省內各縣的名勝古蹟，搶救和進行征集文物工作，成立鑑定組，協助海關鑑定出口文物。此後，在田野考古調查方面，曾在潮州、揭陽一帶發現了19處以上的新石器時代文物遺址。1956年組成文物工作隊，由於農業合作化的高潮到來，為加強配合重點水利工程及其他農業生產建設，進行了文物普查工作。6—8月，以汕頭、惠陽兩專區三十個縣為重點區，並組織了社會力量，與中山大學歷史系教師及同學共同合作。1957年3—5月，配合廣東省第一屆文物幹部訓練班結業後在佛山專區十六個縣（市）進行文物普查工作。6—8月，與中大歷史系，中國科學院廣東分院，華南工學院，組成海南行政區的文物普查工作團（內分革命文物普查及考古普查兩個隊），在海南二十一個縣（市）進行文物普查工作。9月，與華南師範學院歷史系和華南工學院到韶關專區英德四個縣進行普查。幾年來廣東省文物工作主要可分作六方面：

甲、革命文物的征集

廣東是近代、現代革命運動的策源地，

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历次革命运动留存下来的文献、实物和革命遗迹，都是研究中国近代、现代革命史和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最有价值的东西。1957年在番禺、珠海、恩平、翁源、英德、清远等县，对自鸦片战争以来历次革命运动和革命遗迹进行了调查登记和征集工作。此外，还在湛江专区对1898—1899年遂溪人民抗法斗争的史迹和海南地区现代革命运动的史迹进行了专门的调查访问和革命文物的征集、登记工作，计共登记了各种革命遗迹98处，土炮、土枪、宝剑、碑刻、证章、旗帜、各种文献材料等革命文物326件，各种访问材料约100多万字，其中有不少是极其重要的。如在三元里抗英斗争遗址调查中，除了调查社学遗迹外，又发现了“创建西湖社学碑记”（已残），“太和市联开社学序”，“创建东平公社碑记”两块，“创建升平社学碑记”，“复建三元里古庙碑志”，“重修三元古庙碑志”，“重建三元古庙碑志”等。

在海南岛的工作分为9项：（1）海南岛现代革命斗争概况，（2）白沙黎族七月起义事迹概况，（3）陈继虞民军起义事迹调查，（4）从五四运动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海南岛的学生运动，（5）海南岛妇女与海南岛现代革命，（6）华侨与海南革命的关系，（7）母瑞山老根据地的调查，（8）六连嶺老根据地的调查，（9）美合老根据地的调查。这些专门调查初步整理的访问材料达100多万字，登记了各种革命遗迹80多处，征集了各种革命文物170余件，详细的报告目前正在整理中。

乙、第四纪古生物化石的发现

在高明、龙门、阳山、河源、高要、顺德发现了第四纪的古生物化石20余处，其中在顺德县发现有熊猫牙齿化石1枚，螺化石20多枚。在高要七星岩作了一次发掘工作，根据初步统计，属哺乳类动物牙齿的有猪、

箭猪、牛、羊、鹿、剑齿象、獾、虎、猴等；属水生类的有龟甲、蚌壳、螺壳等，此外尚有許多脊椎动物骨骼化石。这些化石在古生物学上是有一定的价值的。

丙、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

一、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类别和分布

广东境内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及遗物出土地点，初步统计共有539处，分布在全省四十六个县（市）。

在粤东区进行了两次较有计划的调查，共发现了文化遗址218处，分布在潮阳、揭阳等二十个县。

广州东郊遗址通称飞鹅嶺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个遗址面积很广，据初步调查，在盆地附近四周的小山冈上，共发现了22处，由东郊一直蔓延到番禺县龙洞乡。在这些遗址中，以飞鹅嶺、青山冈、菱塘冈、红石柱冈、明星冈、西冈坳、水路冈、大火镰冈、崩冈、鏊山、蟹山、林校标本园、旭园冈、村底岗等，蕴藏着丰富的文化遗物，为重要的遗址。

粤中区普查了新会、石岐、中山、珠海等十多个县，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53处，其中有不少是沙丘遗址，但石器出土，一般不太丰富。

粤北区普查了英德、翁源、清远、佛冈四县，共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111处。

海南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及遗物出土地点计135处，这些文化遗址均分布在河边、海边，及港湾的山冈、台地、沙丘、贝丘上。

遗址按地理环境大致来分，有山冈、台地、沙丘和贝丘四类，其中以山冈为最多，沙丘次之，台地又次之，而贝丘是最少的。

兹再将四类遗址情况分述于下。

1.山冈遗址：多位于河流附近的山顶平台或半腰上。从石器来说，除磷、斧外，鏃很普遍，式样繁多；靠近沿海的山冈，一般并出戈、矛。个别地区还出剑形式器、叉形器，鏃和棍、杵、圭、璋等，但未发现有骨制

器具。从陶器来说，夹砂粗陶、泥质和印纹硬陶均有，在地表情形则以出泥质陶和印纹硬陶为主，纹饰繁复。器形有缶、罐、碗、壶、盂、尊、碟、盆、豆、杯等。另外陶质（或石质）纺轮、网坠特别发达。装饰用的环、璜亦出有相当数量。

2.沙丘遗址：一般都在沿海积沙附近发现，磷很普遍，斧、镰、戈、矛数量很少，有骨制的镰、环、管、玦。各式各样的陶质网坠是其它遗址尚未发现过的（图1）。陶器，一般是三系，以夹砂粗陶为主；纹饰较为简单，以绳纹、方格纹或素面为多数。器形有缶、罐、杯等种。

3.贝丘遗址：在江河岸边，石器发现不多，除一般斧、磷外，未见有镰，但均出骨制磷和骨锥、针等。在贝壳堆里都有人类骨骼和兽骨，为这类遗址的特征。陶器，一般也是三系，而以泥质陶和夹砂粗陶为主；其主要纹饰为方格纹、雷纹和米字形纹。器形有缶、罐、豆、盘等种。

这类遗址在陶器上加挂陶衣的作风很普遍，最多的是夹砂粗陶；泥质黑陶于表里挂上了白色陶衣之后再刻画图案并加涂朱色，为别类遗址所未有的。

4.台地遗址：一般都在溪流旁边发现，且多与山岗遗址相连，这类遗址发现不多，所出的石器、陶器基本上与山岗遗址相同。

二、新石器时代遗物的分析

新石器时代的遗物种类很多，但按其原料和形制可分为两大类，即石器与陶器。

1.石器

石器大部分为磨制，间亦有小部分为琢制或磨制，打制石器与石片仅偶见几块而已。在石器类上有斧、磷、凿、镰、矛、戈、刀、圭、棍、杵、坠、铲形器、环、管、纺轮和礪石等，其中多数遗址按比例都是以镰为最多，磷、斧、纺轮次之。

在兴宁遗址中出大形石戈、石刀，全为磨、琢，与其它遗址中的石器形制不同。惠

阳戈的穿孔由一边穿透，技术精巧。增城骨磷一件，为长方形单边刃，琢磨非常精致。博罗的石矛，器身大而且较别的地方制作进步。海丰的管、玦，近于玉质，石磷最多，石斧次之。梅县的遗址中数量最多的是石镰，其次石环，斧、磷最少。

在广州东郊飞鹅岭遗址所采集到石器以有肩、有段、梯形、方形的斧、磷最多，也有凿、刀、矛、刮削器、镰、敲砸器、环、玦、磨盘和礪石、石片等，石器的制作绝大部分属于磨制。巨大的如双肩石斧、有段石磷、石器，多属精磨，少数琢磨，打制石斧或石片偶见一、二。而青山岗、菱塘岗遗址多出较大型的石器，种类繁多，村底岗出土的是较原始的石器，而其它各地与夔纹等印纹硬陶一起发现的石器多属小型，种类简单。石质有燧石、砂石、礪石等种。

海南地区出土石器中以有肩石斧、有肩石磷和梯形石磷占多数，分琢制和磨制两种，有的只磨光了锋口，有些则全身都磨得很光滑。制作石器的原料，有用灰色砂岩，也有用天然的灰色石条。

从以上情况看来，各区出土石器不同之点，值得我们密切注意的。

2.陶器

陶器分夹砂粗陶、泥质细陶和印纹硬陶三系。

（1）夹砂粗陶系：加入粗沙和草类的羸合料，火候很低，手捏即碎。胎色分黑、灰、黄、红；纹饰有绳纹、方格纹、划纹三种（也有素面无纹的），其中以黑、黄胎，绳纹、方格纹最常见。

（2）泥质细陶系：一般加入蚌壳末和少量细沙的羸合料，略含细砂，如泥陶。经过淘洗，则全无砂质，烧的火候稍高，较为坚硬。胎色分灰、黄、白、黑、红、褐红；纹饰有方格、篮、曲折、篛、旋螺、竹席、编织、乳丁、叶脉、双重圈、夔、雷、水波纹等。其中以灰、白、黄胎，方格、曲折纹最常见。

（3）印纹硬陶系：一般不加羸合料，

火候很高，質地堅硬，敲擊時發出清脆的鏗鏘聲。陶質分灰、褐、紫色，花紋和泥質細陶大致相似，其中以灰胎的方格、夔、雷紋最常見。

三種陶系中，以夾砂粗陶系時代較早，而印紋硬陶為晚期產物，但亦不是絕對的，而又並非每個遺址均有這三種陶系，如潮陽糞箕坑遺址則以夾砂粗陶系為主，泥質細陶次之，而無印紋硬陶系；葫蘆山遺址則以泥質細陶為主，印紋硬陶次之，沒有夾砂粗陶。有些在地面出現大量印紋硬陶，少數泥質陶，不見或少見夾砂粗陶；左宜恭山第三、五號探溝出土的468片陶片中，夾砂粗陶427片（占91.24%），泥質細陶28片（占6%），印紋硬陶13片（占2.76%）。其層次是硬陶居上，粗陶在最下層，從探溝層次來看，可以體會其年代的先後了。

陶器分手製、輪製兩種，紋飾以拍印為主，亦間有划篋、針刺和雕鏤等手法。器形有缶、罐、碗、豆、杯、盂、鉢、尊、盆、勺、紡輪、紡墜等十二種。從殘陶片中看到的口沿有敞口、敞口卷唇、直口、直口卷唇、圓口、斂口六種，其中以前二種最多。底部有圓凹底、圓底、圈足、附加圈足、平凹底、平底六種，其中以圓凹底最多。

陶器的圖案基本式樣是幾何形和編織紋（圖2）。最值得注意的是夔紋。夔紋用模印製成，分單綫與雙綫兩種，印面有凸地和平地雙綫的不同（圖3—5），它的出現年代較泥質陶夾砂黑色陶為晚，下限可能早於西漢。在飛鵝嶺附近的明星岡、村岡地面拾到帶釉夔紋陶片各一片，胎質堅實；明星岡的陶片兩面施釉，已有剝落，村岡的是單面釉，不但沒剝落且現冰裂紋，從剝落或冰裂的黃綠釉都可看出它的結晶半透明體，在許多新石器時代遺物中顯得特別突出，引人注目。這種帶釉的陶片是較為進步，年代可能晚些，廣州西漢墓葬中陶器上的釉正是這類質料，可是從未發現有夔紋的花紋。從這方面比對推測，它的下限仍然應該早於西漢。

這種圖案的陶片在廣東很普遍的發現。

據廣東省文物普查的初步統計，出這種花紋陶片的，有梅縣、清遠、翁源、興寧、龍門、潮陽、紫金、博羅、寶安、佛岡、連平、番禺、廣州等地。可是海南島卻沒有發現。

在南方沿海各省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中，普遍地發現印紋硬陶片，各地陶片的花紋儘管有很多是相同的，但卻沒有夔紋（據目前已發表的材料言），可見夔紋圖案是廣東地區所獨有的。而這種紋飾，顯然是仿自中原的商周銅器而加以簡化這對於研究廣東新石器時代文化與中原文化的關係上和年代問題上提供了很好的資料。

三、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特徵

在海南行政區，佛山專區和韶關專區的英德、翁源、清遠、佛岡、新豐江水庫一帶發現了新石器時代遺址及遺物出土地點319處，石器1,200多件，陶器及陶片2萬多件、片，青銅斧3件。其中以珠海華仔石村沙丘遺址，在灰坑的同一地層發現的幾何形印紋硬陶和罐、盆，以及釉陶的高足杯；飛鵝嶺明黑岡、村岡遺址的夔紋釉陶；翁源大江江頭山遺址的青銅斧、石器及幾何形印紋硬陶器，也同在一個地層中同出（圖6）。海南島瓊中縣斬對山的遺址中，在同一地層出現了石器和宋代瓷片等最為重要，它給我們第一次提供了廣東新石器時代人類居住地址——窖穴的形制和廣東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相對年代的新資料。

上述這些豐富遺物的發現，使我們認識了分布在佛山專區、韶關專區英德等四縣新豐江水庫一帶的新石器時代的原始居民，與汕頭、惠陽專區的原始居民雖然是幾種不同的種族（可能就是文獻記載的苗、獠、百越族），但有着相似的文化，过着相類似的經濟生活，而與分布在海南地區的原始居民則有較大的差異性。也就是說，在廣東大陸地區，他們普遍使用着各種方形、梯形、有肩、有段的石器（有段石器以廣東大陸的東、北部為多，中部及東南部近海地帶較少），而且有些磨得很光的戈、矛、圭、

璋、玦、环等石器(图7、8)。此外，他們还将各种不同的花紋印制在某一种的陶器上(一般而論，广东大陆的东北、中部的山岳地带所发现的陶器，多是以几何形印紋硬陶为主的，且常见有釉陶同出，稍南則是以泥質陶为主。东南部、中部的近海地带則多是以夾砂粗陶为主)，甚至还有青銅器。海南地区的原始居民，則多使用着方形、梯形及有肩石器，而不见有段石器。捕鱼用的網罟很多，而不见狩猎用的鏃。陶器則多以夾砂粗陶为主，泥質陶很少，几何形印紋硬陶最少，即使有，花紋也极簡單，未发现广东大陆所出与商周青銅器上相似的夔紋、雷紋等花紋，这就是較大的差异。

根据上述广东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和遺物的发现，及关于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問題，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材料来确定。但据现有的一些材料来推測，广东大陆的新石器时代与中原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相接近的几何形印紋泥質陶和夾砂粗陶这一种文化，可能相当于中原殷商时期或者稍晚一些；其与中原商周时代文化相接近的几何形印紋硬陶这一种文化，可能相当于中原春秋战国时期或者更晚一些，有些地区延續到西汉，海南島地区則延續到唐宋之間。

丁、古代墓葬

为了配合基本建設工程，保护文物，广州市由1953年1月到1957年12月清理了墓葬597座。在年代上可分为六个时期：两汉336(西汉196东汉140)，六朝180，唐48，宋8，元2，明23。

从墓葬的建筑，又可分为四种类型：土坑41，木槨219，砖室331，灰砂6。

出土文物总数共計16,500余件。質类分为：陶、瓷、玉、石、漆、木、金、銀、銅、鉄、鉛、綢棉織品、苧草、墨、瑪瑙、玻璃、水晶、珊瑚、云母、琥珀、松香、谷物等二十二种，其中以陶器数量最多。文物内容包括有日常生活用具、服装、美术工艺品、裝飾

品和居住、交通工具、人物、动物等明器。

一、两汉墓葬

1. 西汉墓葬

以墓的建筑結構来分，有土坑墓、木槨墓两类。土坑墓結構簡單，规模不大，随葬品少，一般約有十余件，多为陶器，大都屬西汉初期。

木槨墓又分为两种，第一种屬于早期，設有墓道，填土分細沙或沙土摻合并用；第二种早晚期都有，有一斜坡墓道；墓室呈長形，填土不一致，有时还使用原土回填，随葬品較丰富，由十余件到数十件不等，有的甚至多达200余件，物品种类复杂。

一般說来，西汉出土物品，陶器中有瓮、罐、甑、壺、釜、鼎、豆、釜、碗、盒、四联罐、五联罐、匏壺、奩、篋、四耳罐、三足壺、屋、廩、困井、灶等；銅器有奩、壺、扁壺、鑊、盆、釜、勺、印、鏡、劍、刀、灯、矛、戟、五銖錢、帶鈎。此外尚有石質的硯、壺、釜、鼎、甗、璧；玉器的璧、环、璫；琉璃的碗、璧、鈎、瑪瑙、水晶、珊瑚珠；漆器有耳杯、奩、匣、篋；鉄刀、鉄劍等。

2. 东汉墓葬

东汉墓有土坑、木槨和砖室三种类型，土坑墓很少。

木槨墓按其結構形制可分为三种：(1)墓室平面作長方形，分前后两室。(2)墓室分前后两节，平面如“丁”字形，墓內分前、中、后三室，前、中室与后室分为两級。(3)墓平面亦为“丁”字形，分为前、中、后三室，后室作上下两层不同的結構。

三种形制中以第一种最常见。

砖室墓的結構形制从平面布置来看，大致有五种：(1)小型砖墓多为長方形，單券頂。(2)“中”字形的中形墓，即在前端左右各附單券形耳室一間。(3)“十”字形的大型墓，頂为圓券。(4)“卍”形的大型墓，前室的左或右只有一旁室。(5)“卍”字形的双室大型墓。(1)(2)式結構

較簡單(3)(4)(5)式是大型墓結構复杂。墓內分羨道、前、后、旁室，作圓錐形凸頂与券頂相結合形式，封門作半圓形，或直封。

东汉墓出土物最丰富，陶制的为鼎、罐、盆、碗、勺、耳杯、鉢、案、盤、簋、奩、盒、壺、熏爐、三足釜、井、灶（附有釜和甑）、屋、車、船以及俑、猪、狗、牛、羊、鷄、鴨、鵝等。金屬器有銅鏡、劍、环首刀、簋、三足釜、碗、矛、戟、印、錢（“大泉五十”与“五銖”）；鉄刀、金指环和珠、薄金片。其它尚有漆器、木船、木屋、木仓、木桶与琉璃、瑪璃、水晶、珊瑚、琥珀、玉等裝飾品。

3. 汉墓明器

广州汉墓的出土明器有的很特殊，现将重要的介绍如下：

（1）屋有木質、陶質两种。

皇帝岡西汉木槨墓出土的木屋朽腐特甚，无法复元，残板有彩繪、雕空和图案形花紋。

陶屋发现的数量很多，一般說变化不大，类型也不复杂，归納起来有單間、干欄、曲尺、三合院、樓閣和城府等六式。

西汉后期的墓葬才有陶屋的出土，而最常见的还是东汉时期，以1953年两汉出土墓葬統計，西汉初期14座都沒有陶屋发现，西汉后期17座中也仅是7座中存有，而东汉时期的21座中发现陶屋的墓葬却有15座。

从陶屋的形式来看，西汉后期木槨墓最早出现是帶有很浓厚的少数民族色彩的單間“干欄”式，稍后是室后凸出一間廁所，再較后更发展到上层作曲尺形的“干欄”式，这时它的相对年代已到东汉初期了。在东汉初期还有曲尺式、三合院式、乃至樓閣式的，應該說这是个过渡阶段，而显得特別复杂、混乱，从砖室墓发现的各种陶屋造型来看，曲尺式是占了主要地位。我認为三合院、城堡等式較多量的出土，應該又比曲尺式晚些，時間上已是东汉末中期了。

根据全国文物工作者最近几年来的报

导，知道汉代陶屋的出土范围很广，东达辽宁，西至四川，南迄广东，北到甘肃、内蒙。从陶屋的外型比較看来，其建筑結構，花紋裝飾都有較相近似的地方，广州与湖南的耒阳，長沙市以及广西的貴县都属于一个系統，而广州的“干欄”式是耒阳、長沙市所沒有的，而貴县却有发现。耒阳、長沙市有單独的猪圈出土，广州至今尙未见到。广州陶屋形制的复杂又是貴县所不及。从这些就可以說明了它們之間有共同性，也有着地方性的特色。

“干欄”式的建筑虽不仅限于两广，貴州、云南也有，可是两广出土的“干欄”式陶屋是富有地方特色的。合浦县出土的陶屋比广州的还原始。这种形式出现在西汉末年到东汉初期的墓葬里，极可能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影响。史書上記載——

北史（卷95）蛮獠传：“（獠族）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欄。”

旧唐書（卷197）南平獠传：“（南平獠）人并楼居，登梯而上号为干欄。”

太平寰宇記（卷88）剑南道昌州风俗（下）：“（其地居民）无夏风，有獠风，悉住叢筍，悬虛構屋，号閣闌。”

桂海虞衡志：“（黎人）居处，架木两重，上以自居，下为畜牧。”

又說：“（僮人）民居苦茅为两重棚，謂之麻闌。”

續外代答（卷10）蛮俗条：“編竹苦茅为两重，上以自处，下居鷄豚。”

天下郡国利病書、广东（下）：“琼州府万州夷獠名曰岐人。……（其居）茅屋檐垂地，开門屋山头，內为水（木）栈居之，离地二、三尺，下养牛豕之类。”

由此可见“干欄”的异名很多，有“干闌”、“閣闌”、“麻闌”，是古代僚、黎、僮、岐族所居住的房屋，就是现今散布在广东、广西、貴州等省的黎族、瑤族、仲家、水家以及板瑤仍然居住这样的房屋，所以“干欄”式是受少数兄弟民族的影响而产生

生的，“干欄”也是西南中国的原始住宅的一种建筑形式，以后由于南北交通的发达，往来频繁，尤其是王莽末年中原大乱，汉人南迁，使中原的文化更大批的传播到南方，于是在建筑上起了改进、变化和发展，从干欄式逐渐转变为曲尺干欄式、曲尺式、三合院式一直到复杂的楼阁式。广东接受中原文化比西南其它各省较早，现在在地面上已很难找到“干欄”的遗迹，而在出土陶屋中显示了原始住宅的式样，这是非常可贵的。

在汉代一般劳动人民的屋居很简陋，瓦屋只是豪富之家才有条件建筑。吾丘寿王传（汉書卷64上）：“三公有司，或由穷巷，起白屋，裂地而封。”顏注：“以白茅复屋也。”张禹为下邳相时，“鄰国貧人来归之者，茅屋草廬千戶”（后汉書卷74，张禹传注引东观記）。鍾离意初到堂邑（案今江苏六合县）时，“市无屋，意出俸錢，帅人作屋，人齎茅竹，或持林木，爭而趋作，浹日而成”（后汉書卷71，鍾离意传注引东观記）。宋書（卷91）何子平传：“所居屋败，不蔽雨日，兄子伯兴，采伐茅竹，欲为葺治。”南方气候温和，多产竹木，就地取材，其值既廉，有利于貧人用做建筑材料，而“干欄”式的建筑材料，同等的用茅草竹木盖搭而成，后来发明了砖瓦，于是“干欄”渐变为平地的建筑，可是当时一般劳动人民仍以竹茅为屋，因砖瓦宅之兴建，动輒数千万錢的，我們从西汉末年的一些記載，如居延汉簡的“宅一区万”和“宅一区三千”，即可說明。还不止此，又如东汉熹平四年的郑子真宅舍残碑：“□所居宅舍一区，直（值）百万。”“子信舍一区万”（宋洪适“隶释”卷15）。

再以西汉当时的物价来計算一下，居延汉簡有“粟一石，直（值）一百七十。”一万錢可买粟近五十九石。汉書、食貨志上：“食，人月一石半。”年食为十八石，一万錢則可供給將近四个成年人一年的粮食，如果以每石一百七十錢計算，五十九石將近万錢了。

在汉朝，农民辛勤劳动所收获的劳动成果都被剝削階級所剝削，在平时已是“父子低头，奴事富人，躬率妻孥，为之服役”，全家大小为富翁工作才获得温飽，一旦遇着荒年，就“流离溝壑，嫁妻卖子”（崔实“論政”），又有什么条件和能力来修盖瓦屋，从这里又看到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生活的悬殊，形成显著的对比。

更重要的一点，从陶屋出土說明了时代的共同性，揭穿了“广东落后到唐代开元年間才知道建筑瓦屋”的謬論，并用事实反駁了把劳动人民創造的建筑类型、营造方式归于宋璟少数几个統治者身上的捏造。如：

旧唐書（卷96）宋璟传：“广州旧族（按：可能是越族），皆以竹茅为屋，屡有火灾，璟教人烧瓦，改造店肆，自是无复延烧之患，人皆怀惠，立頌以紀其政。”

新唐書（卷124）宋璟传：（开元初）广人以竹茅茨屋多火，璟教之陶瓦，筑堵列邸肆，越俗始知栋梁，利而无患灾。

唐顏真卿宋（璟）公神道碑（金石萃編卷97唐57）：彼（广州）之风俗，竞趋栝簡，茅茨竹櫓，比屋鱗次，火灾岁起，燬燼无余；公教之度材，变以陶旋，千甍齐翼，万堵皆兴，于今賴焉！燕国公张說尝为碑頌。

新唐書又說：楊於陵于元和初，“出为嶺南节度使。……教民陶瓦，易蒲屋以絕火患”（新唐書卷163 楊於陵传）。从开元到元和百年間，而以广州恩人自居的却有二人，又都以教民造瓦屋为其德政，千年后的今天，从发掘出来的陶屋証实了在汉代广州的人民早已知道建筑瓦屋。二十年前，广州东山寺貝底，发现了数以千百計印上各种不同的阳文篆字而屬于西汉时代的大瓦碎片，其中还有陶制的文字印模等工具，这一地带可能是当日瓦窰堆积遗址。陶屋以外的实物瓦片。又摆在我們的目前，統治階級的謊言污蔑不攻自破，其所謂恩人，不是封建統治者，而是劳动人民了。

(2)木仓:高架的棚寮式,各部分的構合是鑽孔后用竹釘釘牢。陶仓有不少的发现,又几乎和陶屋一齐出土。仓的平面成長方形,上盖为两坡式,前檐較大,后檐略低。在仓房底部对称排列圓孔六个或四个,插入木柱或陶柱,把建筑物高离地面,有通风隔潮的作用。

(3)漆器:出东汉木槨墓中的漆器,一般是木胎,也有夾紵胎的。黑漆面上繪各种顏色图案花紋,或以怪兽为主体,或以怪兽为中心花紋而繞以卷云紋,或以云紋为主流,而綴以奔馳的麋鹿,或以大型环綫紋卷云紋作地,点綴着羽人、怪兽、猛虎和飞翔的鶴,有的只繪渦形、菱形的图案。这些鳥兽的彩繪和美丽的花紋,精致而生动,虽与長沙市出土的战国和汉代漆器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亦显示出地方的特点。

(4)船:有木船和陶船之分,木船首尾部分翘起,有浪板,有中部的两艙和狹小的尾艙,前艙前有四木俑各持短槳,尾艙木俑持短槳以为舵(图9)。陶船头部有锚后有舵,两舷有司篙走道,船首两边安插槳架三根,艙艙橫架八木以为檐。船有三艙,尾有矮楼并陶俑。(图10)

(5)舞俑:細腰博袖,裙如傘盖,头上簪花滿額,两手一在前一在后,口微开,作載歌載舞的状态。

(6)銅虎形器:东山汉砖室墓发现,形如虎,作伏地狀,背有提梁(图11)。陶質者其它各砖墓出有数事。

(7)琉璃碗:作深蓝色,内外壁經過磨制而光滑。广口、圓腹、平底,外口有凹入的紋紋(图12)。北郊橫枝岡西汉木槨墓出土凡三件。在全国出土的琉璃用器中,还是年代最早首次发现。

二、六朝墓葬

六朝墓共計有177座,都为砖墓,其中两晋墓占410座。

晋墓的墓砖常印有年号和几何图案花

紋,发现有年号的:永兴二年(公元305年),永嘉三年、五年、六年、七年(公元311—313年),建兴二年(公元314年),太兴二年(公元319年),大宁二年(公元324年),咸和二年、七年、九年(公元327—334年)。有的是吉祥語:“永嘉五年岁在辛未宜子保孙。”

“子孙千亿眉寿万年。”“永嘉六年壬申宜子保孙。”“永嘉六年壬申皆寿百年。”“永嘉六年壬申富且寿考。”以及造砖者姓名,如“永嘉六年壬申陈恕制作砖”。“永嘉五年陈仰所造。”“陈仁。”“陈討。”还有造砖的地点,如“永嘉三年四月廿日戊子于赤岸造。”从这些紀年文字可确定墓葬的年代。

晋墓結構分为两种形式:(1)平面長方形,單室而狹長,頂作叠澀式。(2)室內分羨道,前后室三部分,呈長方形凸字形,頂为圓券。

六朝后期的砖墓,规模較晋墓大,結構形制有三种:(1)墓为長方形,室內分羨道、前室、过道、后室四部,券頂砌有單拱,后壁作六角形假柱。(2)墓平面作長方“凸”字形,也分羨道、前室、过道、后室四部,券頂砌有單拱,后壁作圓形假柱,前室和羨道的底砖鋪作“人”字紋。(3)墓長方形,券頂,室內也分四部分,后壁假柱特大,砌頂作双隅結砌,室底分为四級,后室最高。

这些墓的随葬品不多。陶器内外皆挂薄釉,呈青綠或黃綠色,有冰裂紋。器形有罐、碟、杯、盆、孟、灶。出现了天鷄壺、唾壺,还有青瓷虎形器。东汉的屋、仓、井和牲兽俑已不见。此外尚有玉、石、鉄、銅、金、銀、漆器和琉璃、瑪瑙、珊瑚等,遺物已漸趋簡朴,很少发现象东汉墓葬那样多的葬品。

在西晋建兴二年的邓彭墓中出现了典型的青瓷虎形器一个,其它墓葬虽出有紅陶的和銅鑄的,都沒有绝对年代可据,最早的亦只是东汉。

关于“虎形器”的名称和用途的問題至今还在爭論,未得到解决。多数人認為是

“便器”，有認為是酒器或茶具^①，有認為圓體的是便器，獸體長形的是盛水器^②。兩種說法，四種推論，我同意虎形器是盛水器，而不同意從形體的圓、長來斷定其用途。

兩周銅匜有兩種類型，有蓋與無蓋；有蓋的又有圓背平背之不同（商周彝器通考圖865鳧叔匜及867蟠夔紋匜），無蓋的又有直流及圓口的區分（同前書圖860重環紋匜，864無疆匜），在使用時無蓋比有蓋便利得多，我們從傳世無蓋的匜占90%以上，可以說明此問題。匜為盛水器，如現代的水壺，其淵源是從早期盛酒的“觥”轉變而成的（同前書圖674——684）。觥蓋作龍首，匜則喜做虎頭，為最大的區別。觥和匜都曲其尾以為把手（即鑿），為共同之點。

兩漢至六朝的陶、瓷虎形器，與1923年河南新鄭春秋墓出土的“虎尊”完全相似，其器背有橢圓小蓋，為盛酒的用器（圖13）。虎形器的體積大，容量亦多，陶質的鑿恐不能負重，於是改為提梁，不僅易于提挈，並且便于瀉水。欲其容水多防止其外流，勢必將頭部昂起，這樣的改進是合乎發展規律的。至於背上何以不開孔？原因為梁短矮，注水入器勢必困難，遂不得不密封其背，于盛水時將器按入水中，是可以理解的。

我不苟同虎形器是“便器”，提出三種理由：（1）南京趙士岡第4號墓出土的赤烏年號青瓷虎形器（圖14），右側刻字十三：“赤烏十四年，會稽上虞師，表宜造”；左側刻“表宜”二字。表宜是陶師的姓名（古有表姓），無論在那個封建社會，不會有人將自己的名字刻刻在“便器”上，更沒有可以說明將年號如此用法的理由，這種犯大不韙的行為，任何人不敢觸犯的。黃文寬同志對赤烏年號另有一種看法，認為倪振遠同志文中^③，的“帝號”和“年號”，應有所區別“赤烏僅是吳大帝孫權的一個‘年號’而不是‘帝號’，對年號從來沒有尊稱、提頭、避諱的法例”^④。我們在習慣上，稱歷朝帝王紀元所立的名號為“年號”，據我

體會倪同志所謂“帝號”為“帝王年號”的簡稱，當然是可以的，不能因倪同志用辭不妥而曲解“帝號”為帝王的“別號”。年號雖無尊稱、提頭、避諱的法例，但在當時它是代表帝王的一個紀元，有着它的尊嚴程度，而絕不可能將之用在“便器”上面，是可以肯定的。黃同志又謂倪文“刻刻名字在匜器上此例費解”代他找出了理由：“所以這個虎子在刻寫上了姓名以後，又被刮去了。因之變成了‘口口宜’。口口二字為什麼看不清楚，而在其他的上下文卻完全清楚，原因何在？現象如何？未有報導。”此器第一次印入1955年文物參考資料第8期，二次印入1956年考古通訊第5期，圖版17，尤以文參的圖版大，文字筆劃清晰，我想黃同志不會沒看到的。字不認識是一回事，不能因此而推斷名字刻後又刮去，這種說法是不妥當的。（2）孫桂恩同志提出解決“虎子”的意見：“除了從它在墓葬中的位置或伴隨物結合起來研究外，而且還要从它的本身發展系統和過程來作比較，探索”，我是同意的。又曾凡同志報導福州有兩個墓所出的青瓷“虎子”出土時都與日常生活食用具放在一起，他特別強調一件出土時是在所有隨葬品最前面一個很精緻而刻着寶相花碗的後邊很有規律的放置着；一件是出土時倒放在五盞盤的中間，二者都未經過擾動。這就提供我們研究的好論據。在抗日戰爭之前，有些經過科學發掘的兩漢墓葬，虎形器出土情況與上同，我不再舉例了。（3）虎形器不一定發現于男子的墓中。廣州西郊石頭岡15號

① 曾凡“關於青瓷虎子用途的新發現”，1957年考古通訊第2期。

② 孫桂恩“談談青瓷虎子的兩種用途”，1957年考古通訊第6期。

③ 倪振遠“關於青瓷虎子問題”，1957年考古通訊第5期。

④ 黃文寬“從廣州出土的虎子談虎子的考證”，1956年考古通訊第6期。

砖墓后壁龕前正中放置此器，方位肯定未移动过，随葬品有銅鏡、指环、鉄剪，此外并无其它东西甚至有类似男人的用具。根据我在長沙市发掘汉至唐的一些女墓（內中有經我手清理的）遺物，有銅刀、尺、鏡（或无鏡），或者还有金銀指环；有出銅刀、剪（或有鏡）；有出鉄剪、金花；有出指环、銅、鉄剪。当然，随葬品虽有多少和种別之不同，但不离刀、尺、剪、指环、花飾等。盗墓有經驗的土夫也談到，凡有刀、尺、剪的都是女墓。黃同志認為西村这墓曾經严重地被扰乱过，并說男人墓也不一定沒剪刀（文內未列入鏡及指环），有夫妇合葬的可能。其意不外想証明虎形器为“虎子”，拿剪刀来陪笔而已。我們如果根据发掘經驗和結合土夫們一些話，不必要一笔將之抹煞而不予考虑。黃同志要肯定“虎子”便器，就必然的有夫妇合葬可能的說法了。我兩的意见始終沒有接近而仍然保持很大的距离，他文內的“問題才沒有爭論下去”，应是問題仍在相持中。（4）人們看到圓体平底的器，就会联想起后世的“便壺”而同等齐观，孙同志提出他的論点原因亦即在此。若是我們从另一件背上左右各有一耳的来看（图15），对两耳必然难以理解。但我正因其双耳作为非“便壺”的有利印証。浅池提梁灌水，深井系繩汲水，这就是耳的功用。还有，虎形和長体銅制的，在臀部有高出的孔管（图16、17），利用互通空气，瀉水可以畅达，說明工人在制造过程中是不断的改进的。

器的質类有銅、陶、瓷、漆四种；而形狀有伏虎形，有不作虎形而圈足，有圓形而平底（图18、19）。

从上各方面的一些材料，初步結論是：出土各虎形等器，其名似可称之为“虎形提壺”和“長体提壺”，“圓形提壺”，为六朝以前盛水用具，与甔的用途相同，并非“便器”。六朝以后，可能轉为“便壺”，亦即是說：随葬品中各式各样的提壺不是“便器”，便器不用来随葬，不然，何以直至目

前，唐宋墓中还未有这类的器发现呢。

三、唐代墓葬

唐代墓葬共清理了48座。

唐墓大致可分为早、晚期，早期墓室狹長，券頂之上再加盖一层为双重拱，墓內底部分为前后兩級，后級比前級較高，后壁有上下兩龕，有砖砌的棺床。

遺物有陶器、瓷碗及其它金、玉裝飾品，錢币有“开元通宝”和“乾元重宝”两种。

四、宋代墓葬

五年来所清理的宋墓都是小型的，墓室狹小，形制可分两种；一种是以东山馬黄水岡宋墓为例，墓室平面作長方形，券頂，內券拱上另复盖一层外拱呈双重拱頂，外券券牆用墓坑的土壁来代替，有砖砌的棺床，无龕。值得注意的是这墓內券拱的結砌是使用灰漿，广州所发现明代以前的砖墓結砌是使用泥漿的。此墓的发现使我們知道在宋代广州的建筑已使用灰漿結砖的方法。

遺物有彩色青瓷瓶、影青小爐、銅鏡、銀釵、“开元通宝”。

一种是坟面建筑用灰沙板筑成，有祭台，其后为筑于基座上的坟头，形狀似一具棺材，祭台与基座之間有墓碑，一碑面書“宋咸淳二年岁次丙寅十二月。”碑下挖出装骨灰的陶罈。

五、元代墓葬

广州只发现元墓2座，簡家岡第五号墓坟面建筑已傾圮，祭台无台基，后为碑龕，記載死者为梁文惠与妻伍氏合葬。梁文惠死于至正廿四年，伍氏死于至元四年，伍氏死后二十三年从白旗岡迁于此与夫合葬。

祭台之前挖出一長方形的砖室建筑，四壁是單隅牆，有券拱，底部有三行砖垫棺。

遺物有銅鏡、錢、簪、耳挖和髻飾。

六、明代墓葬

明墓发掘不多，其中戴縉夫妇墓，内层用石建筑。其余有的只用灰沙，也有四壁用灰沙夯筑，室顶则用砖或石构成。墓内有棺，大墓有棺槨，棺外四周用灰沙填实，多数有墓志砖，也有石墓志，随葬品少，或至没有。戴縉夫妇墓出土遗物最多，但依其家道来講，也可說較簡朴的。

戊、古瓷窑遗址：

在广州、佛山、南海、番禺、三水、新会、高明、潮州、惠来、紫金、惠阳、阳江、中山以及海南岛的昌盛、陵水、乐东等县发现了唐、宋、明时代的古瓷窑遗址和出土各代瓷器、瓷片的地点共23处，并有制瓷工具的压砣、匣钵、渣餅和各种青瓷、黑瓷器及其碎片600多件（片）。

古代瓷器中以唐宋两代最特殊。一般窑址所出青瓷数量最多（瓷釉色有青黄、豆绿与淡绿色）。其釉色晶莹，胎质细腻，造型优美，而以陵水出土的宋代影青高足碗尤为罕见，可与南北各地的青釉瓷器相媲美。

高明塘尾村南朝至唐的瓷窑址，新会县瓦片岩唐至宋的瓷窑址，佛山市石湾和南海镇龙圩宋代的瓷窑址是比较重要的发现（图20），它给我们说明了南朝至唐的青釉器与唐至宋的青瓷器相互间的继承发展的关系。

在惠来县隆江、潮安县赤凤、惠阳县碗窰村、紫金县白水寨发现宋明时代的窑址四处。瓷片均屬南方青瓷体系，与潮州市四郊古窑的遺存相似。

我們曾留意到汉墓出土的有釉陶器，那些釉斑多作青褐色和黄绿色，从胎、釉、造型等特点来看，广东是属于一个窑系，以后到晚唐或五代时，受了越窑的影响，而烧造起青瓷来。青瓷釉色有黄绿、豆绿、淡绿三种，施釉薄而均匀，有冰裂或无冰裂，胎土灰白色，胎骨坚致有薄有厚，火候很高。重要器物有番禺县石马村和广州东郊唐砖墓中的青瓷器。去年广州西村黄帝岡窑址的清理，使我们了解古窑的建筑形式，对研究广

东的古窑是不可多得的重要材料。

己、古代建筑及其它文物

几年来在佛山专区，海南行政区、韶关专区的英德、翁源、清远、佛冈、阳山、连县和合浦、钦县、湛江市、海康、徐闻等地，调查和发现了南朝以后的古代建筑物308座，其中包括唐以后的古城11座，明以后的寺庙、亭、祠堂、衙門等119座，南朝以后的古塔57座，明以后的桥梁15座，明以后的牌坊100座，清代的炮台4座。此外，还有唐宋以后的摩崖石刻、碑刻、雕塑象及其它附属文物89项。

上述这些古代建筑物及其它附属文物比较重要的有：建于宋代的琼山古城，建于明代的儋县古城，崖县古城，合浦永安古城，明代的北涌亭，新会明末清初的孔子庙，石岐清初的学宫建筑群。潮州市的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创建的开元寺，唐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建筑的大颠祖师塔，梅县阴那山唐咸通年间（公元860—873）建筑而明初扩建的灵光寺；佛山市明代李待问祠堂及郡马公祠；连县明帝泰始四年（公元168），的慧光砖塔，明代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最高大的属海康启秀砖塔；新会，琼山，阳山有唐宋年间的石塔；文昌明代的文昌石桥，顺德明代的伏波桥；佛山市祖庙前，明景泰二年（公元145）的“灵”应木牌楼，江門白沙祠和鹤山五世祖祠前的明代木牌楼；琼山明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少司徒和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学士尚書石牌坊，海康清代的石牌坊群（一連14座）；连县、阳山、崖县、万宁唐宋年间的摩崖石刻；海口宋代宣和元年宋徽宗撰并書的神霄玉清万寿宮石碑；顺德明代南明永历年间的鉄炮等等。这些丰富的发现，对于祖国南方的建筑物及其它附属文物的了解和研究将是极其重要的实物例证。

全国现存最古的砖塔，可能要算连县城内光孝寺中的慧光塔了（图21）。它于南朝

宋明帝泰始四年（公元468）由僧人募化建筑的。千余年来经过多少次的修葺，在文献上找不到记录，又无碑志可考，但从该塔现有的现象来观察，虽在历次修葺过程中，基本上并未改变它原有形状和手法的。

塔高约41公尺，六角九层，塔外斗拱密布，檐下壘砖重重如“跳昂”，更显得华丽美观而庄严。塔身全部都是用砖横直左右斜壘叠涩构成，与其它一般塔的结构方法两样，从这方面可以体会是早期的作风。

塔砖是有文字的，而且很不少。砖面印着捐砖人的姓名和所捐的砖数，其字分印模和划字两种；划字的是阴文，捐砖的数目字不大，如“王氏二娘砖一百。”阴文印砖数字据目前看到的在五千以上，如“馮氏二（娘）砖伍阡。”“藏主僧以順砖伍阡。”“前住山济孤舟(?)砖伍阡。”“严祖福砖伍阡。”“廖道泰砖伍阡”（图22、23）。这些文字仍然保持着六朝时代的风格。再从阡字来讲，用为数字之阡，五代还偶然见到，后此几乎绝迹了。

连县的光孝寺除该塔以外，一切建筑物已完全改变旧观，惟此雄伟古朴的慧光塔矗立在寺内，有如“鲁殿灵光”。可是这富有高度艺术价值的宝物，因年久失修，残破得相当严重，为了珍重保护这目前可能是全国最古的一座砖塔，省文化局已于去年11月拨出一笔巨款用在它的身上，在未兴工之前，做好一切的准备工作的，今年当按照预决计划逐步施工完成。

結 語

从以上各方面看来，广东的文物工作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逐步发展的。几年来广东文物工作的成绩是巨大的，主要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和广大群众积极支持的效果。这样的成绩是过去任何时代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就广东新石器时代遗址遗物的发现说，解放前只有海丰汕尾、文昌凤鸣村和韩江流域一带发现的遗址十数处，遗物大部分

为私人所占有及流出海外。解放后所发现的遗址约占解放前的36倍多，只就1957年一年所发现的就占解放前15倍多。再就墓葬说，解放以前的墓葬多被盗掘，对于墓葬形制的研究当然谈不上，出土遗物也因私相买卖，流落在私人收藏家手中去了。解放以来，汉代以下的各个朝代墓葬不断发现，对各个时代的墓葬建筑的特征和演化过程已有初步的认识。此外，对于地面上的古建筑的保护和修缮，对于古文物和革命文物的征集等工作也花了很大的力量，曾将征集品和出土文物大部分举行过几次的展览会，对群众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并供给科学工作者研究。这些事实都充分说明了党和政府对文物工作的重视和关怀，也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

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并不因此而骄傲自满。目前在文物工作中，仍然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缺点，一般工作落后于客观形势，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和要求，今后应加倍努力，在各项文物工作中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技术水平，改进工作的方式方法。并在两年内完成全省的文物普查工作，摸清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然后重点发掘，研究它的分期。对于其它的考古学遗迹和革命、历史遗迹等的调查研究，也要系统地地进行，以便更好地为科学研究提供资料。目前我们应根据广东省的具体情况，订出一个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文物工作的方案，这是一件很重要和迫切的工作，希望从事文物和考古工作的同志们多多提供意见，然后才能订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方案和方法，并共同努力完成这一计划。我们确信在已有的基础上，广东的文物工作将会得到更巨大更可喜的收获。

最后我还要说明一下，这篇稿子是我根据省文管会与文物工作队和市文管会同志们已报导过的材料，以及尚未发表的一些素材综合写成的，可能还有遗漏与错误之处，望读者指正。

关于在广东地区展开东南亚研究的问题

朱杰勤

一 东南亚研究的重要

东南亚（旧称南洋）的范围主要包括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马来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婆罗洲和帝汶。面积共4百7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约近2亿。东南亚土地既广，人口又多，社会制度不一，国际关系相当复杂，大可作为长期全面研究的对象。从地理上来说，越南、缅甸、老挝等国均与我国为邻，水陆相通，唇齿相依，利害相关，不能不引起我国人民的重视和关怀。从历史来说，东南亚与我国自周秦以来，即发生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关系，中国人民在东南亚已有悠久的历史。现在东南亚的华侨约有1千2百万，占全世界华侨总数90%。仅以新加坡一地而言，华侨人口占当地人口80%。他们的经济力量不但雄厚，而且深入社会各阶层。他们与当地人民团结互助，保卫和平，并为社会创造财富。所以东南亚社会发展情况和华侨问题，大可构成重要的研究项目。从国际事务上来说，自从我国和印度共同倡议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之后，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越来越大。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这五项原则得到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赞扬和支持，对于推进和平事业有很大作用。中国本着“万隆精神”，从各方面展开了广泛的国际接触，推进和改善同许多国家，特别是亚非国家的关系，曾经做了不少工作，这几年来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例如柬埔寨王国的和平中立的立场，得到我国政府的充分支持。我们也坚决地支持印度尼西亚人民为收回西伊里安、为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民族权利所作的正义斗争。又由于东南亚国家在国际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全世界的人民都关心到东南亚问题和希望了解东南亚的情况，因此，有必要展开对东南亚的研究以满足这种要求，并加强我们和东南亚人民的和平友好关系。东南亚研究作为一种专门科学来说，还可以丰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和哲学各部门的知识，从而促进世界文化的发展。

二 在广东地区展开东南亚研究的优越条件

第一，广东地区与东南亚各国在历史上、地理上关系较为密切。广东省是我国与东南亚各国人民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这几年来，我国不断争取和东南亚各国建立友好关系，这是我国外交政策原则之一，也是争取和平的具体表现。因此，不仅与我国已建立邦交的国家如越南、柬埔寨、老挝、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等国的政府人员和社会人士频频访问我国，大受欢迎，我们亦主动争取与其他国家接触的机会。周恩来总理曾经表示：“中国人民非常希望同那些邻近我们、并且同我们有历史联系的国家，象泰国、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等，恢复一度中断的接触，我们早就表示这种愿望，并且为此作出了努力。”（“关于目前国际形势，我国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问题”）可以预期，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我国与东南亚各国政府及人民之间的接触必将越来越多，而广东地区也将成为双方往还的必经之地。如果能够在广东地区展开对东南亚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问题的研究，对于促进我国与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加强经济文化交流，一定会有很大的作用。

第二，东南亚华侨达千余万人，其中以广东人居多。他们对于祖国同东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合作，曾经作出巨大的贡献，并且热情支援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如何团结他们来揭破帝国主义对华侨和东南亚人民的离间阴谋，如何团结他们来参加世界和平运动和帮助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是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在广东地区展开对东南亚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研究华侨问题，使我们能更正确地了解华侨情况，对于贯彻执行华侨政策会有一定的作用。而在对东南亚的研究工作中，广大华侨群众，将是一个不小的研究力量。

第三，广东省学术界对东南亚的研究过去已有相当的基础。唐宋以来，我国学者关于东南亚的著

作，很多是在广东写出来的。作为东南亚史地名著之一的“海語”，是明代广东南海县人黄衷所作。清代粵人謝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的“海录”，也是研究东南亚必讀之書。梁廷柅（广东順德人）以“夷氛紀聞”一書得名，他的“粵道貢國說”六卷，对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有翔实的紀載。清代大学者魏源所編撰的“海国图志”，其中有許多卷是叙述东南亚各国的，此書现在尚不失为研究东南亚史地的基本参考書。清末香山县林謙（若谷）曾編过一本“国地异名录”，对于南洋各国各地的方位距离以及名称的沿革，均考証群籍，列为表格，也是研究东南亚史地較早較佳的工具書。张煌南的“海国公余輯录”也可算是东南亚研究参考資料汇编之一。其他各家著作尚多，不胜列举。可见东南亚研究在广东省是有历史传统的。解放前，广州嶺南大学附設的西南社会經济研究所曾經展开对南洋及华侨問題的研究，出版了一些專書和华侨問題專刊，对于东南亚研究有一定的帮助。

广东省的学者对于东南亚研究特別具有兴趣的原因，据我观察，一由于国际形势的影响，研究国际关系不能不涉及南洋，因为南洋是溝通中西的要道。二由于广东省与东南亚各国海陆相通，交际頻繁，貿易日广，华侨海客，見聞較为亲切，可以取材。而且近数十年来，华侨对祖国的貢獻日益显著，受人重視。现在，我們对于东南亚問題的研究，具有各种有利的条件，可以說是“人地相宜”，應該結合广东地区的具体情况，大力展开此項研究。

三 我国研究东南亚問題的历史情况和几个具体問題

解放前，我国虽然曾建立过研究东南亚的机构，但都是未能令人滿意的。1927年上海暨南大学設立南洋文化事业部，聘刘士木先生为主任，編印南洋研究期刊；出版南洋叢書約有30册，也培养出一些南洋研究人材。不过当时南洋研究尚屬幼稚，所出的書大都編譯資本主义国家的作品，特別是日本人的作品为多，其中有价值的著作，如李長传先生的“南洋华侨史”，还是寥寥无几。不少从事研究和翻譯的人，其立场、观点和方法都是资产阶级的，往往不加批判地介紹为殖民主义辯护的、有毒的文章，成为帝国主义者的传声筒。1940年，国外热心于南洋研究的华侨在新加坡成立中国南洋学会，发起人有許云樵、姚楠、张礼千和韓槐准等，已故的文学家郁达夫亦在其列。国内研究南洋的学者亦遙为支援。出版有南洋学报，从未中断，迄今

已有17年历史。这个学报以史地考証为多，內容比較專門，学术水平也相当高，可供参考，早已引起各国有关的学术团体的注意。此外，尚有一个在抗战时期成立的，性質反动的研究南洋的机构，即1942年国民党侨务委员会和教育部在重庆合办的南洋研究所。它完全被反动派所支配，在学术研究的幌子下，企图在海外推行大汉族主义的政策。初时虽有几位研究南洋的專家，但終被排挤出去，四年之后，因毫无成績而垮台。

综合來說，暨南大学的南洋文化部，由于国民党統治时期，不知提倡学术，忽視南洋研究的重要性，对它毫不支持，因而停办。后国民党反动派設立南洋研究所，打算利用它来扩张国民党在海外的反动势力，鼓吹大汉族主义，但由于性質反动，制度腐朽，根本談不上什么科学研究。

解放后，我国文化事业的进展一日千里，党和政府对于东南亚研究非常重視。周恩来总理曾經不止一次提到东南亚研究的重要性。中国科学院原拟于1957年度設立亞洲研究所，由于一时人材分散各地，未便集中，始暫緩开办；但亞洲研究的重要性并未被忽略。中央侨务委员会对于华侨問題及东南亚研究也表示关怀，大力支持厦門大学設立南洋研究所。高等教育部有見及此，早于1952年即规定各綜合大学历史系設立亞洲各国史一科，并強調須重視这科的開設。教育部对师范大学，师范学院亦有同样的要求。高等教育部去年指定在中山大学設立亞洲史研究室。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亦計劃展开东南亚經济問題的研究。所有这些，都表明了党政当局之重視东南亚的研究。

或者有人会認为南方已有厦門大学的南洋研究所，广东地区就不必展开关于东南亚的研究工作了。对于这个问题，我个人認为应从全面来考虑。第一，研究东南亚的人材决不能集中在一个地方。广东省人口約三千八百万，多于福建省（人口約一千二百万人）二倍以上。华侨人数二省略約相等。在广东省的各級机关干部中，也有不少研究东南亚的人材，如果本省展开研究东南亚的工作，就可以罗致这批專家，而与福建的南洋研究所分工合作，互相支持，更好地貫徹百家爭鳴的科学研究方針。

现在，摆在我們面前的首先是研究人員的来源問題。在过去对南洋的研究，一般人認为是一种冷門的學問，现在也是社会科学中最薄弱的一門。据初步調查，全国研究东南亚而有講師以上水平的尚不过百人，而且分散在各地地方。比較有成就的專家更屬少数，还有一部分人尚留在国外（例如新加坡

的中国南洋学会及华侨创办的南洋大学的南洋研究所就拥有一些专家),所以组织研究力量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根据我的了解,研究力量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第一,自1952年起,各综合大学和师范学院已相继开设亚洲各国史一科作为历史系的基础课程,其中东南亚各国史占很大部分。各校历史系毕业生对于东南亚史也有初步的知识,我们可以从中选择优秀的毕业生培养成为研究东南亚的初级干部,即以广东一省而论,每年历史系毕业生有二三百人,我们每年挑选几名就够了。此外,还可以招收研究生入所培养,这样就可以不断补充研究干部的队伍。第二,东南亚研究在现阶段中,必须做些提倡风气及全面普及的工作。展开研究工作初期,应从资料工作入手,因此,要先配备一批对东方语文及西方语文有修养的人材,这都可由归国华侨及各大学的东语系和西语系中选聘,在专家指导下进行译述工作。例如把东南亚各国的第一手资料翻译出来,把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关于东南亚的优良作品翻译出来,又进一步把资产阶级的东方学者可供我们借鉴的作品,主要是史地考证的论文和实地调查的材料翻译出来,以供参考,使我们了解世界各国关于东南亚研究的成就,并在他们已取得的成就上逐步提高。我们还可组织人力来整理我国古代关于东南亚各国的文献材料,加以充分利用。这样过若干年后,我们的成绩就可以赶上他们了。据我估计,资料的翻译和整理工作,亦需三、四年时间,在这段时间,从事资料工作的人,在进行工作过程中,就把自己培养成为研究人员了。到那个时候,这批研究的新生力量,拥有充分的材料,在专家指导下,自然能够发挥力量,再过一两年,他们就可以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我们还可以利用广东有关的学术研究机构和专家,帮助他们一面培养研究人材,一面就他们已经占有的资料进行研究工作。

研究方向应慎重确定,有计划进行研究。我们要研究东南亚各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探讨东南亚人民历史和文化发展的复杂问题,弄清东南亚各国历史发展过程的规律性,并设法加强我国人民与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文化经济联系。因此,必须重视各国的经济研究、各国政治现状的研究,特别要重视帝国主义国家现阶段的殖民政策问题、东南亚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和殖民制度在东南亚瓦解问题。对于东南亚各种类型的国家,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研究。在研究范围内,我们应该略古详今。

我们要向苏联东方学者学习并和他们加强联系。苏联的东方学已有悠久的历史。十月革命前,

俄罗斯圣彼得堡是欧洲东方学重心之一,国际东方学会多次在俄国举行。西洋东方学者研究东南亚的作品,如夏德(德国人)及柔克义(美国人)共同译注的赵汝适“诸蕃志”就是在圣彼得堡出版的。俄国的先进学者曾谴责沙皇的侵略政策,对东方被压迫民族表示深切的同情,并不倦地表扬他们的传统文化。苏联东方学者继承了俄罗斯东方学的优秀传统,并遵循列宁关于东方学问题的理论和苏维埃的国家政策,发展了苏维埃东方学。他们非常重视亚洲研究,对于中亚各国、中国、印度、朝鲜、日本都作了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近几年来,对于东南亚各国的研究也不断加强,最近还派人去越南研究越南文史。东方学研究所已计划编写东方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以及马来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缅甸等现代史。古柏尔的“印度尼西亚”,正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深入研究的成果。关于东南亚研究,他们屡次表示要和我国合作,特别希望我国展开研究工作,还认为研究东南亚古代史,在中国有很好的条件,因为中国的文献材料最多。因此,我们除向苏联东方学者学习外,应与他们密切联系。

我们展开研究,必须和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作坚决斗争,坚持工人阶级的立场和马克思主义观点。资本主义国家为推行它的殖民政策,直接或间接创立许多研究东南亚的机构来协助进行侵略,例如:十九世纪初叶英国成立皇家亚洲学会,1846年成立哈克卢特学会,研究亚非地理,印行多种丛书;法国于1898年在越南河内成立越南考古学会,1900年改为远东博古院,展开考古学、人类学、地理学、史学及语言的研究,出版了近六十种的院刊和专著;荷兰以前在吧达维亚(雅加达)也设立了所谓皇家吧城学会;美国有太平洋学会,并由政府及资本家资助各大学设立研究东南亚的机构;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研究东南亚的机构也有数十处之多。这些研究东南亚的机构,目的都是在于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和推行殖民政策而设的。他们对于东南亚各国人民及其文化,极尽诋毁的能事,颠倒是非,淆乱黑白。他们利用种种阴谋来垄断研究资料,甚至掠夺当地的文物。有些文化特务还替其本国政府探测别国的资源和勘察侵略的路线。我们要对这些东南亚人民的敌人百倍警惕,随时随地要揭发他们的阴谋,驳斥他们的谬论,使我们的东南亚研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循着正确道路发展。一方面发扬东南亚各国的民族精神和固有的优秀文化,另一方面也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辛亥3月29日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役

陳錫祺

1911年4月27日(旧历3月29日)同盟会在广州的起义,又称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役,是同盟会领导較大规模和慘淡經營的一次起义。在准备期中,同盟会几乎集合了全国會員的精英,作孤注的一擲,最后,和以往的起义一样,遭到了失敗。这次起义,虽然失敗,但革命烈士的英勇牺牲,和清政府殘酷的屠杀政策却激怒了全国的人心,使許多对清政府尚存在幻想的人,也下了最后的决心,走上反清的革命的道路。

辛亥年(1911—1912)是清政府統治中国的最后一年,在这一年里,民主主义革命浪潮,象噴泉一样地到处迸发,广州4月27日的起义,則是这一年中的第一个大浪潮。它給清朝反动統治政权以沉重的一击,激起了广大人民的觉醒,促成了五个月后的武昌起义的成功,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亞洲人民的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广州4月27日起义之所以那样激动人心,給革命人民以极大振奋,不仅由于此役牺牲之壯烈,而且由于这一起义是在革命一度沉寂以后,从最艰难困苦境遇中振拔起来的。

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到1908年上半年,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最活跃的时期。他們結成了反清統一战綫的革命組織——中国同盟会,创办了革命机关报——民报,在思想战綫上,和资产阶级改良派就民主革命与君主立宪問題进行了論战。同盟会虽沒有取得彻底的胜利,但却击败了立宪派头子梁启超“开明專制”的謬論,传播了革命民主的思想,指出了革命前进的道路。与此同时,同盟会还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虽然每次起义都失敗了,但清政府的威信,却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毫无疑问,在这一段时间里,中国民主革命运动是在不断前进不断高涨中。1908年,列宁对中国这几年的事变意义,曾作如下的估計:

“在中国,近几月来,反中世紀制度的革命运动也特別表现得厉害。固然,关于这个运

动(正是这个运动),还不能作出确定的結論来——因为关于运动的消息很少,而关于中国各地变乱的消息倒很多;可是中国的‘新精神’,及‘欧洲潮’的厉害的发展,尤其是在日俄战争以后,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中国旧式的暴乱也必然会进为有觉悟的民主运动”①。

沙俄駐北京公使在1908年向沙皇政府汇报中国的情况时也說:“几乎在这个大国的全部領土上,为了寻找某种新的美好的道路,一个前所未见的人海沸騰起来了,他們背着我們进行着紧张的工作”②。但这种情况,并未直綫地发展下去,1908年下半年有了新的变化,革命开始轉入低潮,可是这个时期并不太久,不到两年,革命形势又达到新的高涨,而且是以狂风暴雨的形式展开的。

从1908年下半年到1910年初,由于清政府进行欺騙性的伪立宪活动,资产阶级立宪派随着搖旗呐喊,兴高采烈地进行所謂国会請愿运动,迷惑了群众的視听。与此同时,清政府还采取了一切压制手段,加紧防范革命活动,特別在載湉(光緒帝),那拉氏相繼逝世以后,为了作垂死的挣扎,更戒备森严,到处施行殘酷的镇压,帝国主义也“帮助‘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来压迫革命家”③,革命乃暂时轉入低潮。这种情况,从同盟会方面来看,更是非常清楚。1908年,日本帝国主义接受清政府的要求,封禁民报,革命派在思想战綫上丧失了陣地。武装斗争方面,亦因两广、云南迭次起义的失敗,革命內部人心沮丧。帝国主义助清为虐,不許革命軍停留边境,革命領袖孙中山也被禁止自由居住于日本、香港、越南、南洋等与中国鄰近的地

① 列宁文集 第三册 頁98 人民出版社。

② 亞·杜宾斯基 1905—1907年俄国第二次革命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教学与研究 1956年第2期 頁10。

③ 列宁文集 第三册 頁98 人民出版社。

方，严重地破坏了革命派的活动计划，加上軍事物資的缺乏，經濟的窘迫，大规模的革命活动不能不暂时停顿。所以从1908年5月河口之役失败后，直到1911年广州4月27日的起义，除1910年2月广州新軍起义外，三年之中，同盟会沒有领导过其他的武装活动，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在这几年中，被迫轉入了低潮。

促使同盟会的革命活动，由高潮轉向低潮，固然由于总的客观形势的制约，但中国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軟弱动摇，也是主要的原因。首先，革命派内部因地域观念的侵蚀，领导集团中发生了宗派矛盾。以章炳麟、陶成章为首的江浙派，怀疑孙中山1907年受日本賄賂，离日去越南，因而攻击孙中山不顧大局，陶成章、李燮和在南洋且与孙中山采取对立态度，联名发表“孙文罪行”小册子，并写信給东京同盟会本部要求改选总理。同盟会中长江上游（包括四川、两湖、江西）的同志，在光复会派的煽动下，也不滿意孙中山“舍广义而取狭义”，把革命力量集中在西南边境活动，置东京本部于不顧，因而另組共进会^①，名义上并不脱离同盟会組織，实际則有分道扬镳的趋向。孙中山虽不因章、陶的誣陷污蔑改变其革命初衷，但以章在同盟会和民报中的地位，对革命事业确带来了很大的損害，曾函吳稚暉在新世紀上著文駁斥^②，同盟会組織和革命活动，不能不受分裂活动的影响。轉向“萧散”和“衰落”^③。

同盟会成员绝大多数为小资产阶级知識分子，这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一方面有較大的革命热情，一方面又具有一般资产阶级的弱点，輕視群众，既急于求成，又患得患失。在革命高涨的环境里，能有积极的表现，一遇挫折，或到革命低潮时期，就会悲观失望，或者頹唐消极，如1908年时期的宋教仁；或者采取个人暗杀的恐怖手段，如熊成基、汪精卫、溫生才，甚至同盟会重要领导人黄兴也打算个人冒险与敌人拚死^④。他們采用这种个人恐怖的手段，是小资产阶级革命狂热。不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的具体表现，从革命長远的利益来说，則是极端有害的，因为革命的目的，不在消灭少数反动派个人，而是要消灭产生反动統治者的社会根源和政治制度。暗杀行为，只能混淆革命目标，引起群众思想的混乱。

1910年，国内革命形势因为清政府无情的搜刮和繼續不断出卖矿权与路权給帝国主义，引起各阶层人民爱国情緒的普遍高涨，人民群众反抗清朝暴政的暴动，不仅规模越来越大，而且普及于全国各

地与各个阶层，如抗捐、抗稅斗争、与反饥饿搶米风潮，几乎无省不有。参加斗争的群众，除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学生、士兵之外，甚至和尚、尼姑、道士以及部分地主士紳，也参加了斗争的行列，革命声势异常浩大。同盟会的领导落后于革命形势，已是鉄的事实，如不急起直追，发动一次大的起义，不仅使已經觉醒的群众失望，革命阵营内部，也將更加涣散。这不只是同盟会本身的存亡問題，也是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成败問題，由此可见孙中山1910年在庇能會議上坚持繼續斗争，发动广州起义是有重大意义的。1911年广州4月27日之役，就是在这样情况下发动起来的，虽然最后仍告失败，而且失败得很慘，但仍起了振奋人心，团结同志，适应全国革命形势的重大作用。

1910年2月，广州新軍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从美洲赶到底能，召集同盟会干部會議，商量卷土重来的计划。当时，这些干部（包括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在内），“以新败之余，破坏最精銳的机关，失却最便利的地盤，举目前途……莫不唏嘘太息，相視无言”^⑤。革命斗志消沉，在这种紧要关头，孙中山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鼓舞干部們的斗争信心和决心。他对干部說：“一败何足馁，吾曩之失败，几为举世所弃，比之今日，其困难实百倍。今日吾輩虽穷，而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如果众志成城，則財用一层，予当力任設法”^⑥。会员們在孙中山热情鼓舞和华侨大力支持之下，决定在广州大举。因此1911年4月广州起义，就是从这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振拔起来的。

同盟会对1911年的广州起义，是抱了破釜沉舟的决心，所以在人力和財力方面，作了最大和最充分的准备。当时的计划，筹措“数十万大款”，动员全党人力，組成选鋒，领导軍队及民軍在广州发难，广州一得，則分出湖南、江西，直捣武汉、南京，会合长江流域革命势力，实行全国大举。

① 近代史資料 1956年第3期 頁35、39。

② 胡汉民編 总理全集 第三集 函札 頁193—196。

③ 近代史資料 1956年第三期 頁39—40
1957年第一期 頁122。

④ 近代史資料 1956年第3期頁40 邹魯广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 頁39 商务。

⑤ 胡汉民編 总理全集 第一集 頁536。

⑥ 同上。

准备工作中最困难的问题是筹款，同盟会筹款的方法，主要是向华侨劝捐。南洋华侨中有不少大资本家，但“大资本家最不革命，最怕革命”，他们倚靠帝国主义发财，对祖国的生死存亡认为毫不相关。有些较有爱心的资本家，因为受到保皇党和陶成章等的破坏，采取消极态度。只有小商人和一般工人，对革命非常热心，他们常常把一二个月的薪水捐出来^①。其他各地的情况，大致与此相似，所以起义前筹得的十八万余元的经费中，极大多数出之于南洋、暹罗、越南、美洲各地中小商人和工人的血汗。不难看出，此时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已经获得海外华侨广泛的支持，由于多数华侨参加了筹款工作，因而与这一次起义痛痒相关。有些华侨不仅出钱，而且亲自投效革命，参加起义乃至流血牺牲，广州4月27日之役之所以能在海外华侨中起重大激励作用，除起义本身的教育意义外，还有这种血肉相连的关系。

广州4月27日的起义，在组织方面也比过去任何一次要严密。本来，同盟会指导西南各省党务军务，原设有“香港同盟会南方支部”。庇能会议后，虽然决定在广州举行一次起义，而其计划则及于长江各省，因此必须有一个统筹全局的机构。1911年2月中旬，赵声、黄兴、胡汉民等相继返至香港，长江各省和闽、桂、日本同志也多接踵而至，乃组织革命军统筹部，统筹全局，专力策划广州起义。为了分职任事，又在统筹部分设八课。因为起义计划，以新军为骨干，并联络防营与民军，所以特设调度课，负责联络军队。起义总目的在会师长江，发动全国大举，因而分派代表赴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广西、福建、云南分设机关，发展组织，联络同志，准备响应，乃设交通课总司其事。此外还设有储备课，负责购运器械，编制课，掌草定规则，秘书课，负责文书，出纳课，管财政出纳，调查课，伺察敌情，总务课，负责一切杂务。广州既为起义地点，又在广州假借各种名目成立秘密机关三十余处。为避免秘密泄露，“各部之事，不相闻，亦不相告”。在广州的秘密机关，也互不相通。这样保守秘密的方法，固然有很大的缺点，但在组织成员极端复杂的情况下，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如担任运输枪械的陈镜波，就是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派进革命阵营中的特务，储运课几次委任他伪饰头发运送枪械子弹，陈镜波向李准报告，但不能知道其他各部情况和其他各路运送械弹情形，故起义仍能如期举行。

在人力的调配方面，这次起义也和以往不同。

过去同盟会领导武装起义，不是联络会党、民军，就是运动防营和新军，同盟会只指派一些联络人或指挥者。经验证明，这种办法不可能收到很好的效果，特别是同盟会的革命目的不能很好地贯彻。因此，在庇能会议上就决定选择同盟会干部五百人为先锋，领导军队民军起义，使他们在起义队伍中起模范作用。统筹部成立以后，觉得五百人不够分配，增加到八百人，几乎吸收了同盟会散在全国的精华。起义虽然失败，但志士们牺牲的壮烈和斗争过程中所表现的英勇精神，对中国人民起了很大的鼓舞与教育作用，然而，同盟会的实力却也因这一役的失败，受到了大的断伤。

在八百先锋中，华侨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从孙中山组织兴中会发动第一次广州之役起，海外华侨对每次起义，都作了大量物质方面的支援，也有个别华侨投身革命，参加起义。然而，都比不上这一次，既献出了大量现金，又成批地回国参加起义。参加起义的华侨，确数现在虽还不能查知，但仅就牺牲的名单来看，七十二烈士中，华侨即占27人，超过了总数三分之一。可见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不仅在金钱物质，而且抛头颅洒热血。通过这一次的斗争和流血牺牲，就真正把华侨和中国革命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我们说1911年同盟会在广州的起义，调动全国革命派的精英，不仅因为有较多的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参加，较多的华侨志士投入斗争，更重要的是工人、农民也投入了战斗（在殉难的七十二烈士中，工人占了十六名）。当时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形成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但在四月二十七日起义的斗争中，曾发挥工人阶级的智慧和大无畏的精神，推动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壮大了革命的声势。至于农民的人数，仅徐维编扬率领的就有六七十人^②，此外4月28日响应广州起义的顺德农民军一千余人，其中极大多数是农民。由此可见，参加起义的人数，虽不很多，却包括了全国各地以及海外华侨中各个阶层的革命人民，这样就更壮大了革命的声势，扩大了起义的影响；它之所以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前奏，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原因正在于此。

1911年4月初（旧历3月初），统筹部各项准

① 张永福 南洋与创立民国 南洋与中国革命 页21—25 中华版。

② 莫纪彰 辛亥三月二十九广州血战笔记 见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 页222—223。

各工作大致就緒，各地同志也陸續到達。4月8日（旧曆3月10日）開發難會議于總機關部，制定十路進攻計劃，決定4月13日（旧曆3月15日）起義，由趙聲、黃興分任總副司令。統籌部的決定，事實證明存在着嚴重的缺點。第一，十路進攻計劃，每路不過百人，在人民力量沒有發動起來之前，這個力量不能發生什麼重要作用，何況這些敢死之士，多數沒有受過軍事訓練和實地作戰的經驗。第二，十路進攻，黃興、趙聲各分任一路，缺少一個居中指揮調度的人，必然造成各自為戰，亂成一團，後來起義爆發，實際情況正是如此。第三，定期4月13日發難，也是缺乏考慮的事。因為國外匯款尚未到齊（20日以後才到）起義需用的武器，主要購自日本、越南，但兩地軍械4月25日（旧曆3月27日）到齊，26晚才起出，對敵人的情況，也缺乏估計，敵人對革命軍準備在廣州起事的消息早有所聞，早在南洋籌款時，保皇黨已向清吏告密，北京清政府也有電到粵，“令粵吏嚴防”，4月8日（旧曆3月10日）溫生才刺殺李琦事件發生，清吏更戒備森嚴。統籌部主觀決定起義日期，後來為情勢所迫，不能不改期，而且一改再改，造成行動上的混亂，僅此一端，已經看出統籌部領導的薄弱。

黃興于4月23日（旧曆3月25日）由香港到廣州，廣州方面未得統籌部領導的同意已決定26日起義，也是缺乏組織紀律的表現。黃興預計日本、越南軍械29日“方能接收分配”，決定推遲一日，于4月27日起義。考查當時情形，起義的條件並未成熟，準備的工作也未完成，統籌部領導方面之所以決定非在4月底起義不可，就他們自己所談的理由：（一）起義依靠的主力新軍二標，將於5月初退伍，（二）各路選鋒雲集廣州、香港兩地，曠日持久，生活經費將難于支持。（三）清吏偵查嚴密，廣州所設秘密機關，恐不能常保。其實，這些原因只能說明革命派力量的薄弱，和起義的單純軍事冒險性質。

4月25日（旧曆3月27日），粵督張鳴岐從順德調回巡防營三營，準備鎮壓革命，部分黨人害怕黨中有奸細混入，起義秘密已經洩漏，要求改期，黃興認為改期無異解散，準備以一人死拚李準，“以謝海外同志”，但仍令各部退出，免被搜捕，由于這一決定，退出的選鋒達三百餘人。4月26日又有報告說：從順德調來的防營，哨官十分之八是同志，同時，清政府已下搜索戶口之札，日內即要實行，于是又密電香港，仍定旧曆3月29日起義，香港方面因為收到電報的時間太晚，留港選鋒三百

多人，無法同日趕到，電廣州請展緩一日，部分黨人如陳炯明、胡毅，即以此電報為借口，按兵不動，等香港選鋒于4月28日（旧曆3月30日）到達廣州時，起義已經失敗，可以看出革命派臨事張皇，既不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又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往往寄希望于不可靠的外援上，起義之必將失敗，已成定局。

4月27日（旧曆3月29日）因退出廣州的選鋒未能趕到，原定十路進攻計劃不能實現，乃改為四路，由黃興、姚雨平、陳炯明、胡毅分任指揮，決定五時半出發，到期，陳炯明畏縮不敢動，胡毅借故出城不歸、姚雨平領械未到，三路均未出動，只有黃興一路，率百餘人攻入督署，張鳴岐逃走，起義軍縱火焚毀督署後退出，遇李準率兵來攻，乃分三路出擊。一路出小北門接應新軍，一路攻督練公所，一路出大南門接應防軍。因其他三路未出動，眾寡懸殊，前兩路皆被敵人沖散，死傷極重。黃興出大南門一路，遇防營溫帶雄部，不知為同黨，互相射擊，溫帶雄犧牲，黃興部亦大半傷亡，一次轟轟烈烈的起義，就這樣失敗了。事後由同盟會會員潘達微通過善堂出面收烈士遺尸得七十二人葬黃花崗，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名，遂長留史冊，永垂不朽。

廣州決定4月27日起義後，曾通令惠州及附省各地民軍同時發動。到時，惠州等地皆未發動，惟順德方面農民軍于30日在樂從圩起義，4月2日進攻佛山，南海、順德各屬，紛起響應，聲勢浩大，清政府派大批軍艦與防軍前往鎮壓，5月2日起義軍始被擊散①。

1911年同盟會在廣州的起義是一次偉大的起義，根據它的計劃，不單純是廣州一隅的暴動，而是準備和兩湖三江的革命軍會師長江，實行全國大舉，規模之大和投入人力物力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更重要的是這次起義極大多數的參加者，特別是流血犧牲的烈士，志趣的純潔，鬥爭的英勇，以及在敵人面前所表現的寧死不屈的精神，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史写下了最光輝的一頁。

黃花崗殉難的烈士，幾乎每個人都抱了必死的決心，而這種決心，又都是從熱愛祖國、挽救祖國危亡出發的，可歌可泣的事例，舉不勝舉。烈士林尹民曾介紹人入黨，被介紹者顧戀家族，林尹民痛哭流涕地對他說：“余豈不知家族可戀，顧中國將亡，何有于家族，毋寧立定主義，于必不可犧牲必

① 嶺南牛翁 辛亥粵亂匯編 第五章 城鄉之風鶴 手抄本。

不忍犧牲者而犧牲之，假能奮袂而起，光復神州，快何如邪！”^①烈士馮超驥赴義前，父已病危，躊躇不敢行，後來下決心說：“國事公也，家事私也……吾寧受負父之大罪，不能失此千載一時之機，而終為亡國奴也”。行至中途，聞父凶耗，一慟几絕，仍決然赴義，慷慨犧牲^②。烈士方聲洞給他父親的絕筆說：“外患逼迫，瓜分之禍已在目前”，“男兒在世，不能建功立業以強祖國，使同胞享幸福，雖奮鬥而死，亦大樂也”。“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為中華新國民，則兒雖死，亦瞑目于地下矣”^③。林覺民給愛人的遺書更沉痛地說：“吾自遇汝以來，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云，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夠”。“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而不顧汝也。汝休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為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永福也，汝其勿悲”^④。這種甘願犧牲個人家庭幸福，為天下人謀永遠幸福的高尚情感，多麼令人感動，從烈士們的遺言中，可以反映出烈士們高尚純潔的愛國主義精神。

在鬥爭的過程中，參加者躍躍爭先不怕犧牲的精神，也十分令人感動。老同盟會員譚人鳳須髮蒼白，堅持領槍加入決死隊。朱執信素文弱，隨黃興攻督署，勇敢殺敵，“無絲毫怯懦之志”^⑤。喻培倫一臂已殘廢（制炸彈受傷），同志阻其行，奮身不顧，負炸彈一巨束，左手持號筒，右手執短槍，猛攻督署，後與大隊散失，入元盛米店，與敵人相持至次日，以炸彈自焚^⑥。馮超驥奮身搏戰，縱彈橫掃，身被十餘創，尚挺立左右手握槍而戰^⑦。陳更新與敵人相持三晝夜，無眠無食，目紅如血，彈盡力竭被捕^⑧。所有參加戰鬥的志士，完全置死生於度外，被捕後，非僅毫無懼色，反而向敵人宣傳革命大義，最後不屈而死，真不愧為民族之精英。

這一次起義，經過了較長時期的準備，參加鬥爭者又如此英勇和不怕犧牲，為什麼結局仍歸於失敗？應該承認同盟會的領導軟弱無力，是失敗的主要原因。同盟會是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政黨，在籌備廣州起義的過程中，受本身階級性的局限，始終沒有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的思想。從庇能會議到起義爆發，沒有在人民群眾中做過思想發動工作。他們雖有會師長江，把革命的火把，燃遍全國的計劃，但對全國廣大人民自發的反抗運動和革命要求，並沒有準備和他們進行聯繫，主動配合。起義爆發前，群眾根本不知道這次起義是什麼一回事。沒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得不到群眾的支持和幫助，

僅憑少數人的不怕犧牲，是不能取得起義的勝利的。同盟會在組織力量時，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新軍、防營、民軍以及同盟會會員組成的選鋒身上。新軍、防營士兵，大部分雖是穿著軍衣的勞動人民，有同情革命的傾向，但他們和封建反動政府仍存在着僱傭關係，或多或少仍對統治者抱有幻想。其中軍官一級雖有個別參加革命，但患得患失，動搖不定。苟得升官，不惜出賣革命，如郭人漳、陶懋榛即是其中兩個例。至於民軍，多數是會黨分子，會黨雖然有一定的革命性，但封建色彩和流氓作風，必須經過嚴格的教育與改造，才能成為可靠的革命力量。同盟會領導對他們只注重利用的一方面，因此，這几种力量縱然都動員起來，也不能保證起義的勝利，何況同盟會在廣東軍隊方面所做的工作，遠不及武昌文學社、共進會在湖北軍隊中所做的細致深入。統籌部曾特設誦度課負責聯絡軍隊民軍，但負責人並沒有把這些力量很好的組織起來，也沒有做好調查研究的工作，過高地估計了新軍和防營的革命傾向。事實上，1910年新軍起義失敗後，革命勢力已大削弱，巡防營中革命力量更為薄弱，1911年廣州4月27日起義爆發後，鎮壓廣州和順德兩地起義的正是新軍和防營。所以黃興在給海外同志報告書中特別指出“巡防營與我黨相遇，到處敵視”。溫帶雄入城之所以不早掛臂章，就是因為有這種顧慮。廣州起義後，附省各地除順德外無一響應，可以看出聯絡工作的不夠深入。

同盟會領導4月27日起義，是有較嚴密的組織的，但統籌部領導幹部之間的意見並不完全一致，各課互不通氣，組織成員的組織性與紀律性也極薄弱，少數人甚至貪生怕死，或充敵人奸細，或騙取巨款，破壞起義計劃。起義前，曾決定四路進攻，但發動以後，僅黃興一路出動，陳炯明畏縮不敢動，起義前十分鐘還要求黃興改期。胡毅借口延期，避向城外，姚雨平領不到軍械，束手無

① 鄒魯 廣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 頁132。

② 同上書 頁148。

③ 同上書 頁123—124。

④ 同上書 頁128—129。

⑤ 同上書 頁65。

⑥ 莫紀彭 辛亥三月二十九廣州血戰筆記（見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 頁225—227。）

⑦ 鄒魯 廣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 頁148。

⑧ 同上書 頁145。

策①，更恶劣的是馮意汉奉命刺杀李準，屢次推宕，不敢前往，并假托墮水染病，还乡調养。罗熾扬負責发动惠州起义，領去活动費四千元，任意浪費，毫无所获。陈鏡波充当李準奸細②，但懋辛在战事紧急时，將数十枚炸彈投入井中，事后投案自首③，处处表现革命队伍的不純和組織紀律的松弛。当日情况，几乎是乱成一团④，有人看到各处机关混乱情形，“飲泣謂此次恐又失敗”⑤。黃兴部从督署退出后，队伍散乱，几乎是人自为战，因为道途不熟，枪法生疏，很快就被敌人消灭了。以这样缺乏群众基础，缺乏組織紀律的队伍来領導全国起义，如何有胜利的可能。

1911年同盟会在广州的起义，誠然是一个失败的起义，这是当时主客观条件决定的，但决不能否定这次起义的重大意义。

4月27日起义（旧历3月29日）是中国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在全国革命风暴中給予清朝統治者的重大一击，起义虽未取得胜利，但清政府官吏在革命前面，早成惊弓之鳥。起义失败后，粵督張鳴岐除奏报清廷外，还三次电告各省督撫，要他們小心防范，此后各省清吏只要一听到革命党起事，就震駭发抖，这年武昌新軍第八工程营的炮声一响，鄂督瑞澂倉遑逃遁，即由于这种恐惧心理所驅使。其他各省清吏在武昌起义后，紛紛“輸誠反正”，也是因为革命党人激烈行动的威胁下，解除了武装。鎮压1911年广州起义的大劊子手李準，也知道“民心思汉，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維持”，派人到香港向同盟会“輸誠”⑥，因此，这一次起义虽是失败，但革命的阻力則大为削弱，武昌起义之能迅速发展，最后推翻了清朝專制政府，广州起义起了重要的作用。

1908年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核心組織同盟会已呈分崩离析的情况，底能會議決定在粵大举，各地會員意見虽不一致，但无不表示响应，甚至亲身南下赴义，留日同盟会會員尤踊跃，于是各地革命势力又紛紛汇集到同盟会旗帜之下。广州起义七十二烈士壯烈牺牲后，更在极大的程度上振奋了日漸涣散的人心，奠立同盟会与孙中山黃兴等人在群众中的威信。武昌起义的迅速成功和各省的相繼响应，除由于全国人民的广泛的反清革命声势外，同盟会領導广州起义的声威在社会各方面，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全国人民在此以后，进一步認識清政府的腐敗凶残，非彻底推翻反动政权不能获得革命的胜利，因而奋不顧身地投入战斗，踏着黃花崗七十二烈士

的血迹前进，1911年，四川人民收回路权的斗争和武昌起义，都是广州起义的繼續和发展。

这一次起义，不仅影响国内民主革命潮流的空前高涨，对海外华侨参加祖国的革命斗争与亞洲殖民地附屬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也起了激历和促进的作用。华侨在这次起义中，提供了大量的財力人力，从此华侨与祖国的命运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武昌起义爆发，国外华侨在精神和物力上，提供了更多的帮助。另一方面，由于大批华侨参加了国内革命的实际斗争，起义失败后，他們就从祖国帶去革命斗争的經驗，鼓舞着殖民地人民和西方殖民主义者斗争的勇气，列宁在1913年真理报上发表論文說：荷屬殖民地的民主运动的代表者，“是爪哇和其他群島上的很多华侨从本国帶來了革命运动”⑦，正是指参加这一次起义和辛亥革命其他战役的华侨。

在起义失败后，同盟会部分會員決定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認南部分会为友邦”，加紧对長江各省革命力量的領導。两湖方面过去只准备响应广东方面的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決定变被动为主动，不再依賴別处。等到铁路国有問題发生，四川保路风潮勃发文学社和共进会两組織合并，积极准备起义，派人到滬与同盟会中部总会联络，愿意进一步接受領導，并函黃兴到鄂主持。黃兴此时虽仍居香港，但已主张“以武昌为中枢，湘粵为后劲，宁、皖、陕、蜀同时响应以牽制之”，建議联合十一省同时大举，并決定赴“長江上游期与会合”这样，各方面的意見，就逐漸趋于一致，同盟会中部总部的宋教仁，譚人凤也屢往武汉与孙武、居正等筹商进行方法，于是，十月間有武昌起义的爆发，可见1911年广州的起义，直接促成武昌起义的成功。

1911年同盟会在广州的起义虽因历史条件的限制和領導階級的階級局限性，最終归于失败，然而，

① 邹魯 广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 頁66 黃兴致海外报告。

② 同上書 頁2、31。

③ 莫紀彭 辛亥三月二十九广州血战筆記；辛亥粵乱汇编 第七章 革命党之自首 抄本。

④ 参看譚人凤、莫紀彭、魏紹周等人回忆。

⑤ 魏紹周 广州三月二十九革命之經過 南京三所史料整理处档案〔十三〕7485。

⑥ 辛亥革命〔七〕 頁245。

⑦ 列宁 亞洲底觉醒 列宁斯大林論中国 頁39。

它所导致的影响和本身所显示的意义，仍不失为一次伟大的起义，特别是七十二烈士为祖国富强和人民幸福而抛头颅洒热血的爱国主义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不能忘记，今天强大的祖国和美好的生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近百年来无数先烈牺牲奋斗的結果。我們还要知道，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里，资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起义，一次繼一

次地都失败了，直到无产阶级成为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才获得了胜利，使又穷又弱的祖国走上日益富强繁荣的道路。今天，已沒有任何力量能够阻碍我們的前进，我們必須学习先烈革命牺牲的精神，鼓起革命干劲，迎接社会主义大跃进的高潮，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

华南师范学院制訂第二个五年科学研究规划的情况

华南师范学院在寒假中初步制訂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間的科学研究规划，各系提出共135个项目。这个规划总的精神是：进一步开展科学研究，除紧密结合教学、面向中学、着重师范特点，使科学研究工作更好地为教学服务、为中学服务外，应結合当前政治斗争和本省生产建设需要，贯彻科学研究为政治和生产服务的方針。在方法上着重調查实验研究，解决实际問題。提倡集体研究，发挥教研組的集体力量，并与本省文教部門、中等学校和有关單位紧密合作。

根据制訂规划的总精神，在全校初步提出的135个研究项目中，研究当前中学教育問題的有：教育方針、劳动教育、基本生产技术教育的实施、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中学制度和中学教材教法等各方面重要問題。在教育系提出的36项中，这类題目共占四分之三，其中有方悖頤教授的“如何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新教育方針”；陈汉标教授的“关于生产技能的形成过程的心理学研究”；周信銘、司徒汉賢教授等关于中学生紀律行为的研究；汪德亮教授关于中学半工半讀制度的研究；扬荣春教授的“从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看目前勤工俭学的意义”以及其他教师关于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实施的研究等。至于文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系提出的项目中，也有关于中学各科教学的研究，如历史政治系陈善洪講師研究中学历史課堂教学上的几个問題；中文系丘述堯講師研究关于高中

文学教材教法等等。

批判资产阶级学术观点，是规划的重点之一。在有关的研究项目中，主要以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学术观点为主，如中文系批判右派分子丁玲、艾青的創作思想；历史政治系分別批判向达、雷海宗、宋云彬等右派分子的反动历史观和学术思想上的修正主义观点。此外教育系还提出了批判德国格式塔心理学家勒温的现时原則、測驗学等资产阶级心理学的項目。

着重地区性的調查研究也是这一规划的一个特点。历史政治系提出的关于广东历史文物的調查研究项目中有：粤北地区（翁源）的考古发掘；以海南島黎族为重点进行华南地区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广东人民反帝斗争史迹調查及專題研究；广东乡土历史教材的搜集和研究以及广东重要史学家及其作品研究等等。

此外，在專題研究方面，如中文系黃軼球教授在已取得初步成績的基础上繼續研究越南古典文学；廖苾光教授进行有关文艺学及美学概論等的理論研究；吳三立、刘晃辞教授对于汉语发展史的研究；历史政治系洪启翔教授关于中日关系的研究；教育系李匡武教授关于荀子的邏輯思想和学說的研究等，都是规划中的重要研究項目。

該院这一规划最近將結合学院三年大跃进规划的討論进行修訂，并将进一步具体化。

（师院研究部）

1921年以前广东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

李稚甫

一

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和形形色色的敌对思想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这一点在中国也不能例外。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以前，中国思想界情形，非常混乱。早在19世紀末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社会学說，通过严复(1853—1921)比較系統的介绍，在中国资产阶级知識分子中，得到一定的传播，其所介绍的社会政治观点，和追求“科学”与“民主”的倾向，在当时中国的思想界，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到20世紀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組成反清統一战綫的同盟会，并出版了“民报”，作为宣传革命的思想陣地。在“民报”中，不唯宣传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說，同时并就中国根本問題，即“革命”与“开明專制”問題，与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了大规模的思想論战。双方为了強調和論証自己的論点，介绍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观点，因此也接触到当时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这一点在“民报”中表现得比較突出。革命派的政論家朱执信，在“民报”上曾发表过“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了馬克思、恩格斯和拉薩尔的生平和“共产党宣言”的要点，但他是用资产阶级观点来理解“社会主义”的，因此不能作出正确的理解。以梁启超为主編的“新民从报”，也曾介绍过社会主义，但资产阶级改良派介绍社会主义，是为了宣传改良主义，他們把馬克思主义，費边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同列为“狭义的社会主义”，得出了中国宜采行社会改良主义的結論，因此也不可能作出正确的介绍。所以，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概念，是非常模糊的。誠如瞿秋白同志所指出：当时所謂“社会主义的学說，其实帶着无政府主义的色彩”^①。因此在辛亥革命以前，所謂社会主义，常与“无政府主义”这一概念，混淆不清。在“民报”中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多半是介绍无政府主义的，而中国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知識分子，在十月革命以前，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不仅是相当普遍，而且影响亦較为深远，辛

亥革命前在海外流亡的革命知識分子，不唯接受了无政府主义而且宣传了无政府主义。李石曾、吳稚暉等于1907年，在巴黎创办了“新世紀”刊物，專門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张繼在东京创办“天义报”和“社会主义講習会”，来鼓吹无政府主义，张繼在1903年所編譯的“无政府主义”小册子，具体介绍俄国无政府主义者所进行的个人恐怖手段。1904年在上海出版的署名金一（金天翮）所著“自由血”小册子，亦极力鼓吹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暗杀政策。在辛亥革命以前，同盟會員在国内所进行的个人暗杀活动，是与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和所謂“鉄血手段”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在同盟會員中有比較广泛的影响。

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以前，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泛滥，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首先是在于中国是小资产阶级众多的国家，他們面对着中国社会政治危机，在政治思想上希望一步登天，很快就能达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他們不愿作長期的、艰苦的和残酷的阶级斗争；无政府主义的实质，本是小资产阶级的反动空想，因此它在中国的传播，是很容易得到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識分子的“欢迎”与同情，它們有着共同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另外中国長期以来的封建專制統治和清政权的腐朽，亦容易使这一些人，对于政府、法权和政治活动，产生极端厌恶的情緒，和取消政权消灭国家的思想。在另一方面，中国旧的传统思想——老子、庄子的虛无思想，在知識分子阶层，有着深厚的影响，这也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传播造就了客观的有利条件。更重要的是長期习惯于落后、分散的經濟結構的小资产阶级知識分子，他們对于先进的大生产的經濟制度和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政治制度，抱有怀疑和抵抗情緒，因此在十月革命以前，他們不可能正确理解馬克思主义和接受它作为政治斗争的指导思想。同时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当时尚处在幼稚的阶段，中国工人阶级尚

^① 瞿秋白文集第一卷“饿乡紀程”25頁。（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未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因此，小资产阶级的反动空想的无政府主义的传播，就有了广阔市场。而它的广泛传播，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着直接阻碍的作用，因此在1921年以前，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活动和组织活动，是中国无产阶级在思想上，政治上最凶恶的敌人，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以前，先进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少受着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甚至在党正式成立前后，也还影响到个别的地方共产主义小组个别成员，因此，在党成立前后，和无政府思想作斗争，消除他们的影响，争取更多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就成为先进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

在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广东曾经有一段时期，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主要活动阵地，他们曾广泛地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而其影响及于全国。他们不仅宣传无政府主义学说，并且公开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态度上，他们既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同时也反对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民主主义革命，认为它是不够“彻底”和“自由”的；他们也进行工人运动，提倡所谓“工团主义”。因为他们是以“左”的最彻底的革命姿态出现，很容易迷惑狂热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因此，先进的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为了清除无政府主义的广泛影响，必须在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与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斗争，而这一斗争，也就成为党在正式成立前后所进行的巨大思想工作。刘少奇同志曾经这样指出：“在起初各派社会主义思想中，无政府主义是占着优势的。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到处都与无政府主义拥护者争论着，斗争着。马克思主义直至在各方面克服无政府主义以后，并与中国的工人运动，人民反帝运动结合以后，才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雄伟的力量。并在这以后，马克思主义永远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占着主要的地位”^①。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各式各样的敌对思想进行斗争的历史，我们有必要对无政府主义者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所进行的活动加以研究。既然广东在现代历史上，曾经是无政府主义的活动基地，对这一方面资料，也应及时加以搜集和研究。现在根据初步接触的一些资料^②，对1921年以前，无政府主义者在广东的活动，作一简要的介绍，主要是以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1884—1915）所进行的宣传和组织活动为中心，说明它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所进行的活动及其反动本质，并期继续发掘这一方面的资料，进一步加以研究。

无政府主义在广东的传播，是与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的活动分不开的。刘师复是广东中山县人，他在1904年赴日本留学，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他参加了同盟会，从事革命工作，1906年回国至香港，参加香港东方报的编辑工作。1907年同盟会准备在广东组织武装起义，孙中山先生派遣许雪秋、邓子瑜两人赴潮、惠两属，进行活动，并且准备暗杀两广总督岑春煊和水师提督李准，以消除革命的阻力。因为刘师复在东京曾学习过制造炸弹，因此派他到广州秘密机关，担任实行暗杀李准的工作。在1907年6月11日（旧历5月1日），刘师复在寓配制炸弹，发生爆炸，为清政府军警发觉，他在医院中被捕，因为没有充分证据和党人的营救，他被送回原籍监禁，到1909年被保释放至香港。在此一时期，他通过巴黎出版的无政府主义的刊物“新世纪”的介绍，开始了对无政府主义的研究。在1911年武昌起义前夕，他准备去北京，刺杀清政府摄政王载灃，等他到上海后，清政府已被推翻，他认为无政府主义已获得了传播的机会，因此回到广州，在广州西关存善东街八号，组织了“晦鸣学舍”，作为无政府主义的宣传机关，他在1914年代表中国“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写给“无政府党万国大会”的信中曾经指出：“晦鸣学舍发起于广州，是为中国内地传播无政府主义之第一团体。”^③事实也是如此。在1911年以前，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基地，是在东京和巴黎，而且当时无政府主义的刊物“新世纪”和一些宣传性的小册子，因为清政府的严禁，在国内传播不广。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后，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国内传播，有了条件，因此，刘师复所组织的“晦鸣学舍”成立后，首先大量翻印巴黎出版的无政府主义小册子，他先后辑印了“新世纪丛书”和“无政府主义粹言”两种，又将此二书中的主要内容，辑印为“无政府主义名著丛刊”。前两种在1912年7月共印了九千册，因为是非卖品，很快就送完，在大量印发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小册子的同时，又创办了“晦鸣录”（后改为“民声周

① 丁守和：“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112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② 广东省文史馆郑彼岸先生和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提供一部分资料。

③ “师复文存”259页。（1927年广州革新书局版）

刊”），进一步鼓吹无政府主义。在1912年，刘师复约集友人，组织了“心社”，提出了十二条“戒约”，作为躬行的标准；①1913年国民党反对袁世凯斗争失败后，龙济光到了广州，因为“民声”宣传无政府共产主义，被禁止出版，“晦鸣学舍”被查封，是无政府主义者在广州第一次遭受的打击。刘师复把全部机构迁到澳门，继续出版“民声”，袁世凯令外交部照会葡萄牙公使，禁止无政府主义者在澳门的活动，因此“民声”在澳门出了两期，又被迫停止。当时广州反动政府，准备派人绑架刘师复至前山，没有得逞。刘师复在1914年在上海恢复了“民声”的出版，并且发起组织“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发表宣言，说明无政府主义的意义及无政府党联合的必要，并与流氓政客江亢虎所组织的伪社会党进行了斗争。在1914年第8月与国际无政府主义政党建立了联系，在此一时期，无政府主义者，亦开始注意工人运动，并准备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工作，宣传所谓工团主义。1915年3月27日，刘师复以肺病逝于上海。他虽然死去，因为他生前所进行的组织宣传活动，已在广大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有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在1915年以后，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在这一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并且一直延续到五四运动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因此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者，为了肃清无政府主义思想在革命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坚决与他们进行严重的斗争。1920年以后，“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所发表的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文章，就是这一斗争的体现。毛泽东同志在长沙领导工人运动时，就曾对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批判，并把他们争取过来。因此我们不可忽视这一与马克思主义敌对的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革命所起的有害影响。

三

广东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从1912年至1914年，是进行广泛的宣传活动时期，在这一时期，他们创办了“晦鸣学舍”，作为宣传机构，并出版了“晦鸣录”后改为“民声”的刊物。根据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有下列几种：

（一）新世纪叢書：是翻印巴黎“新紀世”所刊行的小册子，内容包括六种（1）；革命（2）；思审自由（5）；告少年（克鲁泡特金著）（4）；秩序；（5）世界七个无政府主义者；（6）无政府共产主义。

（二）无政府主义粹言：其中包括有：巴枯宁

学說、克鲁泡特金学說、工人无政府主义談、法律与强权等16篇，并有宣传世界語專文一篇。

（三）无政府主义名著叢刻：根据上面二書的主要内容重編，用晦鸣学舍名义出版。

除上述三种外，有“軍人之宝筏”与“晦鸣录”第一期二种，在广州尚未发现传本，从他们所刊行的三書内容来说，其所介绍的，几乎包括了无政府主义的三个流派：即无政府个人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和无政府共产主义。因此它的内容是庞杂的。从刘师复的思想发展来看，他是从无政府的个人主义到无政府的共产主义，因此他的著作，特别是论无政府主义的論文，是拥护克鲁泡特金的学說的。在上海组成“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时，他已由理論轉入实践，他非常注意工人的罢工活动，并刊行了“工人宝鉴”，鼓吹工团主义，在工人群众中进行活动。刘师复死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创办了“劳动”杂志和“进化”杂志，并开始帮助工人组织工会，就是沿着刘师复所主张的路綫。工团主义的实质，是否定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是分裂工人运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体现，他们假装“放弃”政治，而其实际在使“工人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的政治”②。因此不论在理論上和实践中，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都是阻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分裂中国工人运动的。特别是从刘师复在“民声”周刊所发表的讨论无政府主义的文章看来，更可以清楚地见到这一点。

无政府主义者从那几个問題上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呢？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說，反对无产阶级專政，否認阶级斗争；从小资产阶级的绝对平均主义空想出发，反对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主张“彻底”的个人自由意志，反对群众的革命斗争。而这些正好说明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根本分歧，说明无政府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空想的反动本质。

刘师复在“晦鸣录”的发刊詞中，曾这样揭露他们自己的主张是“共产主义”，反对軍国主义；工团主义，反对宗教主义，反对家族主义，素食主义，語言統一，万国大同。”③这说明了他们介绍

① “戒约”内容，是指①不食肉②不飲酒③不吸烟④不用僕役⑤不坐轎及人力車⑥不婚姻⑦不称族姓⑧不作官吏⑨不作議員⑩不入政党⑪不沿海陸軍人⑫不奉宗教。見“师复文存”4頁。（1927年广州革新書局版）

② “簡明哲学詞典”548頁。（人民出版社版）

③ “师复文存”58頁。（1927年广州革新書局版）

和研究的方嚮，在此一時期，他在思想上尙未有完整的體系，不過是一些概念的綜合。1914年7月，
✓“無政府共產主義同志社”成立於上海，發表宣言，提出了比較具體和明確的主張；宣言說：

6 “無政府共產主義者何？主張滅除資本制度，改造共產社會，並不用政府統治者也，質言之，即求經濟上及政治上之絕對自由也。”①

根據他所說：所謂政治自由，即廢除政府和強權制度，要達到“無地主，無資本家，無首領，無官吏，無軍隊，無監獄，無法律，無宗教，無婚姻制度之社會。”而所謂經濟自由，則是一切生產機關，歸之社會“公有”，本“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用劉師復自己的話來說則在“(1)抵抗——如抗稅，抗兵役，罷工罷市等。(2)抗動——如暗殺暴動等，此兩種手段，既所以反抗強權，伸張公理，亦所以激動風潮，偏傳遐邇。”②從上引的材料，不難看出這一些“主張”的空想成分和反動本質。首先因為他們反對無產階級國家學說，認為既然生產資料歸為公有，還要無產階級專政，保存國家機器，是“不徹底的革命”，因此他們要廢除政府，實行無政府共產主義；另外一方面，他們為了要实现所謂絕對自由，認為國家和法律，都是限制個人絕對自由的東西，因此要加以廢除。他們既不能認識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本質區別，也不認識“自由”
✓這一概念的階級本質。這些從極端個人主義立場出發，反對一切國家存在的論調，正十足反映了小生產者對於集中管理的大生產制度的反感，和小資產
✓階級個人主義對於集體主義的抗拒；在經濟自由方面，他們認為按勞取酬，是“不徹底”的分配方式，他們主張立即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這種一步登天的思想，是完全違背實際的，因為如果不按照生產力的發展，來規定分配制度，那將造成混亂，有害於革命。因此無政府主義者宣傳不要國家的思想，對革命的進行是非常有害的，因為勞動者在革命勝利後，不建立自己的政權，那就是讓剝削階級復辟。無政府主義者天天空想自由組織社會的實現，而又反對實行政治鬥爭，空談“社會革命”，特別是用這種思想，來指導工人運動，那就是瓦解工人階級的鬥志，使他們不能提高自己的階級覺悟，和依靠工人階級自己的政黨，進行鬥爭。中國無政府主義者宣傳工團主義，正是利用“組織工會”和同情罷工為名，麻醉工人階級的意志，

並把他們引導脫離革命。劉師復在“上海漆業罷工風潮”一文中說：“獻議於中國一般之勞動家者，不外六字曰‘結團體，求知識’。而認為‘工團之宗旨’應以革命的工團主義為骨髓，而不可含絲毫之政治意味”③。可見他們認為勞動者的急務，是“尋求知識”，回避政治，而不是進行鬥爭。無政府主義者從實際工人運動中，來與馬克思主義者爭取領導權，並通過它來取消階級鬥爭。中國無政府主義者這種有害的活動，嚴重地妨礙了工人階級自覺性的發展，因此他們在中國革命實踐過程中所起的壞影響，大過于他們在理論工作中所有的危害性；當然，無政府主義者所謂實踐，亦是通過其理論指導來執行的。從廣東方面來說，早期的工會組織，如茶居工會和理髮工會，是在無政府主義者領導下組織成立的。鄧中夏同志曾經指出“無政府黨在南方工會中有很大影響”。據他回憶說，“當時相傳在劉師復領導下所組織理髮工會，就存基金十萬元”④。可見他們勢力的雄厚。因此劉師復在廣東的活動，不僅在於他致力於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傳播，同時在工會組織工作上，亦留下了相當的影響。在共產黨成立以後，廣東共產主義小組，因為部分人受到無政府主義思想的侵蝕，在領導工運方面，會表現得軟弱無力，只是由於以後把他們清洗出去，並且與無政府主義從思想上展開了鬥爭，才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此後廣東工人運動，就在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下，走上了蓬勃發展的道路，直至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的召開，逐步清除了無政府主義者在工會組織中的影響。

在思想戰線上，“共產黨”月刊與“新青年”雜誌，從1920年起就對無政府主義思想，進行了比較系統的批判、指出他們否定無產階級國家學說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反動實質，進一步地澄清了無政府主義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的影響，並把他們尽可能爭取過來參加革命，因此無政府主義者在中國革命過程中所謂“優勢”，也隨着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工人階級政黨的壯大和發展而逐步消失。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思想界中，逐步擴大了領域和鞏固起來，這就促進了中國革命的發展，並順利地步入1924—1927的大革命的高潮。

① 引見同上 53頁

② 引見同上 48頁

③ 引見同上 84頁

④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4頁—15頁。

說“非人者必有以易之”

杜守素

“非人者必有以易之”（“墨子、兼愛下”），這是墨子表示他“以理服人”的辯論態度。這種精神貫徹整個“墨辯”①，規定了墨家對於邏輯的看法；也影響了戰國辯說的作風，尤其是荀子。

墨子主張兼愛——“兼相愛，交相利”，以為這樣就能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君能這樣做、稱為“兼君”，士能這樣做、稱為“兼士”。反之，不能兼相愛、交相利，則稱之為“別君”“別士”。一句話說，墨子是以“兼”與“別”對立；譽“兼”而非“別”。且引他兩段話：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為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為事者也。然則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國之與國之相攻，家之與家之相篡（逆而奪取曰篡），人之與人之相賊，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誼，此則天下之害也。然則崇（參照他處說話，崇應作察）此害亦何用（用、以也）生哉？以相愛生耶？子墨子言（曰）：以不相愛生。……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眾必劫寡，富必侮貧，貴必敖（傲）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兼愛中”）

“……然即之（則此）突別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无若非人而无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水也，其說將必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必易別。”（“兼愛下”）

“兼愛”三篇，是墨子弟子記錄墨子中心思想之一——“兼相愛、交相利”的學說②。上面所引兩段文字，也表示了墨子在和論敵作理論鬥爭的方法，即是以自己的主張與論敵的見解對立起來，從而揭發對方的錯誤，申述自己的正確，摧毀而替代之的方法：邏輯上所謂“立論破”是也。

“立”指“立正”，“破”即“破邪”。真能立正，愈能破邪；而破邪原為立正。“他山之石，可以攻

玉”，從來正確的理論，幾乎沒有不從理論鬥爭中建立而發展壯大起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文獻，如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後來發展為“資本論”）、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列寧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以及毛主席的“實踐論”和“矛盾論”等等，都是顯著的例子。即以“墨辯”而論，“經下篇”還保留着不少這樣的痕迹，其顯著者如：“五行毋常性，說在多”；“以言為尺諄、諄，說在其言”；“學之無益也，說在誹者”；“非誹者諄，說在弗非”等等都是。

雖然，以墨子為首的墨家，並不孜孜以辯論為事，故其邏輯的研究，首先在於“自悟”，在於“能立”。因為先秦諸子之著書立說，都有共通的目的和要求，都要“以其學易天下”，並不是為思想而思想，為邏輯而邏輯，更不是為辯論而辯論。甚至被莊子譏為“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莊子天下”篇）的公孫龍，也不自甘於“辯者”。“公孫龍子，迹府”篇正說是：“公孫龍……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材之所長，為守白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辯。……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態度何等嚴肅！魯勝所稱“……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于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汙隆，名之至也”，可謂深得當時的情實。魯勝又說：“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③這是有証有據的說法。我們可以从荀子批判莊子和宋子等都採用“立論破”的方法而得到了解。

荀子批評莊子說：“莊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莊子、解蔽篇”）。這裡，“天”謂天然自然，

① 墨辯包括經上、下，經說上、下及大取、小取六篇。

② 墨子兼愛等篇都分上、中、下，疑墨家三派各述師言的記錄。

③ 見晉書隱逸傳魯勝墨辯注序。

“人”謂人工技巧。“庄子以‘复归于自然’为道之极軌，而不知人治之有加于天行”（梁起超語，見梁起雄“荀子簡釋”引）。庄子重視自然的观点，在他所說的下面两个故事表现得最为突出：

“有成与亏，故（古）昭氏之鼓琴也；无成与亏，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庄子，齐物論篇”）。

“昭氏之不鼓琴也”（“庄子，齐物論篇”）。

这是說：鼓琴时对众声有所取，同时便有所遺，不若任天籟之自然而完全。所以，郭子玄注云：

“夫声不可胜举也。故吹管操弦、虽有繁手，遺声多矣。而执籥鸣弦者欲以彰声也（彰，扬也），彰声而声遺，不彰声而声全。故欲成而亏之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无亏者，昭文之不鼓琴也。”如果照庄子的主张放任下去，我們就不会有什么音乐的創作，有的、將永远是一些鷄鳴犬吠、风声海涛之类罢了！另一个故事：

“南海之帝为儻，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渾沌。儻与忽时相与遇于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儻与忽謀报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嘗試凿之。凿一窍七日而渾沌死。”（“应帝王篇”）

郭注云：“为則取之”。就是說，加上人工，自然就被破坏了。这可說是极端反对文化的见解。因为無論什么文化都是給渾沌凿窍的工作，都是人类征服自然的結果，都是“开物成务”的業績。

荀子重人为，崇习积。故其批評庄子說是“蔽于天而不知人”，即要以“人”与“天”对立而替代之。而其所謂“人”則以他的“戡天”主义（征服自然）的思想为根据的。他在“天論”篇，既認“天行（道）有常，不为堯存，不为桀亡”，并把天看做“列星隨旋，日月遶炤（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轉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的大自然，是离开人的意識而独立存在的東西。因而主张：“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裁）之！从天而頌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騁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万物之情。”（均見“天論篇”）这是多么积极的态度！把人抬到很高的地位。这才是真正地实现儒家所老在空談着的“与天地参”的理想；不只要說明世界，而且企图改造世界。（“解蔽

篇”还有批判地接受宋〔舜〕尹〔文〕关于“心”的作用的学說，即踏襲了他們“虛壹而靜”術語，却以自己的见解去替代他們所規定的，最是一个很典型的“立論破”的例子。这里不加說明，有兴趣者請參看杜国庠“先秦諸子的若干研究109至115頁。）

现在，我們回头來談談墨家对于邏輯的看法。

“小取”篇概括地定义般地敘述了邏輯——“辯”的內容：“辯”的目的、途徑、方法及辯論所应守的道德：

“大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紀，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焉，于是也）摹略万物之然，論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說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諸己不非諸人，无諸己不求諸人。”（“墨子，小取篇”）

應該略加說明：“（一）將以明是非之分”至“决嫌疑”六句，說明“辯”的作用，也是所以有“辯”的目的。概括地說，就是別同异，察名实，明是非；而別同异、察名实，又是明是非的根本。（二）“焉摹略万物之然”二句，說明所以同异（包括名实一致与否講）的根源在于“万物之然”，不明白万物的真情实况，就不能知“类”，也就无从明“故”。这是屬於“亲知”的范围，屬於感性的認識，直观的知識。至于“論求群言之比”，則屬於間接的知識，“群言”自屬“聞知”的事体，“論求”而“比”之，这就进入“說知”的領域，屬於理性的認識、邏輯的認識的了。（三）再次，“以名举实”五句，說明“辯”的程序和方法。“以名举实”，相当于概念的形成为；“以辞抒意”，相当于判断的形成为；“以說出故”，相当于推理的过程；“以类取，以类予”，“取”是举例，“予”是判断。（四）“有諸己不非諸人”二句，說明用“辯”的道德。这是墨子“非人者必有以易之”的的思意發揮。

由于“非人者必有以易之”的辯論的态度，也由于墨子“有道者劝以教人”的“为义”的精神，故墨家的邏輯重視“自悟”过于“悟他”。就是說：他們是把邏輯看成求真理的工具的。这和“因明”頌——“能立与能破，及似，唯悟他；现量与比量，及似，唯自悟”——的首标“悟他”者，微有不同④。

④ 見“因明入正理論”。

宋元俗語研究三例

刘逸生

近年頗愛研究宋、元兩代俗語，在探索研求中，感到在引証取材上、使用方法上有些問題值得談談。因舉三例，以申鄙意。

一、趙杲送曾哀

元人雜劇中常見“趙杲送曾哀”一語。如：

“兒女團圓”劇二：“每日家問春梅無信息。哎！他也恰便似趙杲送曾哀。”

“薛仁貴”劇二：“恰便似送曾哀趙蕪不回來。哎喲！兒也，我只道父子每相間隔，不想孩兒也儼然在。”

“牆頭馬上”劇二：“你道為甚着你個丫鬚迎少俊，我則怕似趙杲送曾哀。”

據上引三例，“趙杲（或蕪）送曾哀”一語，都是一去不迴的意思。這個涵義，近人已指出（如朱居易的“元劇俗語方言例釋”），但他引四川民間故事，“趙杲”作“趙顯”，却頗有問題。因

為“杲”“蕪”和“顯”，讀音完全不同，很難拉在一起。

元劇中也有作“趙杲送燈台”的。如：

“黃粱夢”劇二：“哥哥也，恰如趙杲送燈台。便道不為山河易改。恁時節和尚在？鉢盂在？”

是“送燈台”還是“送曾哀”呢？這得再向前探索。據歐陽修“歸田錄”云：“俚諺云：趙老送燈台，一去也不來。不知是何等語。天聖中，有尚書郎趙世長為留台御史。有輕薄子送以詩云：此回真是送燈台。其後竟卒於留台。”據此，可見北宋時已有此語，是“趙老送燈台”。但歐陽修也沒有深究這個故事的來源，故有“不知是何等語”的話。為什麼“趙老送燈台”就是“一去不回來”的意思呢？這就還須再加考究。

流行至今的一段“趙巧兒送燈台”的四川民間故事，可以揭開這個謎。這段故事大致是這樣的：

趙巧兒是魯班師傅的唯一徒弟，可是生性懶惰，又善作弊。常常把事情搞糟。有一次，魯班打算建一道石橋，因為海龍王在水底興波作浪，很難建成。魯班為了鎮壓龍王，便拿出一個木制的燈台來，交給趙巧兒送下海去。告訴他：龍王看了，就不敢興波作浪了。趙巧兒口里答應，心中可不佩服。他認為若果自己制個燈台，定比師傅的好。就暗中自制了一個，藏在身上。先點着師傅的燈台，分开水路，直朝龍宮而去。燈台果然發生效力，龍王一見，恭敬下拜，不敢亂動。這時趙巧兒要顯自己的本領，就拿出自己的燈台來，把油倒上去燃着。不料他這燈台是漏油的，火光突然熄滅。龍王馬上翻過臉來，依舊興波作浪，並且把趙巧兒趕出龍宮去。從此，趙巧兒就再也沒有回到師傅身邊了。

這個趙巧兒，很顯然就是“歸田錄”所說的“趙老”，也就是元劇中稱為“趙杲”的。我們雖然還不知道元代何以由“送燈台”變為“送曾哀”，但四川流行的趙巧兒送燈台故事，卻很能合理地解釋這句俗語的起源。而我們從這段故事，不僅進一步了解了宋元流行的這個俗語的來歷，而且也深感研究古代方言俗語的資料教材有擴大的必要。流傳在民間的無數故事或傳說，往往具有千數百年的壽命，它里面蘊藏着我們先民的智慧之光，也保存了不少至今有用的資料。不僅民俗學者、文藝工作者可以吸取利用，就是研究語言學的人，也能從其中找出有價值的東西。我們的眼光不應只局限於已成文字的古籍上，還須探向民間口頭流傳的故事傳說。

百条。我想这情况不会限于广东方言。

二、炭

前几年，国内不断发现太平天国文物。其中有些属于证明书之类的东西，有叫“粮挥”的，有叫“合挥”的。“挥”的含义是什么呢？经过一些考据学者的研究，才弄清楚“挥”是凭证、票据的意思。例如“粮挥”就是粮证，“合挥”就是结婚证书。

说起来似乎是笑话，这个要由学者考证决定的“挥”字，原来在广东人（包括说广州方言的和说客家方言的）口中至今还经常使用着。人们每天在说“车挥”“船挥”（即车票、船票），不过读音稍为变了一点，读成“飞”音而已。

用地方方言来反证古字的音义，过去也有人做过。不过多数是限于先秦、两汉的古籍，而且大抵是用以证明某地方言如何保存古音古义者为多。至于宋、元，大抵是距今不远，注意的人就少了。其实正因其不甚古，用今日的方言来反证宋元古语，以及用宋元古语来研究今日方言的演进变迁，却是大有驰骋的余地的。笔者在这里先举一个颇不为人注意的例子：

元人“东堂老”杂剧第三折：“扬州奴云：有人说来，扬州奴卖炭，苦惱也。他有錢时火焰也似起，如今无錢，弄塌了也。正末云：什么塌了？扬州奴云：炭塌了。正末云：你看这厮！”

“什么塌了”以下的三句话，如果不明白“炭”这个词的双关涵义，是无法领会其打诨的味道的。原来广州人口语中的“炭”，有安闲享乐的意思，但往往写作“叹”，如“叹世界”之类。按“东堂老”的剧情，扬州奴父亲留下万贯家财，由于扬州奴荒淫享乐，家产败尽，只有卖炭为生。所以正末问他“什么塌了”，他就答“炭塌了”。广州人一想到这个“炭”的双关义，就一定会觉得好笑。这也可以证明，用现存的地方方言来反证宋元俗语的涵义，是有其一定作用的。

笔者近年留心搜集，发现宋元（包括明代）俗语与广东方言之间其词义可以相互的证明，不下数

三、卖查梨

乾嘉朴学家的考证方法颇为严谨，考证一事，力排孤证。这是因为孤证加上主观，其所得结论，往往距离客观实际极远甚至相反。然而近来有少数的治学者，却往往持孤证来下结论。如朱居易的“元剧俗语方言例释”一书，就有这种毛病。

这里不准备谈朱氏的著作，只就元剧俗语中之一例，说明治学必须持以严谨的态度。

元剧中常见有“卖查梨”或“查梨”一词。据张相“诗词曲语辞释”“应昂”条引“谢天香”剧注云：“查梨相；卑鄙之貌。当时挑担卖查梨者，善于花言巧语。”朱居易的著作中，对此词解释基本上是采用张说的。但此词并不是卑鄙的意思，而是浮夸不实之意，并转而有轻佻义。

有下数例可证：

“雍熙乐府”卷三，“全昧了圣贤心”套：“也斜着眼脑胡支对，一会家意张狂脚步查梨。”这里“脚步查梨”，是脚步轻浮的意思。

同书卷四“卖笑排场”套：“我可便不张狂，打叠起一半查梨一半儿谎。”末句是说准备着一半虚浮，一半撒谎。

“摘翠百咏小春秋”之七：“咬文咀字卖查梨，作耍无真意。”这是说咬文咀字说些虚假浮滑的话。

“鸳鸯被”剧四：“问我陪着笑卖查梨。”这是说笑得轻狂。也是不老实之意。

“谢天香”剧二：“恰才陪着笑脸儿应昂，怎觑我这查梨相。”“查梨相”是轻佻的样子。

从上数例，可见“卖查梨”或“查梨”一词有轻浮或轻狂义，有虚夸不实义，都与韶笑无关。直至明初，朱有燬作“曲江池”杂剧，仍有“你休要卖查梨不诚实”语，可见此词的涵义，在明初亦未消失。张相著“诗词曲语辞释”，方法严谨，态度矜慎，仍不免千虑一失；仅凭孤证，遽下结论，那是更加危险的。

列宁、斯大林、毛澤东論反浪費

赵一之

目前，各級国家机关、学校、团体的整风运动已經先后掀起了新高潮，一个声势浩大的反浪費反保守运动正在开展。在全国范围，反浪費的大火正烧得滿天通紅。在这时候，重新溫习一下列宁、斯大林和毛澤东同志关于反浪費的教言，对我们是很有益的。

列宁和斯大林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設的各个阶段上，都极其重視同浪費现象作斗争。1918年4月苏維埃政权剛建立不久，列宁就提出要尽量利用和德国休战的时間来巩固苏維埃政权，扩展社会主义建設。他向科学院提出要“制定出改造俄国的工业并使俄国的經濟兴盛的計劃”，要求在这个計劃中应当包括：俄国工业达到合理的分布及最大限度地保証当时俄罗斯苏維埃共和国能够独立供給自己全部主要的原料和工业品，并着重地說：“要特別注意工业和运输业的电气化以及把电力应用于农业。利用次等燃料（泥煤、比較坏的煤），以便在开采和运送燃料上用最少的花費来取得电力”^①。就在同一个月里，列宁又更明确地指出：“精确而誠实地計算金錢，节省經濟，不懶惰，不盜公肥私，在劳动中遵守最严格的紀律——正是这些口号，从前被资产階級用来掩飾自己这剝削階級的統治地位时，曾为革命的无产者所正当譏笑过的，而現時在推翻资产階級以后，却已变成目前迫切的主要的口号了”^②。

因为苏联当时还是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仅在一年以前才推翻沙皇制度，仅在不上半年以前才肅清克倫斯基之流，社会上遺留不少的自发的无政府主义；同时还发生有不少的失望情緒和无端憤恨情緒；资产階級走狗們（孟什維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等等）还在暗中挑拨是非；經濟上存有很大的困难，摆在苏維埃政权的日程上的任务，就是要：恢复被战争和资产階級統治所破坏的生产力；医治由战争、軍事失败、投机业和资产階級破坏活动等所

造成的創伤，复兴国内經濟，牢固地維持起碼的秩序。因此，精确而誠实地計算金錢，节省經濟，不懶惰，不盜公肥私，在劳动中遵守最严格的紀律的口号，便为当时所迫切需要。对这些口号所表现的意义，列宁是在这样的原則高度来理解的，他說：

“一方面劳动群众切实执行这些口号，便是挽救被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强盜們（以克倫斯基为首）弄得半死半活的国家的唯一条件；另一方面，由苏維埃政权，用自己的方法，根据自己的法令来切实执行这些口号，又是社会主义彻底胜利所必要的和足够的条件”^③。列宁还說：“那班藐然拒絕將这些似乎是极其‘陈腐’和极其‘庸俗’的口号当作首要任务的人，正是不善于了解这层道理”^④。

事实証明：苏联人民根据列宁的指示，由苏維埃政权用自己的方法，实行这些口号，对摆脱旧俄国的穷困现状、恢复国民經濟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不能因此滿足。1923年3月2日，列宁在病中所写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仍然恳切地說：“我們应当使我們国家机关尽量节省。我們必須把国家机关中所有一切浪費现象的遺迹鏟干淨，而沙皇俄罗斯及其官僚资本主义机关所遺留在我們国家机关中的这种遺迹，尙是很多的。”^⑤在这一篇文章里，列宁不仅主张“以极大节省办法把自己社会关系中任何浪費现象的任何遺迹鏟除干淨”，并且認为这个办法是开展社会主义建設的一个好办法，他接着說：“我們只要能保持工人階級对于农民的領導，就能在我們国家里用极严格节省的办法把任何一点貯蓄都保存起来，借以发展我們的

① “列宁文选”，第二卷。

② 列宁斯大林論社会主义經濟建設，上册。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列宁文选，第二卷。

大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化；加紧开采泥炭，完成瓦尔霍夫水电站建筑工程等等”。接着，他又强调地说：“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用个比喻来说——从一匹马上跨到另一匹马上，由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由依靠于破产农民国家的种种节省办法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努力寻求，而且不能不寻求的上去，跨到巨大机器工业、电气化、瓦尔霍夫水电站等的上去”。

列宁写这篇论文的时候，苏联在恢复国民经济工作上已取得显著的成就。摆在苏联前面最大的问题是怎样实现国家工业化。所谓工业化，并不是随便发展一种工业。工业化的中心、它的基础，必须是发展重工业。照列宁所说：“社会主义的主要基础，又正是这种工业，所谓重工业”。但是，发展重工业是需要大量资金的。苏联不能象英国和法国那样，从掠夺殖民地获得工业化的资金，或索取战败国的赔款把它投入自己的工业；也不能象旧俄国那样出让厂矿租借权，以取得奴役性的借款。所以，列宁主张国家机关应该尽量节省，把所有一切浪费现象的遗迹都铲除干净，以积蓄工业化的资金。

关于这个问题，列宁曾反复叮嘱地说过。

1922年9月，列宁在“给职工会第五次全俄代表大会的信”上，这样说：“因为我们缺乏恢复固定资本，即机器、工具、房屋等等的手段；而社会主义底主要基础，又正是这种工业，所谓重工业。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面，通常是借借债方式来恢复这种固定资本的。然而，除非我们恢复资本家及地主的私有财产，否则，人家是不愿给我们借款的；但是这一点，我们是不能干的，也不会这样干的。所留下的只有一条长远而极端困难的道路，即是：慢慢地从事储蓄，增加租税，以便逐渐恢复被破坏了的铁路、机器及厂房等等”^①。在同年的11月，列宁在“俄国革命五周年与世界革命的前途”一篇论文里，又重新申述说：“对于我们这个落后国家说来，重工业情形实在是一个很艰难的问题，因为我们不能指望富庶国家的外债。虽然这样，我们已见到有显著的改善，并且我们看见，我国的商业活动，已替我们弄来了一部分资本。不错，这数目还很小，略略超过2千万金卢布，但无论如何，始基是已经奠定了，我们从我国商业中已能弄到资财，我们能够利用这种资财，来改善重工业。现时，我国重工业情况，至少还是极度困难的。但我认为，我们已能多少节省一批资财。今后我们也还要这样做去。”^②

列宁这些话的意思即是要在社会主义积累的

基础上，多多节省，避免浪费，以保证工业化的资金。列宁的这些主张，对于资产阶级国家来说，那是不可想象的，但对于无产阶级国家却完全是可能的。因为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他们所依据的原则，正如列宁所说：“不是你去掠夺别人，便是别人来掠夺你；不是你替别人作工，便是别人替你做工；你或是当一个奴隶主，或是当一个奴隶。……。总之，是当一个只关心自己而不顾及旁人的人。”^③在这样的社会里，自然，不可能没有贪污，更不可能避免浪费。但是，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则完全不同。

无产阶级国家里，地主和资本家的私有制已被消灭，土地、工厂等都是全民的财产，劳动人民都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生产，他们有巨大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会想出各种办法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设备利用率，提高产品质量，减少原料消耗，降低成本，他们会自觉地将厉行节约作为重要的制度来遵守，同一切浪费的罪恶行为作斗争。同时，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国民经济能够有计划的发展，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那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就能够创造出比以往一切生产方式都更加节约生产资料和劳动的可能性。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优越性，对于无产阶级国家来说，就能够凭着这些优越性用内部积累的办法把任何一点积蓄都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能够把自己社会关系中的任何浪费现象的任何遗迹都铲除干净。

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根据列宁的坚决与浪费现象作斗争的教导，曾郑重地指出：“问题不限于并且也不能限于积累而已。还要善于合理地、有计算地支出积累起来的后备金，不要白白化掉人民财力的任何一文，要使积累基本上用于满足我国工业化的重要需要。没有这些条件，我们就要遭受浪费所积累的财力之危险，遭受把这些财力分散于既与发展工业又与推进整个国民经济毫无关系的各种大大小小支出的危险。”^④因此他认为：必须采取多种办法，以保护苏联的积累，避免浪费，避免分散，避免把它糟蹋于不需要的用途，避免使它离开工业建设的基本路线。

怎样才能避免浪费呢？列宁和斯大林都提出过许多具体办法，列宁在1923年曾对工农检查人民委

① 列宁选集，第十七卷（东北新华书店版）

② 列宁文选，第二卷

③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

④ 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下册

員會份过这样的指示：“只有尽量清洗我們的国家机关，充分裁减其中一切非絕對必需的人事，只有經過这种办法，我們才能支持下去”①。列宁就是这样重視避免人力的浪費。斯大林在1926年更詳尽地多方面采取措施以保护联苏的积累，他的主张大略是这样的：

第一、必須使工业計劃不是按官僚主义虛構的办法制定的，而要与苏联当时的国民經济情况、与苏联的資源、后备力量底精确核計密切联系起来。第二、必須从下而上地精簡苏联当时国家的及合作社的机关、各人民委員部及經济核算的机关。第三、必須进行坚决的斗争，以反对苏联当时的管理机关中及人們中的各种浪費，反对那些对人民財物和对国家后备金的罪惡态度。第四、必須与盜窃行为，与国家机关、合作社、职工会中的所謂“快乐的”盜窃行为进行有系統的斗争。最后，需要进行一种消灭工厂里曠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巩固企业中劳动紀律的运动。

斯大林在提出这些办法的同时，无情地指責当时頗为流行的鋪张浪費的現象。他說：“我們現在盛行宴会、各种节日、盛大会議、紀念典礼、紀念碑開幕等。这些“事情”化了几万几十万的盧布。各种庆祝大会的发起人和盛大仪式的爱好者，在我們之間是很多的。半年，周年，二周年等等庆祝典礼，实在是惊人之多，要滿足这种需要，真得有几千万盧布才行。”斯大林接着沉重地說：“同志們，應該結束这种共产党人不应有的鋪张为行。最后，應該明白：我們看到我們工业的需要，看到大量的失业者和无家可归的人——我們不能也无权允許这种狂欢暴飲及这种鋪张浪費了”②。

1931年，斯大林在一篇講話中，又特別指出：加强社会主义的資金积累的唯一的途径，就是“消灭浪費現象，尽量利用工业內部的資源，在我們所有一切企业內施行并巩固經济核算制，有系統地降低成本費，在所有一切而无例外的工业部門里加强工业內部的积累”③。除了采用各种制度杜絕浪費，斯大林还着重提出：“需要使每个工人，每个誠实的农民来帮助党和政府实行節約制度，反对浪費和分散后备金的現象，赶走那些不論帶着任何假面具的偷賊和騙子，健全并簡化我們的国家机关”④。这就是說，不能單純地依靠国家法律来防止这种病害，而必須在群众中間，造成一种道德抵制和群众憎恨的气氛，使偷盜和浪費人民財產或国家积累的行为成为非理非法，受到广大群众的监督。

苏联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就是这

样用厉行節約、反对浪費的方法，增加了生产，扩大了积累，不断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从而順利解決了几个五年計劃所需要的大量建設資金。现在，苏联人民已过着幸福的社会主义的生活，他們不知經济危机和失业为何物，不知貧困和破产为何物。在科学技术的改造和发展上，苏联走在全世界的前头。我們向往苏联，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設的經驗，同时必須記取列宁和斯大林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积累、厉行節約反对浪費的遺言。

和列宁、斯大林一样，毛澤东同志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每一阶段都是十分注意精簡節約、反对浪費的。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澤东同志就在“我們的經济政策”一文中，具体地指出說：“財政的支出，應該根据節約的方針，應該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員明白，貪污和浪費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貪污和浪費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績，以后还应用力。节省每一个銅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們的經济建設，是我們的會計制度的原則。我們对于国家收入的使用方法，應該和国民党的方法有严格的区别。”⑤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澤东同志又諄諄地教誨我們說：“節約是一切工作机关都要注意的，經济和財政工作机关尤其要注意。实行節約的結果，可以节省一大批不必要的和浪費性的支出，其数目可以达到几千万”⑥。

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毛澤东同志还具体地制訂了当时党在財政經济工作适合于战争和农村情况的一系列的方針政策。在推行解放区的各項工作时，也指明說：“任何地方必須十分爱惜人力物力，决不可只顧一时，濫用浪費。任何地方必須从开始工作的那一年起，就計算到將来的很多年，計算到長期坚持战争，計算到反攻，計算到赶走敌人之后的建設。一面决不濫用浪費，一面努力发展生产。”⑦

1949年3月13日，毛澤东同志預见到党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緒，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緒，可能滋

① 列宁文选，第二卷。

② 斯大林：关于苏联經济狀況和党的政策。

③ 列宁斯大林論社会主义經济建設，下册，521—522頁。

④ 同上，73頁。

⑤ 毛澤东选集，第一卷，131頁。

⑥ 毛澤东选集，第三卷，918頁。

⑦ 毛澤东选集，第三卷，必須学会做經济工作。

長。①立即向全党敲起警鐘，必須注意用糖衣裹着的炮彈的攻擊。全國解放不久的1950年，毛澤東同志又指示我們說，要使中國經濟根本好轉和有計劃地進行經濟建設，需要三個條件，其中之一就是要大量節減國家機關所需的經費，這就是說：我們必須節減非生產的消費，才能擴大積累的比例，才能有更多的錢來建設重工業。到1952年便領導我國全體人民和機關工作人員，大張旗鼓地、雷厲風行地開展了大規模的對貪污、對浪費、對官僚主義的鬥爭。這次鬥爭的意義是很明顯的，它不特在經濟上保護了國家的公共積累，而且抵制了資產階級思想對革命幹部的侵蝕，為樹立新社會的新道德、新風氣打下了基礎，為國家建設事業的發展掃清了道路。

鑒於浪費的滋長還有其社會的、思想的基礎，1955年起，黨中央和國務院又多次向全黨和全國人民發出號召，開展全面的深入的增產節約運動，克服各種浪費現象，為國家積累資金，保證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勝利實現。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還經常號召全體幹部要提倡艱苦樸素的作風，與群眾同甘共苦，反對鋪張浪費現象。

我們要在十年到十五年內建成一個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並且爭取在主要產品的產量水平方面趕上和超過英國，這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必須依靠全國人民的一致努力，發揮一切積極因素，切實貫徹執行勤儉建國、勤儉持家的方針，才能達到這個偉大的目的。所以，毛澤東同志在他的名著“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說：“我們要進行大規模的建設，但是我國還是一個很窮的國家，這是一個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厲行節約，就是解決這個矛盾的一個方法。”

毛澤東同志不特認為厲行節約、反對浪費在經濟上有重大的意義，而且把它提到政治上思想上的原則高度。他要求人們經常注意反對浪費，以克服那些不願意和群眾同甘共苦，喜歡計較個人名利的危險傾向。他說：“反對浪費，同批判其他缺點錯誤一樣，好比洗臉。人不是每天都要洗臉嗎？中國共產黨、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知識分子、

工商業者、工人、農民、手工業者，總之，我們六億人口都要實行增產節約，反對鋪張浪費。這不但在經濟上有重要意義，在政治上也有重要意義。在我們的許多工作人員中間，現在滋長着一種不願意和群眾同甘共苦、喜歡計較個人名利的危險傾向，這是很不好的。我們在增產節約運動中要求精簡機關，下放幹部，使相當大的一批幹部回到生產中去，就是克服這種危險傾向的一個方法。要使全體幹部和全體人民經常想到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國，但又是一個經濟落後的窮國，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國富強起來，需要幾十年艱苦奮鬥的時間，其中包括執行厲行節約反對浪費的這樣一個勤儉建國的方針”②。

為了響應毛澤東同志的號召，貫徹勤儉建國的方針，一年多來，各級國家機關和企業部門首先注意做好計劃工作，避免計劃上的浪費。在各種建設事業上，對於工業同農業、大工業同中小工業和手工業、機械化同勞動就業、積累同消費等，都進行統籌兼顧，適當安排；設計和設備置造，力求自力更生。非生產性建設、城市建設、住宅建設，亦因陋就簡；各項建設事業，都依靠群眾，調動一切積極因素，認真進行。並且下放幹部，精簡機構。在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中提出：“勤就是要充分發動社員勤勞生產，擴大生產範圍，發展多種經濟，進行細致工作。儉就是要厲行節約，降低生產成本，反對鋪張浪費”。許多家庭的男女老少都努力從勤勞生產、厲行節約、有計劃地安排家務開支等三方面去實行勤儉持家，許多人並在勤儉中促進了生產的發展，增加了收入，改造了思想，樹立了節約風氣。我們相信：在全國範圍進行的這一次聲勢浩大的反浪費反保守運動，一定能夠進一步獲得思想上、政治上、經濟上的巨大成績，更好地貫徹多快好省的方針，達到移風易俗的目的，促進生產和工作的大躍進。

① 1949年3月15日，中國共產第七屆第二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決議。

② 見“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稿 約

(一) 本刊欢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投稿。

(二) 本刊欢迎下列稿件：

1. 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观点和社会科学原理闡述我国当前政治上，思想上，学术上的重要問題；

2. 批判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社会科学理論等方面的研究論文；

3. 通俗闡明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基本問題的著作；

4. 华南地区的科学研究資料和学术性調查材料；

5. 国内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評介。

(三) 本刊文字以語体文为主，稿長一般不超过一万字。来稿請用稿紙謄写清楚，并示詳細地址。不拟采用稿件，負責退还。

(四) 来稿发表后，即奉稿酬。

(五) 来稿請寄：广州市德宣西路广东科学館内理論与实践編輯部。

理 論 与 实 踐

月 刊

1958年第3期(总第3期)

編輯者：理論与实践編委会
广州德宣西路广东科学館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大南路43号

1958年3月15日出版

印刷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发行者：广东省广州市邮局

預訂处：全国各地邮电局、所

学术月刊

每月10日在上海出版

定价每册0.45元

“学术月刊”是上海哲学与社会科学方面各学术团体共同創办的綜合性的学术刊物。它的基本任务是：在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贯彻党的百家爭鳴方針，展开学术討論，促进創造性的研究活动，从批判資产階級学术思想和各种学术問題的不同意見的爭論中来繁荣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鍛煉和建立工人階級的哲学与社会科学的理論队伍，引导学术研究为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設服务。

刊物今后將注意討論和刊載下列三方面的文章：展开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著作特别是毛澤东同志的两类矛盾学說的闡揚和探討，有重点地展开对資产階級学术思想的研究和批判，促进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設中的若干具有实践意义的重要理論問題的探討。

本刊讀者对象为广大的正在培养为又紅又專的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和哲学与社会科学理論工作者以及机关、业务部門的实际工作者。

邮电部上海市邮局发行

各地邮局均有出售

学术月刊編輯委员会編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学 习 生 活

每月5日、20日出版

“学习生活”是輔導干部和知識分子进行政治理論学习的刊物。当前將着重結合整风运动輔導社会主义教育課程的学习，并紧密結合国内、省内重大的政治生活，发表联系实际的理論性的文章，帮助讀者学习和領会党的方針、政策和馬列主义的基本知識。另外，还將經常注意給讀者提供学习資料。

全省十八万干部下放后，“学习生活”还將注意輔導这部分同志的学习。

“学习生活”今年第二季度的收訂工作，邮局現仍繼續办理，并接受破季訂閱，欲訂閱“学习生活”的讀者，請即到邮局办理訂閱手續。

每期定价6分

每季3角6分

半年7角2分

欢迎各地讀者訂閱

学习生活編輯室編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广州市邮局发行

各地邮局、新华書店均有代售